

云南省档案馆

编



# 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

# 清末民初的 云南社会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 / 云南省档案馆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22-04295-4

I. 清... II. 云... III. 云南省—地方史—史料—清后期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7828 号

责任编辑: 赵石定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        |                        |
|--------|------------------------|
| 书 名    | 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              |
| 作 者    | 云南省档案馆                 |
| 出 版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发 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邮 编    | 650034                 |
| 网 址    | ynrm.peoplespace.net   |
| E-mail | rmszbs@public.km.yn.cn |
| 开 本    | 889 × 1194 1/32        |
| 印 张    | 6.625                  |
| 字 数    | 130 千                  |
|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6000                 |
| 排 版    |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
| 书 号    | ISBN 7-222-04295-4     |
| 定 价    | 16.00 元                |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804 4107828(邮购)

##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杨汝鉴

副主任: 张芸、余俊科

成 员: 王志强 龙 岗 黄 河

编写组成员: 吴 强 和丽琨 何玉菲 夏强疆 吕志毅

任 佩 黄燕玲 陈建丽 陈 虹 苗素江

统 稿: 吴 强

审 稿: 张 芸

## 序

李正学

说起云南，尽人皆知，是山的国度，花的海洋，在人们心目中，云南是动物王国，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在这片红土地上繁衍生息的26个民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描绘了一幅瑰丽的图卷。

由于云南僻处祖国西南边陲，交通不发达，山高谷深，自然条件千变万化，与内地的联系不紧密，加上少数民族众多，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使过去的云南被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使是云南人也大都只学过世界历史、中国历史，而很少有人涉足云南地方史，因而使得云南人也很少了解我们云南自己的历史。

为了弥补这项不足，云南省档案馆根据云南省委、省政府全面建设经济文化大省的构想，充分挖掘作为省、市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云南省档案馆，丰富的馆藏资料，编写了这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中法战争后云南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伴随法国殖民者以强权取得滇越铁路经营权后，随着该铁路的修筑通车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殖民者血腥掠夺的同时，客观上云南地方亦呈现多元化的对外开放的局面，大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西方科技的引入，都在云南树立了一种不落人后的“先进”省份的形象，经济上，云南拥有全国第一座水电站，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的影响深远；政治上，辛亥以来的历次革命浪潮，云南均处风口浪尖，护国讨袁首义云南更是引领风骚，享誉全国。本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图片为依据，撷取云南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折射云南生活的方方面面，力求使更多

的人认识云南、了解云南、从而热爱我们云南。

谈到云南的历史，许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贫穷、落后、偏远……。其实不然，滇越铁路的通车，昆明、蒙自等地的被迫或主动开埠，在英法殖民者经济文化入侵的同时，客观地说许多西方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伴随滇越铁路渗入并辐射到云南的许多地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因此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民族工商业开始萌芽，近代金融、交通、水电、电信等开始起步，多元的经济文化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作为当时西南一隅的闪光点，有着许多全国的“第一”、“最先”，以上种种都在该书中得以一一反映。

作为云南人，不了解云南的历史，是可悲的，希望借助《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这个媒介使大家通过原始的史料，真实的照片，客观的事实，来了解云南的这一段历史，并从中得到的益的启迪。



## 目 录

### 序

- 1 通信落后导致云南门户洞开
- 4 法英争强滇地开埠通商
- 8 昆明教案方苏雅难脱干系
- 13 七府矿权失而复得
- 17 法国神甫魏雅丰残杀纳姑村民获称
- 20 滇越铁路告诉我们……
- 23 最早提出修筑南昆铁路的人
- 26 双管吸血。滇省不堪重负
- 31 对外开放的最初轨迹——昆明开埠
- 37 艰难中起步的云南近代工商业
- 40 股份制农业公司的出现
- 44 工商职业介绍所的诞生
- 47 抵制洋货民族工业谋求自力
- 50 实业救国的丰碑——石龙坝水电站





- 54 云南首家卷烟公司——天森茂纸烟公司
- 57 权利与健康俱损
- 59 清代知府的市场意识
- 62 县令作弹词推广蚕桑
- 64 建水举人兴办火柴厂
- 66 金碧路三十年变迁
- 70 开放改变了昆明人的生活
- 76 河口起义初试锋芒
- 81 讲武师生重九起义逞英豪
- 85 东渡扶桑的云南女学子
- 88 民国开元与巴补梁山土酋禄金福内俯
- 91 傣族革命家干崖土司刀安仁
- 93 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 96 云南妇女缠足解放运动
- 99 梁启超草拟讨袁檄文
- 104 “五四”运动在云南
- 107 班洪抗英光照千秋
- 110 佘伍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
- 114 红军长征巧过滇境

- 118 红军藏民一家亲
- 122 蔡锷将军再议南昆路
- 125 滇越铁路筹建纪事
- 128 中国第一条商办铁路——个碧石铁路
- 130 初建云南公路网
- 133 云南第一条公路通车记
- 136 云南的发钞银行——富滇银行
- 139 初创云烟品牌
- 142 民初滇西沙盐井盐销场之争
- 144 唐继尧创建云南航空
- 149 从东陆大学到国立云南大学
- 153 从开盟垦殖局到新村蚕业公司
- 155 从一棵树桩引出的种植业
- 157 第一个电力排灌站——积善村抽水站
- 160 陈一得与云南第一个气象测候所
- 166 云南第一座广播电台
- 169 云南火柴工业的兴起
- 170 从土碱到地球皂——云南肥皂制造业的肇始
- 174 精盐、筒盐、大锅盐





- 177 昆明“公交车”小史
- 180 昆明最早的市徽市旗
- 182 “宣威火腿”小史
- 184 “云南白药”拾趣
- 186 “云南玫瑰大头菜”
- 188 民国初年的广告
- 191 老昆明的茶铺
- 193 老昆明著名的糕点铺
- 195 老昆明的婚姻习俗
- 197 老昆明的服饰风尚
- 202 编辑说明



## 通信落后导致云南门户洞开

云南省档案馆典藏清代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衙门档案中，有数十卷报销电报杆线工程的账目清册。这项工程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般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其实其真正起因却源于一场外交失败的惨痛教训……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即在滇设堂传教，外人借旅游之名频繁来滇游历、探险，搜罗情报。回国后发表的“游记”、“调查报告”均带有极为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如法国人让得勒的《四川吞灭策》、德尔孟的《云南游记》等。这些宣传助长了法国商人及官吏欲经越南、云南、四川，而控制长江流域，进而吞并全中国的殖民野心。19世纪60年代，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清同治元年（1862年）攻下下陵止（南圻），迫订《西贡条约》，



由红河而上中国境内一重要水陆门埠——蒙托

## 户部云南有电线报奏

疆让西贡等地，欲从东京（河内），富良江（红河）入云南。1873年攻陷河内，1874年订《法越和亲条约》，承认越南“独立”，使其成为越南保护国。法国殖民者欲开通红河航运，遭到刘永福黑旗军的顽强抵抗，滇督岑毓英暗助军火，法国意图没有得逞。1881年，中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向法外交部交涉：声明越南是中国属国，中国政府不承认“法越前订之约”。李鸿章向法公使声明“越南属中国已久，贵国如欲吞灭，中国断不能置之不问”。1884年中法交涉进入最紧张阶段，双方僵持不下。是年6月引发两国战端。经过10多个月的苦战，滇粤两军取得临洮大捷、叠克文澜、凉山等地，并约好西贡内应，做好进攻北宁河内，将法人赶出越南的准备。突然，一纸停战谕旨，撤回前线将士，一场胜券在握的战争就这样嘎然而止。以签订不平等的《中法条约》，承认法对越的占领而告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怪事？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字“落后”。通讯落后使清政府最终丧失获胜的良机。其实，中法战争爆发以前，清政府已经注意到有线电报在军事上的重要用途。《清史稿：



交通志》载：“同治十三年日本犯台湾，两江总督沈葆楨疏言电报之利，诏旨飭办不果行。光绪五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始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线达天津，试行之而利。”后“天津道盛宣怀言于鸿章，宜仿轮船招商之例，聚集商股，速设津沪陆线，以通南北两洋之邮，遏外线潜侵之患，并设电报学堂，育人才备任使。鸿章颺之，明年疏言，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两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急，亦已迟速悬殊……”1880年9月18日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次年12月1日，第一条电报线（上海至天津）敷成并使用。全国电报干线从此开始敷设。可惜的是，中法战争爆发时，尚未敷到云南。云南方面的捷报经历层层加急驿递四川转电天津时，李鸿章与法使的和约早已签订。中国为通讯落后、信息迟缓付出了惨痛代价。云南地方政府痛下决心立即着手架设有线电报干道。经奏准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着手架线工程。“由广西百色接线入手，经剥隘、广南、开化、蒙自依次架线设局以达昆明。”这才有了档案中的账目清册。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云贵电报总局成立，云南全省范围划为官局，李必昌任总办。这一天无论官民所发电报“悉予免费”。这虽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但确实是云南步入近代的重人事端。



## 法英争强滇地开埠通商



中法战争后，法国取得了越南保护国的地位。不久英国吞灭了缅甸。法英均把云南视为谋求更大经济利益的下一个目标，相互竞争，而开埠通商成为双方首选之策。

早在1787年，法国主教百多禄给路易十六的“奏议”中就充分阐述了占领中印半岛，是“伤害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最稳妥的办法”，因为那样法国可以靠近中国，从商业上讲较印度航程短，更容易吸引中国商人。而战时还可封锁中国同他国的商务，借此建立一条通往中国中部的商道而获取“莫大的利益”。中法战争中，法方正是依此行事。1884年和1885年在天津的两次订约，法国获得在云南通商、设埠、减税、筑路等权利。10月双方开始通商章程的谈判，法单方提出24款草案要中方承认。提出中国边界贸易“较盛”，或“开添”道路者即可增设商埠，关税“不得过各国在中国通行税之半”。虽然1886年清政府拒绝了法方增埠、开矿、设厂等无理要求，签订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但次年6月签订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1895年签订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使云南被迫于1889年8月24日开放蒙自（正关）、蛮耗（分关，1895年6月降为查卡）；1889年9月



总理衙门蒙自海关添派帮添咨文





厘金为清代一重要商税。初设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有关，随后推广至全国。下关为英缅商品进入云南一大商埠，下关厘卡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云南蒙自路上的大车店(1886-1904年)



开碑后蒙自东门的情形



清末盘龙江上的一个河运码头的场景



19日开放马白(分关);1897年1月2日开放思茅(正关)。

英占领缅甸后,曼彻斯特商会曾向英政府表白:“据敝会所知,中国西部边区的思茅城早被中国商民利用为贸易中心,与缅甸商人间进行着大量的贸易;所以从北占到思茅如能获得修筑道路、开辟交通的便利,一定会给贸易带来很大的利益……设法开通中华帝国西部陆路贸易,使思茅城辟为商埠,并看情况能订立通商条例或章程。”中英《烟台条约》英国获准的通过缅甸在云南境内通商,是在英吞占缅甸后才得以实现。1886年英与清政府签订《缅甸条约》,重申订立中缅界务、商务专章。1894年签订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款》,英获准在蛮允设领事,进口税与法国权利相同。189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签订后,与法国同享思茅开埠和在滇开矿、筑路之权利。蒙自、思茅、腾越三关档案,清晰再现当年缅、越口岸打开,洋货大举倾销,英法工业产品充斥云南的情形。



## 昆明教案方苏雅难脱干系



19世纪前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为留住历史瞬间提供了莫大便利。法驻滇总领事方苏雅于1898年到1904年驻守云南，使用才发明不久的照相机广泛拍摄当时云南各地、尤其是云南府（昆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城池防御、军队演练、民风民俗等场景，大肆搜罗情报，留下了数千张玻璃底片并将其中部分带回法国。在近百年之后，由殷晓俊先生在昆明、京城等地掀起了百年老照片世纪回眸热潮。却又有几人知道，那时，方曾与法越总督杜美合谋私运军火入滇，欲以驻越法军沿滇越铁路攻占云南。因事有不密，被厘金查卡查获，法人“闯关夺局”，强行将军火抢回藏于法国教



被昆明民众焚毁的昆明平政街法国教堂遗迹。(1900)





方苏雅镜头中演路中的清廷新军

堂（昆明平政街），引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焚毁教堂的“昆明教案”。

存于云南省档案馆的清代云贵总督衙门档案中有当时云贵总督丁振铎给光绪皇帝的奏折，详情奏报法领事私运军火激起昆明士绅及民众焚毁教堂一事。著名爱国志士杨振鸿先生《法人窥伺云南之断》的叙述更使后人清楚地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

……光绪二十五年，（法）派有领事方苏雅驻滇，协办铁路事务，同时派有陆军大尉柯里格氏等数人，假购营马为名，遍历探查险要。甫经归越。即与都墨氏谋实行取滇，为出我不意攻我不备之计，而都墨氏乃素所怀抱者。当即密电领事方苏雅，俾刻期赶归，商办行军事机。同谋先伏兵滇省作内外夹攻，期易奏效。时分发四十驮军械，由领事方苏雅暗输入滇，随带越兵一百余人，道经河口、蒙自，而滇官吏毫无知觉。幸英人税



昆明教案丁振铎总督奏稿

务司泄露事机，一时物议纷腾，人心惶恐，即酿成烧教堂之暴动。都墨氏得警告，愈幸师出有名，即发大军至我边界之龙腾，势欲灭此而朝食也。适值北京义和团事起，驻北京法公使电调越兵北上，都墨氏乃不得已解滇围，此是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大关头，记之记之，庚子五月十四日也。

罗养儒的《纪我所知集》中曾记录有昆明教案亲历者叶梓良的回忆：

是事之作成，当时则有人云：是云南法领事方苏雅，私运军火至省城，被六城厘金总局将其军火抬出，将军火扣留。法领事方苏雅则派人持枪到局，将其军火抬走，便藏于天主堂内。昆明团总陈某（指陈荣昌）闻，乃发滚单（清代官府下发给甲首，要其挨次催交田赋的文书），号召四十八堡乡团各遣十人来城，同往天主堂。威胁教士交出军火，后则有人向陈阻止，于是四十八堡之乡团竟未集合前来。只有一些居于省垣附近的乡人，裹同着城内外之游民数十，……突然聚众成百。往打天主堂溯源宫及耶稣堂之事。至云火



法国摄影家镜头下的晚清昆明城防(1910年前)

烧狗饭田教堂，此纯一班乡民之举动，城上游民实无与焉……一班打毁教堂与焚烧教堂者，无非掳掠得教士们之一些什物……若源宫内，直无一可抢之物，尚输去两颗人头矣……。

英人泄露此事，旨在阻止法国强占先机；而法国欲以武力入侵，是与英争夺云南的结果。云南人民的反抗成为法国殖民者期待已久的进攻借口。丁振铎的奏章写道：“自緬、越失陷……英法以接壤为利，竟起垂涎。近年游历洋员，往来络绎，熟知边地险要，滇力不足自防，狡焉思逞，叠存玩视。其相持不遽轻发者，殆欲谋定而动，乘衅以为进取……去岁蒙自烧关，及省城圆通寺滋闹，法人不耐齟齬，已有兵力办理之意。今年四月，法领事方苏雅募运军火，始终硬抗，至激成五月十四日烧抢教堂之案……方苏雅久居中国，并非不谙交涉，今异味横狡，不就调停，实受越督都梅（杜美）唆指。明知滇民多疑轻愤，借此挑衅生端，为改废约章肆所欲为之地。”是时，方苏雅在到处拍照的同时绘制的昆明形势图，标明

昆明的城池防御位置、各城门通往官衙的路径以及重要官衙所在，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一份进攻昆明的路线图，而绝非通常意义的导游地图。

津京义和团运动暂时解了昆明教案之围，集结边地的法军被调北上，参加八国联军进攻津京。《辛丑条约》签定后，法英以赔偿教堂损失为由，迫使清政府向法国赔偿白银12万两并同意在云南七处府厅开采矿产，导致“七府矿权”丧失。



## 七府矿权失而复得



昆明教案后，英法获得云南、澄江、临安、开化、楚雄府及元江直隶州、永北厅七处矿产开采权力。1901年，隆兴矿务公司成立，总局设在伦敦。法国总领事弥乐石为总办，来滇办理开矿业务。

隆兴公司经与清廷时任云贵总督魏光燾、云南矿务大臣唐炯、洋务局总办兴禄等人往复磋商，拟定24款《矿务章程》，于1902年6月报清廷外务部批准生效。规定了在滇开采范围为七府，但附加有：如七府境内之矿开工后见矿产不佳，或地势不合，准以他地更换，这实际上使云南全省的开矿权皆落入隆兴公司之手。开矿期限定为60年，“倘期限满后矿务兴旺，中国可允限展二十五年”。开矿的收益，除开支外，“中国国家得百之二十五，云南省得百之十，公司各股东得百之六十五”；隆兴公司可依章将所产生的金属及矿砂在缴纳5%的落地税后出口，并有权将所得矿地若干转售于人。开采的矿产品种有铜、金、银、煤、铁、白金、白铜、锡及火油、宝石、朱砂矿等，几乎囊括云南全部珍贵矿产。已颇具规模的个旧锡矿（临安府）、易门铜矿（云南府）、米里铜矿（永北厅）等尽划入内。依据章程，云南地方政府须代隆兴公司租山租地，提供方便，招募工人。未几，隆兴公司查矿、勘路队伍遍布全省，很快宣告“本公司已开之矿产共59处，银矿27、铜矿25、金矿6、石矿1。”

矿产权益的丧失使云南地方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云南各界各族人民反抗浪潮此起彼伏，绵延





香港隆興公司股票



日本间谍所拍锡都——个旧

数年。1903年5月，周云祥领导的矿工起义爆发，提出“阻洋占厂”、“拒修洋路”的口号，万余各族人民参加。起义军于5月14日占领个旧城，继而攻克蒙自、通海、开远，烧毁了蒙自城东门外12座滇越铁路洋人及税务司的会馆。接着所向披靡，横扫滇南10多个州县。清政府调集湘、鄂、川、黔、粤、桂等省协同云南军队共50余万兵力进行围剿，法国侵略者也集结了3000余人在中越边境准备入滇助剿。起义军力量不敌，加之法军的分化诱降，首领周云祥等5人于6月28日被杀害，起义失败。1904年，隆兴公司为增开东川、昭通矿产，英人立德与川商刘尧兴各出50万两银元组织华昌公司，云南地方政府顾虑影响“滇铜运京”，未予同意。1905年云南留日学生发起了废约运动，通电法要求废除《矿务章程》，撤回时任云贵总督丁振铎，呼吁将七府矿权收回自办。云南部分士绅自矿约签定后多次集议，成立了矿务研究会，上书云南地方政府和清廷“与法使商废楚、澄、永等七府矿约”。1908年元旦，云南留日学生百余人齐集东京，再次提出“废七府矿约，收滇越路权”的要求，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通车，法英大批人员入滇，扩大开采矿产，云南人民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废约斗争。成立了“保存云南矿产会”，敦促政府收回矿权；6月4日，2000余人集会，强烈要求滇省自办矿务；11日再次集会，陆军小学堂学生200人前往云南咨议局请愿废约，学生赵永昌拔刀断指，杨越引刀割臂，写血书呼吁“誓争矿权”、“七府矿约之不废除，则我等命脉已亡”；各界推选代表赴京请愿；绅商们集资办矿，成立了个旧锡矿公司和定兴公司，与隆兴公司对抗。

在云南各界的强烈反对下，清廷不得不考虑，



如长期强行开矿，不仅财源外流严重，甚至会引起人民更大的反抗。遂令云贵总督李经羲与隆兴公司代表高林士多次谈判商议，于1911年8月议定：由清政府赔偿白银150万两，十年赔清，《矿务章程》作废。

云南人民延续近十年反对英法霸占七府矿权的斗争，虽然以清廷妥协巨额赔款的形式收回，但云南人民奋起废约，捍卫矿产资源和国家尊严的斗争精神是千百年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斗争的延续，它将永载史册。



个旧的锡矿场——洗矿



## 法国神甫魏雅丰残杀纳姑村民茨称



修建滇越铁路，英法加紧经济入侵。遍布各地的教堂及其神甫更未放松对中国百姓特别是教民精神上的愚弄、麻痹和奴役。“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在“昆明教案”发生时似乎可以说得通。然而，事隔5年，洋人对百姓却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1905年末的一天，四川盐井教堂的法国神甫魏雅丰带着一干教众和护队清兵来到中甸德钦纳姑村，诬指藏族老汉茨称及藏族妇女四郎竹吗抢了盐井教堂的财物，将二人抓去捆吊了一夜，严刑逼供。次日临行前，将两家洗劫一空，命教民赵树芳割去四郎竹吗的右耳后将其释放。把茨称带到村边残杀，斩去头颅，挖出心肝，割去左耳，



花苗中的基督徒



中甸土民遭洋教挖心割耳所具甘結

带队扬长而去，残暴行径令人发指。第二年春，四郎竹吗的丈夫令青及茨称的妻子格苴竹吗，女儿女婿到管辖中甸的丽江府报官，丽江府一面上报云贵总督锡良，请上司与川省协调抓捕案犯；一面对护送魏雅丰的清兵和死伤者家属及纳姑全村老幼进行讯问调查，提起供结。

茨称妻子供结：



……年六十二，纳姑村人，夫主焚称平日念经过日，从未敢生事。

不意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有四川盐井司铎到村住宿，黄昏时候突有教民数十人来到小妇人家中，说要买肉，见夫主坐在灶房，不由分说将夫主捆绑去见司铎，小妇人吓得要死，不敢说话，只得哭啼随往。见魏司铎作定，旁站教民数十人，说夫主焚教堂，抢教堂什物，定要斩首。讯后关在仓内一夜。小妇人同闾村老民跪地，向魏司铎求情：夫主年老眼花不能远行，何能<往>数百里之外烧教堂、抢什物，再三哀求魏司<铎>（下缺），次早即令赵树芳带数十人，于村外里多地方斩首、挖心、又割去左耳。小妇人见夫主惨杀气绝在地，闾村人众为之不平。家中牛马什物抄抢一空，赵树芳立即派夫背回盐井发卖，大众皆知内中并无教堂一物。夫主遭此惨杀，情实可怜，心血难甘，总求恩施格外，代小妇人申冤，如有虚捏甘愿具结闾家认罪，所供是实。

清政府迅速将魏雅丰拘押在案，然而却在与法国公使的交涉中同意将魏雅丰从丽江府押往蒙自，交与法驻蒙领事审理。其用教民作翻译，不顾纳姑村证人的供结，将魏氏指使一节略去。在要犯赵树芳在逃的情况下，草草结案。无罪释放魏雅丰并将其护送出境。此后，法方以种种借口拒绝清政府追回已到香港的魏雅丰重审的要求。蔑视我国司法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殖民主义行径在这里凸现无疑。

## 滇越铁路告诉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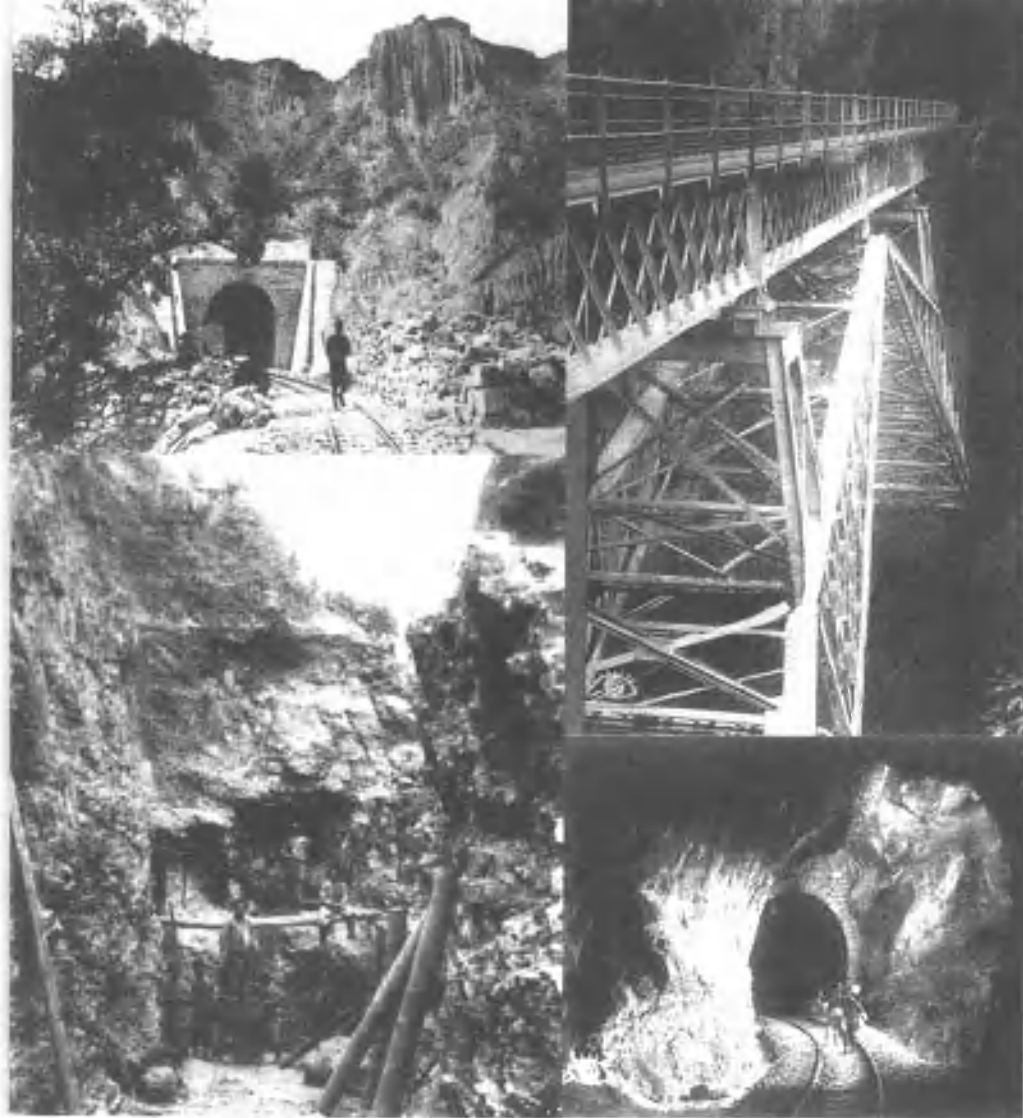
云南民间流传的“十八怪”中，“火车没有汽车快”一怪，源自迄今已运行九十余年的滇越铁路。它的修筑史，也是一部云南人民的血泪史，奋斗史。修筑铁路留下的大量档案真实地作了记录。

滇越铁路从云南府（昆明）经开远、蒙自、河口、越南老街、河内达海防，全长855公里。

其中云南境内长466公里，越南境内长389公里。轨距1米，蒸汽动力机车。投资1.5亿余法郎。时速仅30至40公里。宣统二年（1910）三月三十一日全线竣工通车。1898年3月，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借口干涉还辽有功照会清总理衙门，在提出割让广州湾的同时，要求“中国国家允许法国国家或法国公司，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道”，清廷答复：“可允照办”。法国就这样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1899年9月，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为首的几家机构成立了滇越铁路公司，承包了滇越铁路的集资修建业务。越南境内1901年动工。1903年10月，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了《滇越铁路章程》34款，1904年，云南境内开始兴建。

滇越铁路修建是以“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为代价完成的。其路经之处大多人烟稀少，高山河流不断，工程异常艰难。波渡箐的一座人字桥，架于两山石壁间，并无桥柱，距涧底90米，两端接山洞，长65米，当时旋架旋塌，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滇越铁路公司前后累计在云南及邻近各省招募筑路工人二、三十万。由于工程艰险和法国铁路公司的非人待遇，工人“到工后死于烟瘴者，不知凡几。加以克扣工资，无钱觅食，逃亡饿毙者，实不能以数计”。有诗叹





|   |   |
|---|---|
| 1 | 2 |
| 3 | 4 |

- 1 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人字桥”
- 2 滇越铁路
- 3 正在开挖的隧洞
- 4 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上的隧道





滇越铁路过境护照

道：“切齿当年卖国臣，南朝奸桧是前身；双行铁轨千家命，怎奈经营付别人！”当时云南地方官吏亦认为“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据统计，筑路期间惨死的工人达六、七万人。人民高涨不绝的“拒修洋路”呼声，迫使法帝将铁路改线；昆明的革命党和爱国士绅一再提出“赎路自办”。但由

于清政府的腐败和中法军事力量的悬殊始终未果。滇越铁路从修筑到完工后的管理使用，既是一部外强掠夺云南财富的历史，也是一部云南各族人民反对殖民掠夺，奋起发展地方经济的历史。



## 最早提出修筑南昆铁路的人



滇越铁路路权失于法国，英国不甘落后，以利益均沾为由频繁照会中国，欲将缅甸铁路经滇西至昆明，甚至四川，实现其控制长江上游的目的，云南各界当然不能坐视滇缅路权再失，于是，护权修路摆上议程……

英国继法国之后提出滇缅铁路权的要求，大大激怒了云南各界人士，自办滇缅铁路成为上下共识。人民坚持斗争，地方政要据理力争，英国企图终未得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云贵总



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绍先生像

督奏设滇蜀铁路“议成”，云南开始着手成立“滇蜀腾越铁路公司”，集股兴办自己的铁路。围绕云南铁路出省方向在当时引起争论。基本认为应通蜀，连湘，接桂。三路同修当然最好，但当时财力能筑一条已属不易。这时一个叫做唐绍的先生写了一篇《滇蜀铁路宜改道滇邕》的议论，最早筹划了今日的南





今卷旧路邑清同调修路

昆铁路。

唐謩认为铁路是“便兵商，致富强”的交通机关，当时云南“居西南边地，当英法交冲，今英之铁路已抵滇边，法之铁路直抵滇省”，要想自修铁路谋求抵制，就应该“审地理之形势，道路之远近，必使路线易于成功而便于兵商”，方可设法“保滇”。唐先生具体分析了云南“北通四川，中由贵州而通湖南，东通广西”三条路线优劣，他说：“滇湘、滇蜀、滇桂，除滇湘路远工巨，暂勿庸议外，其比较难易惟滇蜀桂两线。滇蜀除大理至宁远外有三道，一由东川，昭通、叙府至成都二千三四百里；一由威宁、毕节、泸州至成都二千七八百里；一由贵州、重庆至成都二千里。均款巨难成功，且川汉铁路成功无期，即通亦不能绕远三江两湖之兵以救云南之急”。

滇桂由广西州，广南至百色千余里，再展至南宁近二千里，粤汉铁路已抵英德，成功当在四五年，若通则两湖之兵一二日可至广东。而粤汉路的“支路已定议由三水、梧州至南宁，若通则广东之兵可一日至南宁。宁为广西重兵所驻，若滇桂通，广西之兵一日可至云南，其修费则较滇



蜀少二千余万之款，若夫商务可夺滇越铁路之利一也，由西江达香港二也，联粤东为一气三也，云南矿产销路四也。日线短而费省，其利一；工成甚速，其利二；便于行军，其利三；商务盛而财政裕，其利四……”。唐璆从军事、外交、商业利益诸多方面分析后，得出云南必须先修滇桂一线的结论。云贵总督李经羲也倾向于这一意见。由于当时云南非常贫瘠，于是积极向清廷建议由中央主持该路的修筑。

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决定将“滇蜀腾越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先修滇桂缓修滇蜀”。命交通部具体负责滇桂一线的踏勘修筑事宜，筑路经费由中央、云南、广西、贵州各出一份额。滇省已集有相当数量的“滇蜀”路款，正好划归“滇桂”勘修使用。于是将其拨存大清银行，准备随时听候“滇”路支用。本已经指日可待的滇桂铁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只剩档案中的一纸动议。直到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才得以建成。

## 双管吸血，滇省不堪重负



滇越铁路的修筑及随后法国的一系列活动，使法国完成了对华侵略由商品输入到资本输入的重要步骤。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与滇越铁路公司双管吸血，造成民国初年滇省金融、货币紊乱。

首先，搜运云南银元，使云南银元大量外流。筑路初期，滇越铁路公司曾鼓铸越南银元750万元供路工之用。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904年—1907年）共有价值关平银7 176 304两的越南银元运入云南。民国2年（1913年）2月，法越政府借口滇省商人贩此银元熔铸银锭图利，禁止银元出境。民国3年（1914年）11月设东方汇理银行蒙自分行，专事收回越银的特种使命。此后越南银元不得再入云南（除少数偷运外），东方汇理银行却每年从云南搜罗大量银元运回东京（河内）。民国5年（1916年），香港银



东方汇理银行运银请云南地方派兵护送函

价大涨。纸币跌落，港英当局下令禁止白银出口。为免白银外流牵动金融，云南同时颁发禁令。至民国8年（1919年）禁例更严，规定“非有政府准单，在本省境内往来，每人携带银元不准超过三十元，出境不准超出十元。”富滇银行因银元缺乏亦限制兑现。但是禁令虽严，管不了东方汇理银行。起初东方汇理银行蒙自分行将滇越铁路营业所获滇币向富滇银行蒙自分行兑现银元，再将中国银元换成越银运回东京，后因兑现数目过大，改由富行总行固定数额在昆兑换，于是东方汇理银行于民国7年（1918年）在昆明设立办事处。商人兑现受限，东方汇理银行白银照运，纸币照兑，兑现通行无阻。据中国海关1914年—1930年间统计，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运往越南东京的越南银元为13 062 799元，运往上海的墨西哥银元，中国银元为1 496 500元，共计14 599 299元，值关平银9 726 312两。然而，越南银元继续收运见于海关统计的数字已不多。曾有知情者说，蒙自东方汇理银行将墨西哥银元、香港银元随时



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有关运送“银箱”给云南地方官员的函件

大量运往香港、上海。据云南省档案馆藏民国云南外交署档案载，此项运银并夹带滇铸半开直到1930年方止。但海关记载仅1918、1919年各运上海一次，“所以东方汇理银行运往香港、上海各种银元是否都报海关查验？曾否利用滇越铁路车辆出入繁多，海关无法稽查的特殊情况，暗中偷运出口？还很可疑。”

其次，东方汇理银行通过控制“大锡跟单”操纵云南外汇，支配云南金融。个旧大锡出口是云南的主要外汇来源，个旧锡商运锡出口时，可将滇越铁路公司的运货提单（即载纸）向该行押汇。民国15年（1926年）1月间，某商运大锡6张（每张50片，每片约重53至55斤）出口，前往香港销售。照当时香港云南锡市价，每担（1百斤）约值港币80元，每张大锡值2100元，6张计12600元。该商人以滇越铁路公司的运货提单押汇，可得香港全部售价的七五成，即港币9450元，折合滇币20931.75元。该支行以滇币付与锡商，扣除运锡至香港所需时间的利息及手续费。这批大锡运到海防时，锡商或其代理人，须将由海防到香港的轮运公司提货单，向海防的东方汇理银行换回铁路提货单，然后才能提货上船。大锡运至香港，限期20日，锡商或代理人将押汇港币9450元如数交付香港东方汇理银行，赎回轮船提货单，方可提货售锡。若大锡一时无法脱销，在其规定的20日内无力付款取赎，还须照加过期的利息、仓租……这样一来该行除可获得利息、手续费外，无形中又额外得到十分之一的“港水长余”（即先付滇币再收港币，可因滇港汇兑而获得贴水之利）。

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利用此跟单押汇办法，把云南港销大锡所换得外汇大部分控制在手中，



供给云南进口商，居间盘剥任意操纵。有时，借助资金雄厚，故意积压不卖，使外汇供不应求发生恐慌，然后抬价出售尽其操纵。如此外汇汇率步步攀高，而滇币币值则连连下挫，导致云南金融日趋紊乱。

其三，滇越铁路公司与东方汇理银行相配合，推行越币打击中国货币。滇越铁路筑路过程中，越银进入云南，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纸币也随之而来。当时云南通称“法纸”，港、津、沪、汉等地称之为“西贡纸”。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公司购料建屋运来首批7万元法纸，随后便长期流入。1912年~1936年东方汇理银行在越南发行纸币流入云南境内流通数额有316 260 878元（其中缺1922、1926两年），折合滇币（旧滇币）380 563 084元（其中缺1916年~1920年、1922年、1924年~1927年的数字）。

法纸反客为主，从云南富滇银行发行滇币记录中可见一斑，“民国元年，创设富滇银行，并发行纸币一百万元。六年增至五百二十万元。七年增至七百万元左右，八年流通硬货收回，流通仅六百万元矣。八年以后，生银来源渐少，铸料缺乏，且硬货外溢日甚一日，九年纸币发行额已增至九百万元左右……”（《续云南通志长编·财政》）。同时期滇币平均每年的流通量仅有315万元，而流入云南的法纸就有6 271 377（越南）元，折合滇币5 769 666.84元。显然，流入法纸的数额及币值均超过滇币。滇币自然受到法纸的排斥。此外，法人利用升降汇率、滇越铁路公司拒收滇币等办法，获取暴利打击滇币。

法国殖民者深入云南疯狂掠夺，利用东方汇理银行与滇越铁路敲髓吸血，谋取巨额利润，加之潮水般涌入的洋货盘剥，使云南元气大伤，年



均贸易逆差达2百万两，制钱贬值，物价上涨，百姓生活更加贫困。



## 云南对外开放的最初轨迹 ——昆明开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两国贪得无厌，步步进逼，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相继逼迫清政府签定各种不平等条约，割地、让权，使云南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劳动人民作为危机的直接受害者奋起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1898年，中英会勘中缅边界，英国企图把缅甸国界再向中国境内划六七十里，遭到当地佤族人民的武装阻止，迫使英国侵略者退出境外；1900年，“昆明教案”爆发，捣毁了法人住宅和教堂，法总领事方苏雅不得不带着从越南招募来的雇佣军逃出云南；1903年，个旧周云祥矿工起义迫使法国将勘测中的滇越铁路路线作了变更等等。对于云南地方统治集团来说，他们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法英采取激烈的行动，但严酷的现实又促使这个集团中部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较高素养和见识、视野



档案中的昆明商埠图

较为开阔的人士以冷静的态度，从更深的层次来进行思考并提出抵御侵略的方策。其中就包括主动开放昆明通商。1905年，国内直隶秦王（皇）岛、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山东济南等地先后开埠通商，为昆明开埠提供了可援之例。开埠之事蓄势待发。

云南省档案馆藏有 1905 年，云南士绅翰林院编修陈荣昌，庶吉士罗瑞图，李坤、广东补用道王鸿图，四川补用道解秉和等人上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丁振铎，提出为杜外人之凯觎，请援照山东、湖南等省成案，将昆明自辟为商埠的珍贵档案。上书陈述道：“省城南门外得胜桥地方，为官商往来孔道，货物骈集，市廛栉比，且与车站附近。应请援照山东、湖南等省成案章程，就该处开作商埠，奏派大员，督同地方官绅，勘购地段，修筑埠头马路，起建房屋，设局经理，实于交涉商务利权，均有裨益。”丁振铎奏报清廷：“云南地处极边，外来商贾，本属无多。比年以来，



状元楼，曾是昆明一标志性建筑，民国初，因石龙坝电站的建成，电线杆便成为那时的街景之一。





开埠前，昆明南门外西寺塔附近仍是一片农田

蒙自、思茅、腾越先后开关，中外通商，贸易渐臻繁盛。滇越铁路，转瞬畅行，省会要区商贾尤为辐辏，自不得不开设商埠，以保主权。……今昔形势既有不同，亟应援案设立埠头，自开口岸，相应请旨府准，将云南省城开设商埠，以便通商，而扩利源。”两个月后，昆明自辟商埠的请求得到了清廷的允准。

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四月，丁振铎开始筹备昆明开埠事宜。将昆明南城门外行将使用的滇越铁路火车站所在地划为开埠区，东起桂林桥，西止南关外鸡鸣桥，全长3.3里；南起双龙桥，北上数润桥，全长35里，周围约12里。内中分为三段，以鸡鸣桥起至奏功桥止为西段，奏功桥起至明通河太平桥止为中段，太平桥起至金汁河桂林桥聚奎楼止为东段。成立云南商埠工程局，负责修筑马路，建造公所行栈，开挖沟渠，疏通河道，并监督埠内华洋各商租地、营造等建筑事宜。滇省地方政府将商埠区内田地规定了地价，每亩价格由纹银30两至120两，作为外商租用地价参考。自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七月至宣统二年（1909年）七月，4次对商埠区内田地进行测量并颁发土地执照，分区绘制成图，逐区逐户登记造



册，完成了界内铺房田地的清查工作。在此期间，李经羲接任云贵总督，主持成立了商埠总局，主办商埠区内所有事宜。制定了《云南省城南关外商埠购租房地专章》、《云南商埠规条》、《云南省城南关外商埠章程》等条例，对开埠做了详细规定：一、“商埠与其他条约所载各处约开口岸及沿江沿海各埠情形不同，准有约各国洋商并华商于划定界内租地杂居，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二、商埠界内民有房地，外国人只准租不准买。凡承租埠内官民房地者，须将租户姓名、籍贯、年龄及住所、承租房地所在点、营业种类等文件呈报商埠总局。外国人承租房地，无论是官业还是民业，均应请该国领事为保证人，照会交涉司、送商埠总局备案。每户租地不得逾10亩，倘若必需大地，应照章禀明而行。租地应交纳相当押金及租金。通商场内之地分为三等出租，上等地租价每年每亩花银100大元，中等地80大元，下等地50大元。所有地不论等每年每亩上税银3元。三、民有房地租与外国人者，其契约内不准有永租字样。民有房地租契以5年为一年限期，期满续租必须变换新契，换契时，商埠总局可察看情形，酌量增减租金及押金，未经期满以前不得提议增减，承租官地自租定日起租金按月计算，按季征收。议定之租价钱粮，均由商埠总局或税务司按期面租户照数代收，交送监督给回收银印单，粮串地皮拍定后，先将自租日起至年底租银钱粮缴清，嗣后每年应缴税银钱粮，均于中历正月内一律完清。埠地码关费应由关照已完正税百两抽收2两，即完正税外收费2%。如埠内遇有特动紧要工程，则再由租户按一定比例分摊。由监督与税务司、各国领銜官及由众户公举商董三方会商办理有关事务。四、云南既设商埠，



所有洋商在此划定界内，可自由往来，携眷居住贸易。至城厢内外各处，仍照内地不准设立行栈条约办理，埠内民房民地，业主如系典当而来，不能转当与外国人。承租官地自租定日起，限3年内必须将地上房屋建筑完竣，逾限者照拖欠租金章程办理。凡建筑必须先绘具图式，呈由商埠总局核准，方可动工，改造者亦同。租定之地如转租别商，只能全地转租，不能割租，尤须原租之户承接之人同至工程局或税务司具禀签字，呈缴旧契，换给新契。洋商仍需该国领事照会，方为合例。租户如将该地上的不动产典押给他人时，应由原租户会同承受该产之人按规定到商务总局办理租金、押金等转承手续，并由领事签字。洋商恐有回国及意外之事，须将承业之人或代理之人先行报明，并在领事处存案。各租埠地盖建房屋，填充地基所需泥土，必须在远处地方购取，不得在界内掘用。此外，李经羲专门宣布开埠的八条总纲：一、本埠自开与约开不同。埠内一切事权，均由中国自主，并设商埠局专理其事。二、本埠界址，四周有碑。凡有约各国商人，均准在界内租地寄居。三、本埠一切章程规则，中外国人，均须遵守。违者，华人由局照章惩罚；如外国人，由局交商该国官员或领事，照埠章罚办。无约国之外国人，照华人办。四、商埠局综理本埠一切行政事务。其词讼暂由该局裁判。惟外国人诉讼，仍依条约办理。五、本埠内邮电警察及关于交通卫生等事，应由中国国家或公共团体兴办，外国人不得有此权利。六、本埠公益应征之通常或临时各项税捐，埠内中外人均有担负之义务。其征收种类方法，由局妥订规则。七、本埠各项行政事件，应由商埠商另订专章办理，不得授他商埠章程。八、本章程经咨部核复立案后，除公布外，



并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及驻滇领事存查。

自1905年起,历时4年,经三任总督筹划,昆明开埠终于事成。这一顺应潮流之举,促进了云南近代工商业、金融业的兴起,加快了昆明的城市发展,标志着云南第一次主动向外界打开自己的大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沿滇越铁路两侧辐射的对外开放基本格局。



## 艰难中起步的云南近代工商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一方面，封建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入侵、瓜分下，不得已进行了一系列不彻底的政治、经济变革；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对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冲击日渐，各种公派、自费留学取代了科举制度。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英、法、越交界，直接遭受着来自两殖民地的军事夹攻，经济方面英法以各种不平等条约致使云南门户洞开，外洋货物直接倾销云南腹地，云南固有的传统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利权外溢”日趋严重。加之日益严厉的禁烟政策约束着“鸦片经济”的发展，使地方财政越加艰难。宣统年间，清政府于各地专



前清劝业道档案中的大理杨履义仿造通绳机图说



门设立职掌农、工、商各业事宜的劝业道。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云南近代工商业的发端大致也在这一时期。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南设立劝业道管理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前清云贵总督衙门档案有这样的记载：“……案奉宪台札开：前奉谕旨飭令各省增设巡警、劝业道，裁撤守巡各道。现各省已遵行，滇省拟裁去粮道改为劝业道，增设巡警道，札司会同学按两司将所拟裁改增设道缺办法妥为议定详覆。又奉宪台札开，准军机处有日电开，本处会同各部奏准设云南劝业道，缺希由遵处于道府班内无论本省外省，择其曾办实业著有成效或熟悉矿务者酌保数员电达本处，以备请简当经本部查酌核覆札司，分别核会查照各等因，先后行司。奉此，正核办间，接电抄光绪卅四年六月廿九日奉上谕：云南劝业道缺著刘孝祚补授，钦此。查滇省僻处西南，界连缅越，民多瘠贫，地少膏腴，财政极形困难，边务最为吃重，近则开修铁路，扩充商埠，中外交通日益繁盛，非整理警务讲求实业不足以肃内政而裕民生。巡警、劝业两道诚为滇省必不可少之官，亟应分别添设，以之治理。”

这一机构的出现绝非偶然，与19世纪下半叶形成的地缘政治、经济有极大的关系。云南的政治地理环境，是英法出于政治需要从西南两个方向夹逼，而当时云南与内地交往极为不便。铁路先通国外、商埠沿边沿路开放，虽然西汉时中原王朝已在云南设立郡县，开通过官方传递公文驿道五尺道。但两千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近代以来，尤其滇越铁路修筑后，云南人要到中原，云南子弟留学北京等地，云南与内地特别是沿海的商贸往来，基本不选择川、



黔方向路径，而从滇南蛮耗沿红河水路至越南海防，经海路转香港、上海等地，再达内地。滇越铁路通车后，改沿该路经河内至海防，再由海路前往。铁路先通国外、商埠沿边沿路开放，云南被迫呈现半殖民地对外经济的局面。怎样倡导、扶植、保护地方民族经济以抵制外来工业商品的倾销，实属当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云南逐渐成为罂粟的重要种植地，“土药”鸦片的收入成为云南地方财政支柱和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清末多数省份停止了邻省协助云南财政的“协饷”。而利用鸦片打开中国国门的西方列强却要中国政府严禁鸦片。结果，云南地方财政、农民尽失“烟利”。怎样解决财政困难，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产品替代品也成为清末云南地方政府棘手的事。

虽然云南劝业道成立仅三、四年，但几乎统揽了所有经济事务。“裁粮道，增设劝业道”的思路，使云南从以农为主的经济状态向近代工商业迈出了重要一步。它提倡的发展兴利的农业，变革和种植经济作物、工商企业的审批、注册等等影响沿至整个民国时期。



## 股份制农业公司的出现



20世纪初，清政府严令禁烟后，云南地方收入骤减。滇省地方当局为广辟财源、“打开风气”，振兴滇省，求得“自保”，大力倡导农学，劝办实业，积极鼓励民间对农林牧畜等行业进行投资。各地乡绅纷纷响应，自行集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举办各类经济实体，一时间，集资办公司成为一种时尚。

这些民办公司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其业务主要集中于农林茶蚕桑药，畜牧业及垦荒等方面。云贵总督李经羲认为：“滇中生产，向恃鸦片烟为大宗，际此烟毒甫除……吾民生计之前途，必有不堪设想者”，只有提倡农林畜牧业，才能得于“振兴”。要求“更将各项浅近实业之要书，切实讲演，便知自治良法，即以养民为首务，不特人人竞畜



清末昆明郊区农村中的牧童



于实业，生计由兹而饶，即新政之推行，亦将风从草偃”。

为推行其“新政”，劝业道向全省发出一系列行文，要求各地官员在本地大力倡导农桑等业，鼓励当地绅商出面组建农业经营实体，由



昆明近郊，农村碌水车的农妇

官府免费提供籽种。当局购置了外国农学书籍，供农学堂使用，又自己编写较为通俗的农书，分为农学提纲、农话、蚕桑浅说、种棉、栲兰谱等种类，供一般农民使用。

出于官府倡导和生计所迫，全省各地乡绅纷纷响应，积极创办实业。沾益绅商李紫东于1908年创办“亨利长蚕桑虫蜡有限公司”，集资2 000两白银，租地试种蚕桑虫蜡10万余株；昆明县耆民窦再安等人于1909年初成立了“公正森林股份有限公司”，集股本金1 200两，在小西门外篆塘两岸沿堤栽种虫蜡桑竹松桐厥等树木；较为突出的是临安府蒙自县，由官府出面，于1910年接连创办了商务分会、劝业所、罪犯习艺所、农务分会、平民习艺所，并组织民间成立了“提兴农业”、“南



湖植牧”、“天一植牧”等公司。临安府的“天一植牧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项目分为种植、畜牧和烧锅三类，集资3万元；蒙自“南湖植牧公司”经营树艺、畜牧、种果、养鱼，集股4 000元，租定南湖、金湖为其植牧场，租期60年；“提兴农业公司”集股5 000元，开办试验农场，试种各种菜果，如获成功，两年后扩股推广，预备开办20年。县令胡思义在给劝业道的禀文中称：“要皆各县规模，果然持之以恒，行之以渐，公私兼筹，官绅一气，三年经营，五年略备，十年之后，积习颓风焕然丕变，货不弃于地，富可藏于民”代表了当时的普遍倾向。

民办公司采用股份制，是中国这一农业大国数千年来从未碰到过的全新的农业经营方式。晚清时，面对外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必须改弦更张。由于民间资本的弱小，无力投资工矿业，这些公司都是从事农林畜牧等行业，多聘请国外农学专家，农书多译自国外，以农为本的云南开始向外国学习近代农业。但这种农业股份制公司并非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中自发地产生出来，农民很难接受，只能依靠官府的倡导和扶持来推广。这些公司的经营带有如下特点：（一）利用集资，迅速集中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形成相当规模的生产力，开展大规模生产活动。如沾益李紫东创办的亨利蚕桑虫蜡公司，一次种植32处山地共590亩桑树达十余万株，雇佣长工400百余人，加上零工及杂役等不下千余人。公司资本，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经营规模为一般小农户望尘莫及；（二）公司产品都用于销售。蒙自“天一植牧公司”的产品“销场之广，近则个旧，远则越南”，形成了社会化的商品化生产，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



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具备了市场经营的特点；（三）公司资本均来自民间，农业实体全系民办，无官股。公司内部设董、监事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由此可见，清末云南在传统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已经形成近代的股份制公司和民族资产阶级。

## 工商职业介绍所的诞生



昆明、腾冲、蒙自商埠建立和滇越铁路开通，商品流通异常活跃，外洋货物长驱直入，云南地方“土货”的生产经营备受打击。为协调经营，发展云南地方经济，保护“土货”经营者——民族



昆明街头艺人表演(清末)





20世纪初昆明街头的补锅匠人

工商业者的利益，云南劝业道策动设立了王筱斋为会长的云南商业总会。商会调解商业纠纷维护商业秩序，为云南地方组织行业规范经营方面做出了贡献，并在商会内附设我省最早的职业介绍所。

据档案记载，云南商会附设的“工商职业介绍所”的职员由“热心之会帮董”义务承担，经费开支“一切登录、布告、收发事项，由本会文牍会计、庶务三课及商社担任，概尽义务……”。由于商会会员义务充当职员，都是具体的经营者，雇用人员与之形成长远的、切身的利益关系，欺诈哄骗，受损的是自己。避免了运作过程中短期临时的谋利行为，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组织形式。

职业介绍所的章程规定可介绍的职业有七种，“工商业之司账”、“工商业之书记”（专办商号书





信人属之)、“各种商业之买卖经纪人”、“各种商业之学徒”、“各种工业之技师”、“各种工厂之工人”、“各种工业之学徒”。对“司账人、经纪人、书记、技司”求职者资格列有四项：“确系已任过工商业务，有相当之技能者；年岁须在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身体强健，确无嗜好及暗疾者；品行端正并无其它行为者”；对“学徒、工人”的资格则要求“学徒必须在十二岁以上，工人则在十八岁至五十岁间”，身体健康与品行的要求同于前者。德才兼备、择优录用的原则有所体现。



## 抵制洋货民族工业谋求自力



鸦片战争以后，九省通商门户洞开，洋货遍布中国城乡。地处边陲的云南也因口岸打开，滇越铁路通车，英法逼处，置身于抵制洋货的前沿。

档案中反映出云南进出口贸易逆差明显加大，“……凡我市面销场，人民日用，几乎无一非洋货所充斥矣。入口货以棉花、棉纱、棉布、意大利布、小呢、毕叽、洋火、煤油为大宗。余如洋铁货、磁货、石碱、洋伞、燕窝、海带、干鱼等类，销数亦巨。”而“出口物以黄丝（四川省产，滇省仅产少数，不过百分之五六耳）、石黄（大理、楚雄一带产，每驿运费过于本金）、牛皮、牛角数者为大宗。余则如铁锅、纸张、篾帽、鸡鸭蛋、底



清末滇南商道上运洋货的马帮





20世纪30年代云南大理附近的集市

线、棕盖等类……出口之少已不堪言”；蒙自海关在滇越铁路通车前的1909年进口棉花57 660担，次年通车后猛增至84 791担；洋货来势汹汹，少部分本地商人目光短浅，为谋利益“作洋人贩货之奴隶”，尚在萌芽状态的滇省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刺激和巨大打击，国货土货自然居于劣势。这种局面，引起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据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云南地方志》载，“云南出口无货，商务前途，甚为危险。且洋人关三处蒙自、腾越、思茅入洋货日盛一日，若不设法振兴，以求抵御，将来缅、越铁路一通，滇人生路绝矣”。

为抵制洋货、求得发展，仿制外国机器、设备和产品，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清末劝业道的官方文书中有许多云南人发明（仿制）各种机器申请专利的文件。某县一乡民发明了一台由多个齿轮连动的脚踏通绳机，据称能提高工效若干倍，当他将设计图纸、说明书呈至劝业道时，很得赏识，当即命劝业局机器厂试制。这一时期，水电



业石龙坝水电站，制革业陆军制革总厂和云南制革厂，火柴业丽日、云兴、复盛、利华等公司，卷烟业天森茂、南洋兄弟、亚细亚等公司，官营制币厂，印刷局等地方民族企业纷纷创立改革，引进外洋先进技术，进口原材料，用发展自身的积极行动抵制洋货的侵蚀。这一行动一直延续到抗战前夕，新兴了一批有影响的民族工商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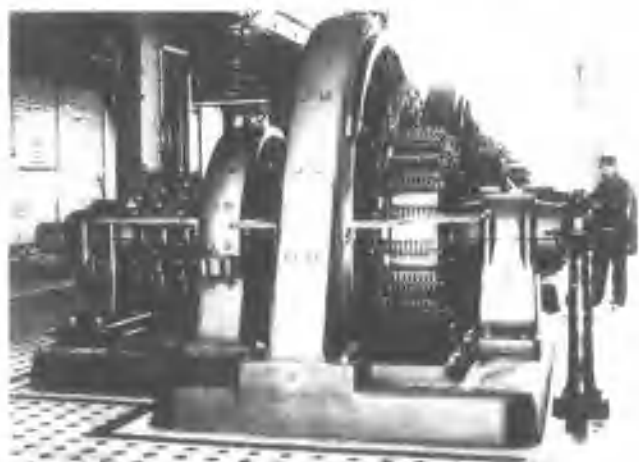


## 实业救国的丰碑——石龙坝水电站



1912年，在滇池出海口附近的螳螂川上，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电站。虽然装机容量仅460千瓦，但实现了中国人将水能变为工业电能梦想，成为中国近代水电事业的鼻祖。昆明从此有了电力供应和电机加工业。相当一部分昆明人告别了豆油点灯的历史。这一敢为天下先的举动被真实地记录在档案中。

滇越铁路修通后，英法对中国的经济入侵加剧。为防止水电资源落入外强之手，杜绝英法垄断云南电力资源开发的企图，滇省主管实业的劝业道官员刘孝祚提出倡议，集股筹建“耀龙电灯公司”。他与云南商会会长王筱斋先生多次磋商后，决定由商会发起集股商办。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商办耀龙电灯公司在昆明成立，办事



石龙坝电站发电机及洋工匠图片





从滇池到昆明的人工运河——大观河

处设于升平坡。计划在滇池出水口附近的螳螂川上筑建石龙水坝设厂发电，并在电厂与昆明之间架设高压电线，通过设在小西门内的水塘子变电站，把电输往用户。报经省、部立案注册后，公司获准拥有25年的专利，即在此期间对本地区电灯照明业有垄断的权力。耀龙电灯公司推举左曰礼先生为总经理，具体负责电站的建坝设厂工程。6月初，左曰礼偕同德国工程师毛地士亚踏勘水坝及厂房地址，随即迅速招工备料，7月开始筑坝，1912年9月电站竣工发电。

石龙坝水电工程迅速建成发电，靠的是工程建设者为发展民族工业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电站创办中，耀龙电灯公司遇到了种种困难。工程所需技术、设备依赖德国西门子公司，建坝水泥又向法国公司购买。外商以种种借口拖延订货，“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司与驻省法商安兴洋行订立合同，订购上等红毛泥（即水泥）30吨，每吨价银大龙79元，连关税运



脚等项一概在内。并议定自立约之日起，以六星期交泥10吨。余下20吨，以不过三星期，即速运交清楚。”然而，“殊该行不顾信用，自二月二十三日立约至四月初四，始交来3吨零一桶，是该行已误期26天，而10吨之数又未交足”，直到“五月初六始行交来口袋红毛泥30吨。”尽管如此，交来的水泥还存在“有水湿掺杂”的情况。由于电站工期急迫，只得勉强充用，“凡有水湿成团之泥，均系雇工冲用，然十成只能当三成之用……”因法商拖延水泥交货时间，使耀龙电灯公司蒙受很大损失。同时，清政府对公司引进的设备征以重税。当耀龙电灯公司向德国礼和洋行订购的“全副水力机器”由海防运抵昆明，“除机器成本纳税外，须再接海防至省城过税银若干，又车费若干，此项税费共合若干，要加入成本收税”，耀龙电灯



1941年10月石龙坝发电超过100万度纪念





石龙坝电站建成后，由西门子公司提供的灯具图式

石龙坝电站的成功兴建，得力于当时有识之士刘孝祚、王筱斋等的大力提倡和左曰礼先生的积极推进，更与电站建设者的忘我工作分不开，它是我国第一代水电工程建设者创造性劳动的杰作。

公司深感“税上加税，不免重征，商情何堪，于情理未协”。因而呈请豁免。此外，还有股东拖欠股款，电机笨重运输吃力等种种困难。但尽管如此，千余名工人“踊跃从命，年余来不避雪雨风霜，亦不计年节星期……崩山炸石，不顾危险，分段赶做，猛力进行”。终于完成电站兴建工程。至今电站仍能发电运转。



石龙坝电站的修建，其发电设备及输电、变电，乃至照明用的灯具皆来自德国的西门子公司

## 云南首家卷烟公司 ——天森茂纸烟公司



清末，在我省兴起的众多的民族工商业中，李松茂、吴天定、李寅生、李润之四先生组建的云南最早的卷烟公司“天森茂纸烟公司”很具代表性。

当时，随着滇越铁路的兴修，蒙自、腾越（腾冲）、昆明商埠相继开通，中外贸易逐渐频繁，洋



云南商务总会有关天森茂纸烟公司出品香烟品牌注册的移文

货风靡一时。长期闭关锁国使云南“土产”商品很不适应突然开放的局面，一开始就处在极为不利的地位，商品利益尽被外洋占去。档案中载：“我滇僻处边徼，风气晚开，一切制造之精、工艺之巧，无不曰外洋颇称新奇，于是物品、食品以及诸消耗各品，不惜巨资争相购买，不知利权外溢，人民日形穷困于不觉。”在此商业环境下，云南有志的民族工商业者，抱着振兴实业，救贫脱穷的强烈愿望，决心改良“土货”将其外销他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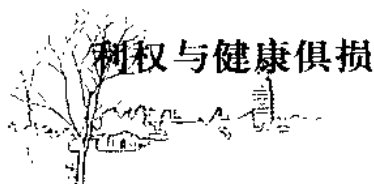
创办自己的民族工业。

宣统三年(1910年),因“日击时艰,查外洋纸烟一种,滇省每岁流出金钱不下数十万两,漏卮诚大……”李松茂等人认为应联结团体,借群策群力,拣选本地出产烟叶,仿外洋制法,造就纸烟,才能与外国纸烟竞争。于是“纠合同志、暂集股本伍百圆,以十大圆为一股……”,在省城昆明城内东寺街的当铺内开设股份制“天森茂纸烟公司”,以松鹤为注册商标,准备试办3年,待“著有成效行销路广”后,再添集股本扩充商业。并将最初集股作为“优先股”,以后加入的股金则视为“普通股”。公司成立不久,李松茂等人即着手组织研究开发新产品,对“所需资料悉心研究”。在推出新产品之前考虑到吸烟影响人的健康问题,他们结合中医药的理论在新产品中“加入宽中利气之药,俾食者有益卫生,较之外洋纸烟含吗啡为害极烈,不啻霄壤之分”;在卷烟工艺上,立足于土货的生产方法,同时不断改进,向国外新产品靠齐,所有纸嘴纸匣,暂用土法制造,日后印花板出,其装横比诸外洋尤臻美备。最初研制了五个品牌的香烟,即“波寇香烟”、“肉桂香烟”、“玫瑰香烟”、“兰花香烟”、“金橘香烟”,均为五百支一箱,出产价格分别为大龙元二元伍角至一元不等。样品试制出来后,通过云南总商会移送劝业道申请立案。劝业道官员袁玉锡在立案申请上这样批道:“本道考验得各种纸烟,虽未能步武洋外,如能于香味色及制造装样各法再加讲求,精益求精,亦足以渐谋抵制,少塞漏卮。惟肉桂一种,其味辛辣,是否公宜,尚宜细加研究,其余波寇、玫瑰、兰花、金橘数种,应准立案,以广销售点……”天森茂的卷烟基本上得到官方的认可。由于天森茂卷烟品种独具特色,与外烟相



比“价廉物美”，在当时很受一般平民欢迎。天森茂纸烟公司虽然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但它是云南近代卷烟业的开创者，比创造著名“重九”牌香烟的以庚氏家族开办的烟厂要早十多年。





## 利权与健康俱损

蒙自、腾越、昆明开设商埠以及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云南本地烟草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云南的香烟还没有任何名气。各色洋烟滚滚而至，给烟民健康造成极大威胁。那时流行于市面的洋烟品牌主要有英美烟草公司的“红脚板”、“三炮台”、“司令”、“老刀”牌卷烟；日本的“小孔雀”、“荔枝”、“美人跳舞”、“钱龙”、“花菊”、“云龙”等数十种。为争夺中国市场，烟商们动用报刊等宣传工具，大做广告。从英美烟草公司三则广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竞争场面。《滇声报》民国3年（1914年）12月9日载：“请看！活边香烟出现，附送贵重赠品。此烟现已上市，每包附送赠物券一张，按券数多少，敬赠物品，诸君购烟时，务必留心封条有无破烂，勿使利益落在他人之手，若蓄得此种品券者，可携向滇垣南关外新城铺本公司仿售货处，照章互换赠品，勿失机会为盼”；同年12月30日载：“红脚板香烟，又名飞脚板。此烟乃埃及国上等烟品制造，价廉物美，气如兰桂，一人呼吸满座馨香，诚能辟秽除氛，久为识食所赞赏，诸君请尝试之，各处烟铺均可购买”；《义声报》1916年11月8日载：“快买三炮台，最高等香烟，三炮台烟气味醇香，价亦从廉。此烟装潢分为二种，一种为五十支装铁罐，一为十支装铁盒、纸盒。每装之内，原附有赠券一张，如积二十五张者，可换孔子真像一个，或积至一百张，可换美人画幅。吸烟诸君祁蓄积携来互换可也！”外国公司为推销不遗余力，甚至以赠送“孔子真像”、“美人画幅”为诱饵，钓烟民上钩。



在巨大的利润推动下洋烟销量不断增加。民国9年（1920年）进口6 715万支；次年增至10 760万支；1928年激增到21 390余万支。洋烟入口给云南人民带来的危害，当时已经引起注意。民国2年（1913年）就有人评说：“……其有漏卮尤大，于人类匪为无益，毒害最深者莫如纸烟一项。本省人口，据最近调查报告，总数男丁四百零四万二千一百八十有奇，女丁三百五十二万九千七百三十有奇，除女丁不计外，其男丁之吸食纸烟者，省会多而各属少，城市多而乡村少，兹平均以百分之一计算，吸食纸烟者，已有四万零四百三十余人，每人每月平均至少以纸烟费银七角计，每年共需纸烟费二万八千三百余元，而附属之烟嘴烟盒、火柴等费用尚不与焉，纸烟之足以妨害卫生，其毒之中于人也，较鸦片尤烈，而为漏卮之一大宗……”

从这份官方文书中，可以明显看到，虽然当时烟草还没有深入普及，但外国卷烟的倾销严重侵害了云南人民的权益。不仅使云南地方烟草工业发展受阻，经济利益受损，同时还影响了人民的健康，侵蚀着人们的生命。



## 清代知府的市场意识



清朝末年，清政府全面禁绝烟毒，云南可谓“民穷财尽甲于全国……”。土地贫瘠，环境恶劣的东川，经明清两代开采，名噪一时的铜矿已临近枯竭，造成资源匮乏，人民生活更为困苦。宣统元年，东川补用知府严庆祺苦思冥想，得出“唯有振兴实业”的“补救”良方。据档案载，严庆祺从“中国固有之道”提倡蚕桑入手，认为“利博效速者，厥维蚕桑”。通过深入调查，他了解到东川府不能广植桑木的原因在于“民之鲜种桑者以无利故，桑者之不获利以无蚕故。使人乐种必使人知养蚕，则桑叶可售利之所在，劝种而自无不种”。于是，开设女子蚕桑研究所，重金聘请两位女教习，招收城乡妇女，教导她们“饲蚕抽丝”。



昆明街头即景(1889—1904)



挑草鞋进城出售的老汉

不出半年便有六十多名女学员毕业，还“缫得净丝八百二十四两”。一般劳动妇女懂得了蚕桑的好处，于是“民间皆知天时地土宜桑宜蚕，咸乐兴办……”一时间“……莫不致力于桑，报名领种者现已纷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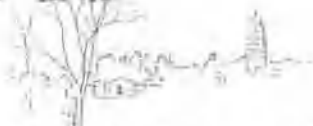
严庆祺还因地制宜兴办工艺事业，由东川府垫款设立东川劝业所。因“困于财力，成本无多，且工艺二字范围极广”，“不就本地原料着手，而徒事铺张，则亦劝不胜劝。若原料皆取诸他地，是我增一工艺适为他人增一销场，仍于地方无补……”劝业所以“务取本郡原料而发育制造”为宗旨，调查分析当时社会需要。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各种新式学堂纷纷成立，对粉笔、石板均有大量需求；而设官印局带动的新兴印刷业的崛起，“各署局所通行的文牍章程与夫各学堂讲义莫不用誊写版刷印，即莫不用油墨……”。云南多赖于从上海购买这些外洋新产品，几乎不自行制作生产。经过半年的调查生产，研究制法，制成了粉笔、石板、油墨、草帽、滤水砂罐、铜匙、火漆等产品。



劝业道查验东川生产的样品后，深为赞赏，当即表示“本道当为力拓销路，藉资鼓励……”，致使大部产品销路甚好。

严庆祺在提倡实业时采用的让人民知其利而后推广蚕桑的办法和兴办工艺原材料的选择中所独具的经济思想，初具市场经济意识，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县令作弹词推广蚕桑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因素，云南特产“云上”烟膏的品质，口味可称土中上品。曾经一度，罂粟花开遍了云南大地，也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大烟流毒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灾难，清王朝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就开始提倡禁烟，时至清末，禁毒政策日趋严厉。怎样既不种大烟，又能保证利益呢？当时的云南地方官从中国传统农业中寻求出路。于是选中推行蚕桑办法。为了推广蚕桑，各级官吏煞费苦心，想出各种办法，有向乡民张贴

告示的，有在各县组织桑蚕讲习所，由官方提供桑籽蚕种的，有编印种植桑树方法到乡里演讲的等等。武定直隸州知县秦益裁编写了一篇《蚕桑弹词》，从中国人



武定州直隸州知县秦益裁所作《蚕桑弹词》

养蚕的传说、历史入手，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向人们介绍植桑养蚕的办法。针对云南妇女参与农事较少的现实，特别强调了妇女在养蚕中的作用，引导云南妇女用自己的双手建立富裕的生活，很有代表性。

弹词开篇道：“滇人喜种烟，种烟那及种桑钱；滇人喜养鸟，养鸟不比养蚕好。种烟违禁祸家门，桑成美利及儿孙；养鸟终非救穷策，养蚕成茧夺衣帛。劝君趁早务桑蚕，蚕桑致富敌仓箱……”，“盘古时人们如兽赤身裸体，黄帝出制衣服未有丝纶。帝后宫元妃氏号曰西陵，始养蚕取丝茧利传至今。西陵氏要算得女界奇人，论蚕室供养的马头娘神，相传是蚕女父被擒，女母言能救父许以女身，马闻言寻父返，父突变心，留其女杀其马晒皮中庭，怒卷起女去化作蚕形，帝喜女不忘义列为仙宾……到后来儿女界以此为勤，有莘女因采桑节义留名。那多人都把这蚕桑认真，可该是妇女辈，独传技能。倘女界不养蚕奚自谋身……”甚至说“妇与女赖此救穷，能养蚕能抽丝有始有终，件件会，那妇女也算英雄。”童益泰原籍江南水乡，“夙谙蚕事”，对地方情况也很了解。因而编写的弹词对乡民很有说服力，作为封建时代的县官，能亲自作弹词“教化乡民”，提倡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与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社会潮流分不开。当时提倡种植桑、棉、油桐等经济作物以抵制人烟泛滥，也为今天农业生产提供了发展传统生态农业的经验。



## 建水举人兴办火柴厂



云南省档案馆所藏清代劝业道档案中有一组公文，记录了临安府（建水）范姓举人创办火柴厂的史实，读来十分有趣。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初三，云南劝业道道台刘孝祚收到兴业公司请求公款补助的禀文，称他们所办的一家已见初效的火柴厂遭到火灾，几年心血化为乌有，为重振事业，特别向云南劝业道伸出求助之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临安举人范彭龄同生范嵩龄兄弟和附生朱效文等有感于“吾滇实业不振利权外溢”，为“抵制外货而稍挽利权”，开始谋划在建水筹建火柴厂。经考察认为“临安之边地森林繁茂，可为造火柴之料”。这年冬天范氏兄弟前往上海调查，得知我国“所销之火柴”多为日本货，且制造方法“颇便利”，于是决定范彭龄回滇筹备资本准备建厂，范嵩龄东渡日本进一步学习相关技术。3年后，范嵩龄学成回国，带回在日购买的机器。他们很快用“二万元”资本作基础成立了临安兴业公司，开始试造火柴。因资本不多，暂时无力自建厂房，利用天君庙的后殿作厂房。试造过程中，“随时研究改良”。到1910年，该公司造出的火柴可以“媲美日货”，又因价廉“颇得商界欢迎”。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一场大火从天而降，“不料三月二十日，有胡姓在庙内请客，被女客混入女工厂内，取柴枝试擦，将地下之柴枝燃着，一时延烧满屋，加之大风助火，遂将庙宇烧去两层，货物、机器亦烧毁尽净，约计值三万余元……”。

范等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积极想法再振重



来。他们想到了刚刚设立不久的主管工商实业的云南劝业道，因而有了前述请求公家补助的禀文。劝业道非常重视，立刻禀承云贵总督李经羲，“据该公司因火柴延烧损失资财，良为惋惜，该举人等志不稍衰，谋整旧业、实业家之精神，固宜如此振励。惟借公款照章亦需实产抵押，不能空借。仰候建水县查察情形，禀复核夺。一面招集绅商劝集股本，再资整理以维实业……”。李经羲批文没有同意范举人他们的补助请求，但却准许公司立案注册，以此行“获利既丰”为由，让其广募商股再整旧业，实为可行之法。此事虽公文上下历经3月，至1910年9月方得以解决，却反映了当时官方鼓励实业的积极态度。

建水历来是文人汇集之地，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现举人同生们开办实业，对于后世学人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 金碧路三十年变迁



滇越铁路即将修通之时，应著名士绅陈荣昌等的要求，云南省府在昆明城南三市街与新设的火车南站（塘子巷）间的南教场附近开辟商埠，重修广聚街（今金碧路）从三市街至聚奎楼一段，一改过去昆明城内“非但人稠地狭，且道路亦多不平”的状况，成为当时昆明市最为平直的街道。宣统元年（1909年），有一职员周成珠谋划设立昆明第一家“东洋人力车公司”。档案中有1909年9月7日周成珠联合曾昭文等职员向云南劝业道提出要求成立人力车公司的禀折。禀折中说：“窃查滇省远居天末，风气未开，附郭（指城池）内外仅



民国初年洋包车与牛车同时在金碧路上出现





经历主动升级的昆明金碧路(20世纪40年代情形)

有肩輿(即以轿子)代步,其污秽即属不堪,索值又复昂贵,以故乘輿者(坐轿子的)固有之,而徒步者仍居多数。现在滇越铁路将达省城,转瞬开车,人烟日见辐辏,行旅往来尤伙,仅恃肩輿代步更多不便,东南门外道路宽阔,地面平坦,行车正属相宜,竟无人出面倡议,诚为缺点。职等现集合股本组织东洋人力公司,先购车五十,其开设车厂,招募少壮贫民,在城厢内外大街一带拉行,贫乏者即可藉此谋生,而行路者亦无徒步之苦,诚属有利无害”。劝业道官员刘勤慎非常重视,一面与巡警道移文相商,一面禀陈总督衙门,很快得到云贵总督的批文:“禀悉。日本人力一车,费轻制巧,各省商埠仿造通行,颇称便利,该职员等欲组织公司购车设厂,以开风气,事属可行……”就这样,随着金碧路的拓修,单靠肩輿代步的昆明街上,出现了新式代步工具人力车。

自清末改修广聚街后,民国初年(1911年),“三市街、敦义街(今金碧路西段)至滇越铁路一段……改建成碎石马路”;1917年昆明市政公所,市政府修整市内38条街道,包括金碧路。因工程进展缓慢在旧市府档案中留下这样一段记载:“查



三市街、金马坊一带议建市街案，早经规定，明令遵办在案，及耽延久不见动工，市政府执行不力，殊属不合。现据建设厅呈送该处民房图样前来核查，尚属适用，应即发交市政府，即速转发该处居民，照式即日兴工改建，俾壮观瞻，至迟在二十二年五月前一律修建……”。据《云南概览》载，“本市自民国十三后，即将商业繁盛之主要街道次第修为石块路，并为便利交通起见，将大南城拆卸改建。惟当时对于市街房屋尚未彻底整理，后因汽车之行驶，人力车辆之加多，仍感拥挤不便，至十七年本省政府成立，即督促市府再将市街彻底加以修整。撮其大者述之：……改造金马街、三市街。南北干道之南端延展为金马、三市街，直至得胜桥车站，地接滇越铁道，交通至关重要，原修街道狭窄，且铺面陈旧，特将



清末“金马”坊附近一段街道情形（1900年前后）



两街宽度展为五丈五尺，车道修为石块路，两旁修三合土之行人道，两廊铺面改建西式，并遍植行道树，浚修干沟，早经完工……”；1934~1935年间又对金碧路进一步整修，1936年7月5日《云南日报》载“…二十三年度……修理金马街石块路面——计面积五十七丈一十三方尺，修镶沟道九十二丈九尺二寸。修三市街石块路面——计面积三十三方丈七十一方尺，修镶沟道六十二丈九尺四寸……”，“二十四年度：继续修三市街——计修筑石块路面七十七方丈四十三方尺二十四方寸。继续修金马街——计修筑石块路面一百三十二方丈六十八方尺七十五方寸，修镶沟道二百八十六丈四尺五寸，……”30年改扩建，街名由“敦义街”、“广聚街”改为“金马大街”、“碧鸡大街”，民国时期昆明市公安局于1937年1月27日在《云南日报》布告改名为“金碧路”。



## 开放改变了昆明人的生活



现存许多档案反映出过去老昆明人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下的市井生活：平静俭朴，与世无争；住房多为平房，大多以几世同堂为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南门晚9时（今北京时间22点）关城，其他各门5时关城（今北京时间18时）；城内各坊、各栅子晚10时左右关闭，出入不便。

人们穿衣为布制，男子讨媳妇在布衫上加一件绸缎马褂。工商和士子在服装上没有差别，有功名的文人，头上戴个铜项子。农民也穿长袍，腰间加一搭布结起，不穿马褂。女子穿百褶裙加花边，着绣花鞋，装饰多为银器、玉器，戴藤手镯。民国以后才用镀金和金器作装饰。布多为土线织成的土布，洗衣只用白泥、炭灰等。

一般家庭平常只吃小菜，不吃肉。每月初二，



民初的“金马碧鸡坊”恰好处于昆明商埠区的中心





街头看西洋镜(1889-1904年)

十六两日吃肉打“牙祭”。普通人家每天吃二餐，家家都做些咸菜、腌肉、豆豉。馆子很少，早上卖豆浆包子，晚上卖饭面。亲友往来吃饭便加菜，一般吃四个菜：鸡、红烧肉、炒粉丝、鱼，都是大盘。节庆或长事，一般用六大碗，每六人一桌。讨媳妇一般用猪八碗。由于消费水平不高，物价很低。不论做工、店伙、衙门当差工资都叫“薪水”。一般店员收入八钱到一两二，衙门当差的分二、四、六、八两。八两已是较高的“先生”了。当时的房租，一间房子约合一钱银子；一斗米（一百六十斤）折合七八钱银子；猪肉每斤不到一钱，三文钱可买两个包子（一钱银合一文钱）。一般收入二两到四两即可维持四、五口人的生活。

昆明开埠和滇越铁路通车，加速了云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和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云南被迫由封闭转入开放，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和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变化。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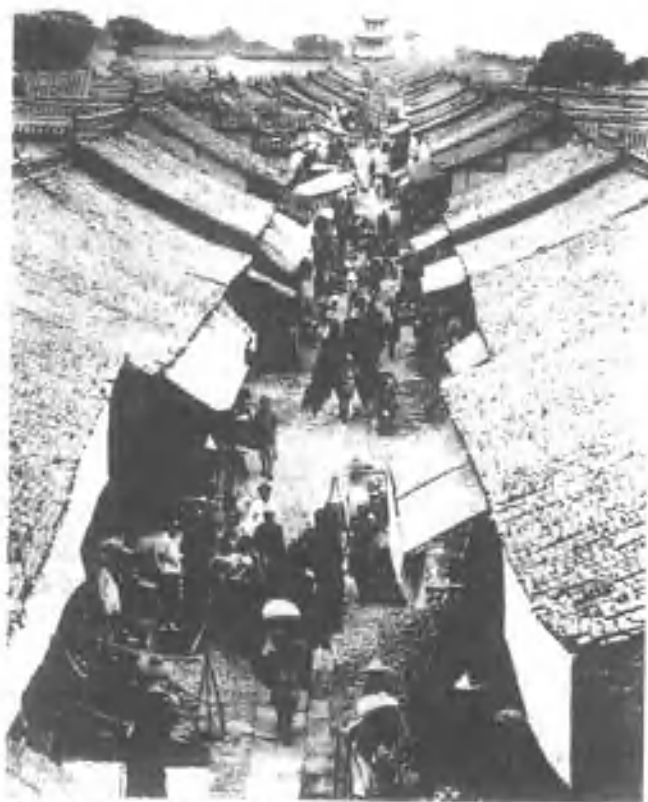


昆明街景

沿线和省会昆明变化尤甚。

交通方面，以前昆明到内地，先从陆路至中越边境的蛮耗，再由水路由越南海防转达香港上海，行程二个月以上。滇越铁路通车后，一周就能达香港。经济方面，滇越铁路把云南的河口、蒙自、昆明三个通商口岸连在一起，铁路沿线的个旧大锡，弥勒竹园红糖，宜良大米运送省外和国外；石龙坝电站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发电输电设备，云南亚细亚烟草公司、宣和火腿公司引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云锡公司为提高大锡产量和质量购买的洗、选、冶炼、化验设备等由外埠运来，促进了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方面，大量洋货涌入，西洋生活方式渐渐传入民间。女子开始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当时云南不仅开设了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男女同校也已十分普遍。多年来被禁锢于深闺的女子开始走出国房，上街和参加社交活动，“粉白黛绿，弥





清末昆明街景(1886—1904)

望市中，电影戏院四座几满”。家庭观念上，不再以四世、五世同堂为荣，提出打破同居以养成独立生活能力的观念。

礼仪方面，见到长者以流行的西方鞠躬礼代替过去的跪拜。衣着方面，敦朴的风气为之一变，鲜浓丽服，追求时髦者招摇过市。其中以女子最

为突出，服饰争奇斗艳达到了顶点，连上海、武汉等大城镇来的客商都感叹滇中女子的奢侈与沿海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饮食方面，一改过去的俭朴习惯，喜庆宴客不是鱼翅就是海参。官家豪富宴客都改用盘子。价格昂贵的洋酒销量也很大。《云南游记》作者记叙1923年在昆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时，曾感慨：就洋榭设西宴款待，酒有五种，菜有十二样，丰盛极了。联想连日的西式宴席，非常叹惜云南朴素的风气已不复存在。住的方面，“风气大开，屋宇多取西式”。名噪一时的云南讲武堂和东陆大学的主体建筑都采用了法式建筑；昆明市区的主要街道三市街、金碧路、南屏街等两旁的铺面房屋均改为西式建筑。电话、电灯、自来水也进入了居民之家，汽车、自行车逐渐取代了马车和轿子。

随着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流行去土崇洋风尚，一些人“舍其旧有朴实之风而新学文明之化”，有些富有者甚至衣必革履呢羽西装，吃必西餐洋酒，住必西式洋楼，用必舶来品，以显其富贵和新派。富厚者竞相以挥霍为时尚，中产者也学步效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也随之改变，店铺关门时间由午后四时改为晚上十一、二点。体育运动会、读书看报、文明戏、电影等开始流行，随着商贸活动的增多和新的娱乐形式如电影的进入，夜生活开始兴起。

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逐渐在云南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并影响了更多的人。这是历史长河中云南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初始。

清政府为巩固政权进行的种种改革：洋务运动、组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等，直接、间接地引发了辛亥革命，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铁路风



潮，革命的直接导因；新军，革命的主力；留学生，革命的先锋……围绕推翻和保护封建帝制，中国政坛一时间风起云涌，云南虽然僻处边地，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反对帝制的战争中，走在前列，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回首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未停息，而每一场群众性民主风潮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能发现云南不落人后的事例，旧民主主义革命如此，新民主主义运动亦然……



## 河口起义初试锋芒



1905年，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杨振鸿、吕志伊、唐继尧等数十人建立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云南》杂志，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红土地上播下民主革命种子。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广州、廉州以及广西镇南关起义相继失败，革命党人退至越南河内。孙中山命黄兴联络周云祥临安、个旧起义（1903年）失败后流散边境的余部，重新集合300多人的武装，策动驻河口的清

军、铁路警察作内应，准备攻下河口进取云南。河口是滇南门户，与越南老街毗邻，是滇越铁路必经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政府在河口设有督办署，委派王玉藩任督办，河口知县王镇邦兼



一身农皮的满清官吏



清军军官

任副督办。并派重兵把守，修筑炮台，且配备德造装备，可谓易守难攻。档案载道，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日，云南按察使沈秉堃、粮储道增厚2人向云贵总督锡良呈报：“革命党首孙文，时在法属之河内海防一带，与粤犯梁兰泉、滇犯关辅臣招布党羽，暗接逆谋，希图潜入滇境扰乱”，后又多次密报革命党人动向。清廷与法帝密谋，调兵遣将，企图将起义扼杀于萌芽之中。

清廷的察觉并未影响起义进程。1908年4月



戴刑具的犯人(昆明)(1888-1904)

孙中山先生委派黄明堂总理事务，黄和顺、关辅臣协助，利用河口防军腐败，兵卒饷银入不敷出，生活困苦的情况，采用“外攻内应”的策略，由关辅臣等策动“凡带枪投诚者给银元一枚”。驻河口清军管带黄元贞、守备熊通及河口警察均愿意参加起义。4月30日凌晨起义爆发。200多名义军分3路从越南老街向河口发起猛攻。黄明堂率队攻督办署，清军部分营勇响应，兵力合约500人。清军管带黄元贞倒戈起义，守备熊通击毙副督办王镇邦，河口警察杀死局长参加起义。仅两小时义军就占领了河口城，缴获德式枪支千余支，子弹7万余发。在河口成立了云贵都督府。黄明堂以“中华民国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宣布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国家。义军很快扩至近万人，并得到河口商人、海防华侨的粮饷资助，准备沿滇越铁路向蒙自、昆明发展。黄和顺率军沿滇越铁路北上，关辅臣率部沿红河策应会攻蒙自。

面对义军势如破竹的进攻气势，锡良接到河





清廷与法领事商讨镇压革命党人的照会(前清云  
贵总督衙门档案)

口急电急忙上报清廷，同时“电飭蒙自道增厚、开化镇白金柱飞调蛮耗、开化防营分道驰援，”一面递飭近边各营“衔接进扎”。为开脱责任，将河口起义爆发的原因归罪于法方配合不力。清法之间互相责难并谋联合镇压之策。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同盟会云南支部发表《云南留日同志檄国内反对清政府借外兵文》，声讨清政府勾结法帝国主义镇压革命的罪行。李根源、吕志伊、赵伸等在东京倡议“云南独立会”，声援河口起义。宣布云南人

绝不受清廷支配，亦绝不受他国之干涉。云南同乡会派杨振鸿、黄毓成等20人携带捐款数千元赴河口支援起义。孙中山在新加坡任命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赶赴前线督战。5月7日，黄兴亲率一支部队攻进蒙自。因连日作战义军弹药缺乏，士兵疲惫无法再作进攻。5月11日黄兴返回越南筹集资金、弹药以备再战，至老街被法方截留并遣送新加坡。失去主帅的义军在强敌逼迫下撤回河口退入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包围缴械，全部押送新加坡。

5月26日清军占领河口，起义遂告失败。革命者与封建王朝的初次较量虽败尤荣，它播下的火种为辛亥云南起义奠定了基础。



## 讲武师生重九起义逞英雄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败，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为增强防御能力，清政府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基础上，开始改造陆军，准备摒弃大刀长矛，建立一支拥有近代火器的新式陆军。计划在全国“组练”36个镇，云南特准组练2个镇。至1909年，按全国陆军建制，云南建立的新式陆军一镇被授予第19镇的番号，兵员超过1万人，加上巡防队官兵总计超过3万人。

为编练新式陆军，云南陆军讲武堂应运而生。讲武堂位于昆明翠湖边，是一所既轮训新军及边

防营在职军官，又招考中学以上学生，培养下级军官的新式军事学校。1907年9月初创，陆军小学堂总办胡景伊兼任总办。次年2月开学，7个月后停办。1908年9月28日，云贵总督锡良重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创办之际，正值



讲武堂同人录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他们中同盟会员占相当大的比重，许多人在日本学习时就倾向革命。李根源在日本留学时就曾向孙中山请教过救国救民的道理，1905加入同盟会，并积极参加云南支部的筹建，曾任《云南》杂志干事。由他任讲武堂监督（续又任总办）兼步兵科教官，李烈钧、顾品珍、方声涛、赵时康、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刘祖武、李鸿祥、罗佩金等同盟会员都是讲武堂的教官。这样一来，云南陆军讲武堂大权从创办之日起就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同盟会有了几乎是合法的活动场所。

据资料统计，辛亥革命前，担任讲武堂教官和教职员的47人中，同盟会员有17人，革命派人士有11人，倾向革命的人士有8人。讲武堂的重要职务（如总办、提督、提案），除高尔登任过短期总办以外，几乎全为同盟会员担任。各班班主任、各兵科科长、主要教官、执事官



李根源(1879—1965)



杨希闵(1886—1976)



张开儒(1869—1935)



等也都是同盟会员或革命人士。学员中同盟会员也占有一定比例。讲武堂内还秘密进行同盟会员的发展工作，朱德便是在讲武堂学习时加入同盟会的。辛亥革命前三年里，讲武堂培养了数百名掌握近代军事理论与技术，品质优秀的毕业生。这些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投身到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共和的斗争中。

1911年因清政府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武汉三镇兵力空虚，革命党人借此千载难逢之机，策动新军起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辛亥武昌起义。起义一声炮响，震撼着沉睡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大地。

一时间，群山响应，地动山摇。在同盟会云南支部的组织、领导下，云南各界闻风而动，迅速融入到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早在1911年夏，罗佩金到上海与原云南支部部长吕志伊相会，吕志伊向罗传达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准备武汉起义的计划。罗佩金回滇后，与讲武堂几位同盟会员多次秘密集会，商议起义事宜。武昌起义比原计划提前爆发，但云南同盟会因有讲武堂秘会的筹备在先，没有手忙脚乱。从10月16日到28日，军内同盟会及革命党人连续召开了五次秘密会议，确立起义大计。10月25日下午7点至10点的第四次秘会上，蔡锷、唐继尧及与会者歃血为盟，在白纸上书写“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6个大字，火化后调于酒中，以结同心。10月28日下午10点至次日凌晨3点的第五次秘会，具体研究、周密部署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决定10月31日起义。10月30日晚8时许，昆明北校场第七十三标李鸿祥所部排长黄毓英、文鸿逵派士兵抬子弹，做起义的准备时，被北洋派的值日官唐元良发现，争吵中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唐元良，起义提前爆发。时为旧历九月初九，史

称“重九”起义。是夜，战斗异常激烈。起义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打死敌人200多人，打伤100多人。牺牲革命志士150多人，受伤300多人。讲武堂师生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最先攻入总督署等要地。辛亥昆明“重九”起义是全国各地响应武昌首义最为迅速的一次起义。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唐继尧、罗佩金、李鸿祥为首的讲武堂广大师生组建三支护国大军，成为统帅和骨干，促成云南护国首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讲武堂（后为陆军学校）毕业学员许多成为优秀指挥官，为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它不愧是“民主革命的熔炉”。



## 东渡扶桑的云南女学子



辛亥武昌起义向封建王朝宣战的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革命。他们乘船到上海，恰逢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在组织医疗队，部分留学生便加入进去。当时共有三队，推举上海总医院柯师医生担任队长，带队赴武汉。在汉口俄租界列尔宾路，利用万国医院新落成院舍创立临时医院。他们的到来为起义中负伤的将士减轻了痛苦，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据档案载，革命军与清军交战时，“红会特备小轮驶入汉水，于硝烟弹雨中抢救伤残。伤兵入院后，裹伤敷药，晨夕不懈。女看护对伤员照护周至，人人感激……”

这支队伍中有一位云南籍女生李俊英。她是这次救援队伍的组织者之一。当革命狂潮席卷而来之时，她心潮澎湃，扪心自问：虽为女子，扛枪打仗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作为国民一分子，岂能隔岸观火，坐视不管。于是毅然辍学回国，投身战事。她纠集

復電楊  
武昌烈士連珍教養所負責人俊英前此手札都讀悉  
日據亦當經電復准給事費於李普德等重漢款  
俾將款項昨也准惟念該女士奔走國事勞勩英  
常留後傷殆勉給普通全費他人不為援例漢  
教育司啟印

八月廿七日四時

云南教育司准給李俊英普通全費留學的電稿



数十名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筹措救护用品，组成赤十字会，奔赴前线。在前线她不顾个人安危，栉风沐雨，出生入死，为挽救义军生命，推翻封建王朝统治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正如1912年她在向云南军政府教育司申请再度回日本继续留学学费的禀文中写到：“窃生留学东瀛已历数年，毕业行有日矣，忽【闻】武汉义师勃兴，各省响应，斯时凡有血气者，无不欲效命疆场同仇敌愾。生自顾亦国民一分子，若披甲荷戈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至扶伤救死则责有在而义难辞，于是辍学归国，集同志数十人组织赤十字会奔赴汉口救护民军，披星戴月栉雨沐风，驰驱于炮火弥漫之中，周旋于血肉横飞之地，前后五阅月与战事相始终。迨夫停战议和方正式解散”。

然而，硝烟还未散尽，兵火仍在继续，经历了刀光剑影、激烈搏杀的山川大地，满目疮痍。当她看到战后“……一般阵亡者之子女尽失所依，父兄暴骨于沙场，室庐亦化为灰烬，无怙无恃，谁提谁携，三五成群，触目皆是。呼天抢地，形惨声悲，铁汉为之断肠，石人因之下泪，恐郑侠流民图尚未及如是之凄惨也”的场景，不顾身心疲惫，决心创造一个能让“先烈之子女萃于一堂，教养兼施，俾以成人”的地方。她复又“赶赴南京”，发起创办“烈士遗孤教养所”，欲将为民捐躯、战死沙场的烈士子女集中保护，抚养成人，告慰先烈英灵。南京，有才成立不久的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刚从海外归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新政府正在建立健全之中。此事立刻得到新生的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即承孙大总统、各部总次长、各军司令各慈善家极力赞成”。“广为捐助，获金貳万元”。李俊英承担起“总揽一切”的总理职责。她与合作者商议“从武昌兴办”，收集各地革命烈



上遗孤“教之养之，使之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以报诸先烈之于万一也”。她的一片赤子之心令国人为之动容，纷纷加入救护孤儿、教养育人的行列，为国家分忧解愁。武昌烈士遗孤教养所“纲举目张”一切步入正轨后，李俊英功成身退，“现民国肇兴共和确定，扶伤救死之责既已免除，教养之人亦不缺乏，生可以重行求学矣”。在得知同去留学的李毅如、李兰芬两位女生，辍学回国在家坐观事态发展，此时已获得云南教育司同意“以半费重赴东瀛求学”的消息后，才有了以上申请官费继续留学的禀函。

但云南教育司回函并不如愿，“武昌烈士遗孤教养所总理李俊英女士览，奉都督发下来函，经核议呈准照李兰芬例到东后津贴半费，俟考入高等师范在照李毅如例给全费。”同年8月3日李再函云南教育司请求全费留学，表达她的爱国之心和对政府的告戒：“窃以治国之道首重赏罚，从未有赏罚不明而国能长治久安者，伪清可鉴矣。今我民国告成，革故鼎新，岂可再蹈其覆辙，混乱黑白哉？俊英自武昌誓师赤十字会……发起烈士教养所……幸承政学商各界欢赞，今已成立于武昌，虽不敢云有功国家，有益社会，较之回家省亲，坐观吴越者似稍有分别……”

最后，此事经都督蔡锷亲批获准，“……惟念该女士奔走国事，劳勋异常，特从优待遇给普通全费。他人不得援例”。李俊英没有辜负云南父老的厚意，学成归来，又全身心地投入护国讨袁战地救护工作，那时她已是云南赤十字会的会长了。





## 民国开元与巴补梁山土酋禄金福内俯

重九起义次日（1911年10月31日），云南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义军礼送出境，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11月19日“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的电令”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名义向全省发布“告示”，宣布中华民国纪元以“黄帝四千六百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同时宣布“改用公历纪年”。云南省档案馆即藏有一份当年要“实帖”让民众“晓谕”的告示原件。

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权给边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一些边地土著部族主动来到云南军政府要求“内俯”，接受新政府的管理。禄金福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例。民国元年（1912年）5月，云南军政府收到东川府属金沙江外巴补梁山二十一寨土酋长禄金福率“蛮民”禄文义、禄玉使等各寨民要求“一视同仁抚绥内俯”的禀文称：“缘民人等世居东川府巧家厅属金沙江外巴补梁山各寨，界连滇蜀，宽广有八九州县之多，人口有二百余万之众。刀耕火种，穴居野处，以牛羊荞麦为食，以麻布羊皮为衣，山前岩则结草为庐，农工商业不惯习为久，被汰为蛮夷之列，民人等何甘异族，无奈满清设土司，除征敛镇压清兵鱼肉外，民人生命财产，从未代谋一事。学堂自古未有，自小不能学士农工商，只知刀耕火种，老死而已。地方人口渐加，衣食艰难，良民守分，暴恶为匪，所以抢掳、争斗常川不息。光绪十六年间，被满兵烧杀淫掠……光绪三十一年有蛮民





清末云南黑彝武士及头人

清末云南黑彝武士及头人

禄阿哈戕杀满兵，民金福邀众商议，护送汉人四十余人回内地，扣求保全生命分一清油，不料满兵不听，仍焚烧村寨数百处之多，抢掠子女财帛无算……”

云南军政府曾派人前往该彝族聚居地区“招抚并演说共和之幸福”。禄金福幼年读过儒书，常往内地贸易，通习汉语，知道“清朝官吏视蛮民为犬马”，彝胞世代居住的地方夹居滇蜀，五金矿产、山水田地、牛羊、药材、树木“俱备”，只是清廷的长期歧视政策，才造成形同“化外”的奇怪现象。深感“军府招抚之厚泽”，率众“鼓掌欢呼，跪祝中华民国成立万岁！云南军政府万岁！”他还跟随前往招抚的阮、何两位士绅一道“上省”接受都督蔡锷的召见，请求“内附”是顺理成章



清末的云南少数民族——一个黑彝首领

之事。这也说明铲除封建建立共和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



## 傣族革命家干崖土司刀安仁



甲午海战惨败后，滇西永昌府腾越干崖第二十一代世袭土司刀安仁先生，对清王朝的腐败深恶痛绝，决心弃官出洋寻求出路。

1904年，他托病经缅甸前往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读书。在那里结识了著名的革命家吴玉章先生，在吴先生的影响下，经常参加在日留学生的活动。当他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对留学生的长篇演讲之后，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云南少数民族中第一位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对这位世袭的傣族土司能加入革命阵营非常高兴，十分器重，鼓励他回到西南边疆，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真理，宣传革命，组织力量。1907年初，刀安仁奉孙中山命返回腾冲干崖继续任土司，同时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同时不遗余力地推动边疆民族经济的进步。他从日本返回腾冲时，专门带回先进的纺织机器，聘请四位日本技工直



腾冲刀安仁办织绸厂

接指导缫丝织绸。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永昌府腾越同知温良彝曾给云南劝业道袁玉锡申文：“据干崖土司刀安仁声称，前游学东洋购回机器，在司署设厂开办，今试造成效，合将式样申请转报。计申颜色胡绸三小疋，丝绸一束……查该土司倡办机厂，十分热心艺业……”。他得到在腾冲聚结的居士、黄子和、吕志伊等30余位著名革命志士的支援协助，开办土民学校，兴办农场，试种橡胶、种植水稻等等。辛亥革命爆发，刀安仁先生即与张文光一道组织云南腾冲起义响应，在辛亥革命中建立了功勋。

辛亥革命后不久，刀安仁先生遭到地方势力的排斥陷害，北洋政府以所谓“判国罪”将他打入监狱，虽经孙中山等人多主力保，冤案得雪，出狱后的刀安仁被委任陆军部咨议官，但因长期奔波劳累，心力交瘁，1913年3月年仅41岁的刀安仁在京因病逝世。孙中山先生得知他的死讯后非常痛惜，在京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根溯源会，并送上挽联：“二十年革命成功，忧患与同，安乐莫共，鸟尽说弓藏，榷车就擒悲邓艾！三百日缲囚初释，奇冤虽雪，沉郁已深，头蛇尾豹死留皮，在疑谁为颂陈汤。”刀安仁先生的兄弟将其骨灰送回干崖，当地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集会纪念这位傣族革命家。他献身家乡建设、献身革命的精神永远值得傣族人民骄傲。



## 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封建统治结束和封建思想消失，封建土司制度在云南仍有强大势力，档案中关于武定环州乡民状告土司李自孔一案充分说明这一点。云南土司制度源自汉代羁縻政策，始于元代，盛于明代，衰于清代。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土司权利的增大又与中央集权相抵触，“改土归流”就与土司制度同时成为封建统治者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政策。时至民初全国大部地区的土官已经改流，但云南部分土司仍然拥兵自重，势力强劲，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武定环州乡土司李自孔先辈李魁衡，明末由川来此，充当哨官，或有军功，得以世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地方县令多所庇护。民国2年



近日楼前的护国纪念碑



(1913年)8月,云南省议会接到一份按有四十一村村民手印的特殊的状纸“请愿公诉书”：“现承袭之二李自孔等,生性贪暴,淫威压制,除正粮加征外苛派佃谷、佃席、佃银名目更繁,比户磋磨,较昔更苛。无论何村,养有良畜随其所取,稍有不意,辄遭黑暗,何如牛马……”。名目繁多的苛派和敲磕,使乡民不堪重负。以哈莫下村为例,该村“共计夷民二十余户。正粮项下:年纳该土司粮银十三两五钱。杂派项下:隔撰佃银二十五两;尝新谷一石七斗五升;年派黄豆八升;蜂蜜四十斤;麻布一百二十页;火麻三十斤;例规谷三石五斗二升;猪膀八个;公鸡三十二支;每日派青草四背;夫役五十名(到土署供差,自备伙食,如同牛马)。以上十一柱均系闲职土司李大少爷苛派也”。同时又有“佃谷一石五斗;佃席九十席(每席折谷一斗);管夫谷三斗;管夫鸡二支;老总谷二斗。以上五柱均系该土署各头目等之苛派”,“本年因讼敲磕项下:三月初十日,该土司嘱令头目杨小增率领恶党唐有德、王绍芳等百余人到村,各执枪械将什长李正耀、邬际春二人锁押送署,非刑拷打,索去银五两,折洋烟银三两三钱五分,铜钱六千二百文。后将银钱结清始放回。”状纸又举骂拉左村为例:该村仅八户人家,土司李自孔杂派除正项粮银若干两外还有十三项,加之各土目十六项苛派,凡乡民家中有的,田里产的“尝新谷”、“包谷”、“磨姑”、烧酒、辣子、糕粮、保伙羊、黄蜡、保伙银、马料、马草、猪头、猪膀、松子、木耳、秤粮银、管马银、折夫钱等等均被列入,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此外,不时派恶党持械到各村滋扰生事,借故敲磕银两,任意追杀乡民。村民们哀叹“伏思杀人者不填命,国家之律例空存!牧民者不养民,朝廷之法纪安



在？”百姓惨状跃然纸上。这次挑头状告土官的村民有刚刚经历辛亥革命的退伍军人，他们在接受了新的民主思想之后退伍回到土司地区后，对于土司们的苛刻再也无法逆来顺受，他们开始维护自己的人生权利。此案自民初起诉，至高院结案迁延十数年，以乡民们的胜诉告终。



## 云南妇女缠足解放运动



在中国汉文化的传统风俗中，妇女缠足确属陋俗。相传这一风俗因五代时期的南唐后主李煜欣赏后宫嫔妃纤纤细足而起。李煜名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谓家喻户晓。然而，恰恰就是这个亡国之君的一时心血来潮，竟演绎为一种流传千余年的陋俗。直至20世纪初，一场由官方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终于使历史翻过了这痛苦的一页。

从档案中当时大量官方文书看，说明云南解放妇女缠足运动早于全国。民国2年（1913年），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云南地方政府军都督府民政长罗佩金便颁布“云南通省妇女缠足惩戒令”11条。规定滇省妇女15岁以下者“未缠足者不准再缠，已缠足者立即解放”。对违反规定的妇女限期解放，否则按照五个标准每月科以罚金，各县天足会检查后交警执行。应放足妇女受罚后，若能“锐意解放”，可随时报请天足会检查明确而免除惩罚；经受罚二年半仍不肯解放，除永远照令罚金外，不准入女子学校，已入者斥令退出。虽然



民初省议会禁止妇女缠足条例。





保山县禁缠足总切结

这项法令因当时省议会闭会而未得通过，但1916年省议会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女子缠足惩罚条例”18条，可见当时云南地方革除缠足陋习的决心。直到1928年，南京中央政府才向全国颁发“禁止妇女缠足条例”，比云南最早颁布的“禁令”晚了15年。

在云南这样一个边疆省份，移风易俗革除封建陋习能够领先全国，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的。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列强对南亚、东南亚的入侵，英法势力很早就以传教、游历等借口深入云南城乡；而滇越铁路的修筑与开通，西方商品经济、文化思潮也开始影响云南的人生活；加上清末云南派遣大量留学人员，他们学成归来后，助长了新思潮的流行。人们开始渐渐认识到缠足与吸食大烟一样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1918年广通县令段世璋发布的告示颇有代表性，“因为中国的男子爱吃洋烟，妇女爱裹小脚，男女都是好吃懒做，不及外国男女勤俭，中国才一天一天贫弱，外国一天一天的富强。几十年来中国才醒悟



明白，所以禁洋烟、禁缠足是最要紧的事……”他还说：“大家妇女要想帮助男人振兴家业，或由男人出外苦奔前程，一家子享受福泽，非从赶快放脚做起不可。等到不长小脚，大家便利的时候，你们才晓得县长说的是好话，不错哩！”

到1933年，云南地方政府仍竭力推行，颁布了“云南省严禁妇女缠足办法”22条。1934年，大多数县向省府出具“将境内妇女缠足解放完竣”的印结。自此，历时20余年的云南妇女缠足解放运动基本结束。由于这场运动，才使得后世很多妇女保有一双自由行走的天足。



## 梁启超草拟讨袁檄文



辛亥革命顺应历史潮流，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砸碎了人民头上的枷锁。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于1915年12月12日复辟称帝。25日，云南在唐继尧、蔡锷等领导下率先举起讨袁义旗，向全国发布《云南军政府讨袁檄文》。《军政府告各国书》等通电，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云南护国通电在护国运动中有着重要地位，它是后人评定这场运动性质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当年有梁启超先生在上海媒体“抢先”公开发表一策，后世史家对护国通电究竟出自谁手多存疑问。云南省档案馆“梁任公拟寄稿件（附任公来书）丁巳举义时卷”档案内，有两份发自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的函件，估计是经过越南海防。



护国军部分军官合影。从左至右：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垠（艾思奇之父）、护国军第二军军长李烈钧，护国军第一军军长蔡锷。护国军参议处处长程承琳，护国军参谋长罗佩金。





梁启超拟《护国讨袁檄》及《护国告左邻书》



护国公债券



护国军从昆明出师北伐

河内沿滇越铁路寄达昆明的。寄件人为“王某”，收件人为云南巡按使署政务厅长陈廷策（陈幼苏）。内附陈先生转唐继尧呈文：“顷接沪寄来任公拟布告友

邦稿，报特送呈钧阅。此上蒙公都督麾下。廷策谨启。”两份梁启超先生亲拟文稿的发现，不仅可以了却过去史界一桩公案，而且也揭示梁启超先生这一时期赞成共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思想。“讨袁檄文”写道：“……概自晚清失政，国命阽危，我国民念竟存之孔艰，痛沦胥之无回，共倡义举，爰建共和，统一需人，乃推袁氏。当元二年之交，举国喁喁望治，爱国之士，不惜牺牲一切，与袁氏相戮力，岂其有所私于一人，冀藉手以拯此垂亡之国而已。袁氏受国民付托之重，于兹四年，在政治上未尝示吾侪以一线之光明，而汲汲为一己一家怙权固位之私计，以阴柔之方略操纵党派，以狠鸷之权术蹂躏国会，以卑劣之手段诛锄异己，以诱胁之作用淆乱舆论，以朋比之利益驱策宵小，

以虚骄之名  
义劫制正  
人。受事以  
来，新募外  
债逾二万  
万，其用途  
无一能相公  
布。欧战发  
生，外债路  
绝，则专谋



云南护国军都督府

搜括于内：增设恶税，强迫内债，逼勒苛捐。更悬重赏以奖励掊克之吏，不恤民力，竭泽而渔，以致四海困穷，无所控诉。问其聚敛所入，则惟以供笼络人士、警防家贼之用，而于国务丝毫无与。对外曾不闻为国防之计划，为国际经济竞争之设备，徒弄小智小术以取侮于友邦，致外交着着失败；对内则全不顾地方之利害，不恤人民之疾苦。盗贼充斥，未或能治；冤狱填塞，未或能理。摧残教育，昌言复古；垄断实业，私为官营。师嬴政愚弱黔首之谋，尊弘羊利出一孔之教。法令条教，纷如牛毛，朝令夕更，自出自犯，使人民无所适从，而守法观念，驯至泯灭以尽……”在历数袁氏违背历史潮流，复辟帝制的种种不道之后，“檄文”表示虽然“某等或任职中枢，或滥竽专阉，为私计，则尊显逾分，更何所求，与袁氏亦共事有年，岂好违异”，但是“徒以势迫危亡，间不容发，邦之枹隍，实由一人，亦既屡进痛哭之忠言。力图最后之补救。奈独夫更无悔祸之心，即兆众目在倒悬之域，是用率由国宪，声罪致讨，翦彼叛逆，还我太平。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与画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



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下以徼福于国民，以析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此檄文稿经云南巡按使任可澄作个别修改后，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名义檄告天下。另一份文稿《云南军政府合各国书》中简述云南兴师讨袁原委，特别向各国通告：“凡民国四年十二月本军倡义讨逆以前与友邦所订立条约、契约，一切继续有效，本军所至即负保持该地外国人民商务、教务，并履行条约之责……”文告反映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也说明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连梁启超这位在戊戌变法中主张君主立宪的重要人物，也积极地站在共和一边。



## “五四”运动在云南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僻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各族人民对英法帝国主义在云南占片马、攫矿产、修教堂、输洋货的暴行有着切肤之痛。

1919年5月23日，《滇声报》报道了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27日转载了北京国民大会致各省各界电和《北京学生宣言书》。省立一中学生杨蓝春（杨青山）等人立即行动，散发《缘起》传单，奔走呼号，上街演说，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们起来声援北京学生。

1919年6月初，由省议会、总商会、报社联合会、教育会等团体发起组织，在昆明云华茶园内召开国民大会。场内挂有青岛图表，门口张贴“救青岛即所以救中国”标语。昆明地区10所中



金碧公园，学生当年集合的重要场所（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警察厅报昆明学生游行示威呈

学学生列队赴会，高举“还我青岛”大旗，手舞写着“力争青岛”、“誓杀国贼”、“挽回国权”、“头可断身可杀青岛不可失”的小旗，群情激昂。档案中记载，“是日开会时间定为正午十二时，未及十时，来宾络绎不绝，以学生为最多”。据报载，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约达万人。大会由云南省参议会议长李映川任主席，省农校校长张槐三、《救国日报》总编张天放、邓和卿等和8名学生共计14人登台演讲。言者大声疾呼，慷慨激昂；听者群情激奋，热血沸腾。至午后2时许散会，学生和群众数千人上街宣传和游行示威，表达了三迤民众反帝爱国的决心。

根据6月初国民大会的决议，昆明9所中学72名代表在三迤总会救国团内召开学生爱国会成立大会。选举杨蓝春为会长，定宗旨为“养成爱国精神，协御外侮”，并呈文报请云南省长公署立案。省长公署答复，成立爱国会“一则荒废学业，再则虚糜金钱，于演讲地点由会移就庙宇，于印刷各物则学校自为”。下令各校严格管制学生，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下发禁止学生游行的密令。爱国学生不为所迫，驳斥了省政当局的观点，重申学生爱国无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即公理，再请立案，依然按计划开展抵制日货，演讲宣传等活动。安宁、大理、腾冲、思茅、蒙自、昭通

等地的学校纷纷响应。陆续成立了分会并发表宣言抵制日货。

1919年9月15日,云南学生爱国会更名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云南学生爱国周刊》更名为《云南学生联合会周报》。迫于各方压力,代省长周钟岳终于在1920年1月批准云南学联和省内各分会立案。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国民大会、总商会及海关当局和学生爱国会合作,组织纠查队伍,检查商家日货进口销售。商家们“自此次风潮,遂天良激发。有向学生团自首者,有誓言不办日货者,有自将所有日货抬出焚毁以表示决心者”。54家大商号签字不再进日货,市场上的日货日用品几乎绝迹,棉纱火柴进口量大减,日本洋行倒闭。大规模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延至1920年5月。

这些唤醒民众爱国热情,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在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通过这次洗礼,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大地逐渐传播,吹响了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军的号角。



## 班洪抗英光照千秋



祖国西南边疆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阿佤山区。她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片英雄的土地，孕育了勤劳的勇敢佤族人民。半个世纪前，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世纪初的阿佤山区，称作葫芦王地，俗称野人山。分为上、中、下三部，隔潞江（即怒江）与缅甸为邻。这里地域广阔，纵横千里，森林茂密，物产丰富。富含金、银、宝石等珍贵矿藏。茂隆、波隆、募乃等地曾是明清时期著名的银厂。光绪十二年（1886年）英亡缅甸后，为扩大在华利益，继续北侵，越过潞江，把侵略魔爪伸向阿佤山区。1900年中英会勘滇缅界务时，英方蛮横无礼，不承认班洪等地为中国领土，将葫芦王地置于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内，并不断派遣传教士、暗探队进入该地，网罗教民，挑拨民族团结，培植亲英势力，为英国殖民者提供边疆地区的政治、军事、



班洪事件后接会代电



经济情报。

1933年，英国殖民者频繁地在阿佤山区搭桥修路，建立军事设施，并派大批军事及工程技术人员深入班洪、班老地区探采矿石，原属葫芦王地的永班、户班、班弄等部落的属地先后被蚕食。他们急欲侵占垂涎已久的茂隆银厂故地——炉房，多次派人厚礼收买班洪王胡玉山、班老王胡玉堂，均被严词拒绝。1934年1月21日，英军派兵进占炉房。以班洪、班老王为首的佤族爱国头人正告英人：“我们只服从大汉朝，地方也是大汉朝的，银厂也是大汉朝的，不得大汉朝的许可，势不能准你们开办的……你们好来好去就是了，若是不去，那就对不起你们了。”英军收买不成，又用机枪大炮演习示威，都未吓住佤族人民。班洪、班老王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一面派人向澜沧、镇康等县及耿马、孟定各上司求援，一面召集阿佤山各部落王开会，组织武装抵抗。他们剽牛发誓：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效忠“阿祖阿公”（佤族人民对祖先及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尊称），把洋人赶出佤山、撵过潞江，严惩勾引英人进入佤山的叛逆。2月8日（一说10日）佤族武装1 000多人与2 000余名全副武装的英国雇佣军队展开殊死决战。终因武器落后，屡战不利，伤亡惨重，班老寨子被焚毁，班老王及全寨男女老幼撤至班洪。两王据险抵御，决心与英军决一死战。同时急派人向镇康、耿马、景谷等地及省政府求援，请求“火速派兵援助，并接济一切枪械弹药粮秣，以救危亡”，第一、第二殖边督办也急电省府速谋救济方策。

班洪事件爆发的消息披露报端，一时间全国震动。上海、南京各大都市报刊相继刊登消息，发表评论。各大报派出专访记者到云南追踪报道。

在云南旅京同乡会的呼吁倡导下，全国文化界掀起了声援班洪事件的运动，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各民众团体、海外侨胞纷纷通电声援，向国民政府请愿，一致要求据理抗争。云南各地更是群情激昂，纷纷组织民众外交后援会、救国会等，声援班洪抗英斗争。1934年3月景谷县民众公推团防大队长李占贤组织西南边防民义勇军。李占贤激于义愤，当仁不让，倾尽所有家财作为义军经费。4月3日他率领1200余名由汉、佤、傣、拉祜、彝等民族组成的义勇军誓师出发，分两路开赴班洪救援，与佤族地方武装一道共同抗英。经过四次交战，先后收复炉房丫口寨、班老、新寨、湖广寨、老厂等地，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

边疆各族人民，尤其是以班洪、班老王为领导的佤族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大刀、长矛、铜炮枪等落后武器英勇抗击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和祖国神圣领土，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颂歌。



## 佤佧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



班洪抗英斗争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浪潮，迫使英缅不敢再轻举妄为。英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与中国政府商讨中缅勘界问题。

从班洪抗英战斗停息到中英第一次勘界开始，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佤族同胞的爱国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他们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结成具有广泛基础的坚强联盟“佤佧十七王民族自决会”，曾被英缅当局笼络收买的班况、班弄等部落王也加入这一阵营，积极活动，到处宣传佤族人民与祖国血肉相连，血浓于水的爱国情结，为中英勘界出席作证作充分准备。

1935年12月1日，由国际联盟选派的中立委员尹斯兰（Liselin）、中方首席委员梁宇皋和委员尹明德，英方首席委员寇来规（J. Glague）和委员革乐思（F. S. Grose）组成的“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委员会”（下称勘委会）在户板举行第一次会议，次日上界工作。



佤佧山佤族酋长印谱





佤族银腰牌、银核桃盒。

勘界开始，各王深感相互地域分隔遥远，方言不一，难以统一行动。1936年1月9日，班洪王、敢赛王、蛮国王、塔田王、绍信王、巩众王、上公基王、下公基王、业烈王、夏希王、南抗武王、木烈王、户勐王、布德王、班弄王、莫弄王、班况王齐集敢赛，召开自决会第29次常务会议改组自决会。决定“会内一概计划，概交请汉官主持；餉糈粮秣各项，均由各王担负供给，不至撤掣”。公推精通佤汉语言、在该地经商三十多年的爱国商人赵星寿担任会长，“会内一切军事政治两





佤族十七王告祖国同胞书。

部及重要事项，归会长主持，但各王曾经聘任各员，统归会长指挥，分别另委，以资统一，而专责成。”自决会致信国际联盟仲裁委员尹斯兰先生，陈述滇缅界务争执的实情，建议根据固有之疆域，以潞江为天然界线，代表国联公正裁决。明确表示，如果国际联盟未能阻止英帝国主义“奴求我人民，强割我领土”，佤族人民虽剩一枪一弹一妇一孺，必将奋斗到底。

首次上界会勘从1935年12月1日至1936年4月8日。此间阿瓦山区十七个部落王凭借熟知该地的“地形、历史、政治诸因素”，携带大量中国政府颁发的印信、公文、委状等物证，主动出席作证，向勘界委员会请愿，请求我国勘界团据理力争。2月2日，为了获得全国同胞更广泛的支持，自决会发出《佤族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倾诉阿瓦人民与祖国的悠远亲情，追溯近代祖国多难的历史，控诉英人种种侵略行径，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砍指誓决”：“誓断头颅，不失守土之责；誓洒热血，不作英殖之奴。”号召全国同胞在此勘界期间据理力争，以达“保全国土”之目的。文告一字一句，催人泪下，无不流露着佤族同胞拳拳爱国之情。

这次勘界，历时近两年，先后两次上界。佤族和傣、拉祜、汉等民族同胞的积极参与，使中



方无论人证、物证都远胜于英方。然而，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之国民党政府的软弱，英方委员的奸滑狡赖，仲裁委员尹斯兰的偏袒，使佤族人民“以潞江为天然界限划归中国”的心愿付诸东流。直至1960年7月中缅勘界会议后，班洪、班老等地才回到祖国怀抱。

从班洪事件到佤族十七王民族自决会，阿佤人民一系列爱国壮举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精神，极大地激励着全国同胞的声援和抗争行动，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向祖国内地的扩张阴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这段历史，一幕幕刀光剑影、唇枪舌剑的场面，仍是那么激动人心，成为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也将成为我们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巨大精神动力。



## 红军长征巧过滇境



1935年到1936年，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机智、巧妙地利用蒋介石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间的矛盾，避实就虚，胜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写下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强渡乌江，占领遵义。接着移师北上，渡赤水进入川南，准备在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深恐中央红军渡江后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急忙纠集40余万大军在川、滇、黔边境布防，并于1月19日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命滇军“扼守叙永、毕泸之线，并限二月十四日部署完妥”。龙云素与蒋介石不和，此时也有自己的打算，就是将红军堵于云南境外。万一堵挡不住，也要尽力使红军只通过滇东北隅转向邻省。因此，



档案中有关围堵红军长征的记录



命滇军加强镇雄、彝良等处防守，迟迟不发兵赴黔。后经蒋三令五申，龙云才命滇军移驻贵州毕节，目的仍在“掩护滇东”。面对川南敌人的重兵围防，红军于2月6日进军云南扎西（今威信），2月9日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决定乘虚再渡赤水，回师黔北。于2月16日又折回黔北，连克桐样、娄山关，重占遵义，一举歼灭黔军王家烈两师和中央军增援部队两师大部，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急令各路军严加防堵，赶筑碉堡，令滇军于毕节、大定扼堵。迫于蒋介石的压力，龙云只得令滇军布防大定，但又切嘱“万勿分散”，以集团使用兵力，以便移师滇东北护境。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的沿江防堵落了空，又调兵扑向川南。龙云对蒋介石的指挥混乱深感不满。正当2人各有打算时，红军已确定了摆脱敌军主力，绕道云南，渡金沙江北上的战略。接着挥师东向，四渡赤水，进逼贵阳。这一招使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令滇军赶往解围。然而红军进逼贵阳乃是虚晃一枪，滇军被蒋介石指挥东调，正合我中央军委意图。3月底，中央红军转而向兵力空虚的云南挺进。4月8日在贵阳以东的黄泥哨、观音山与滇军两旅接触，9日摆脱各路追军，于23日越过平彝（今富源）黄泥河，分两路进入云南。

红军入滇，滇军精锐远在黔中，蒋介石的中央军已应龙云之邀跟进滇省。龙云无力逆转红军迅速挺进之势，要使红军转向邻省的目标也未能实现，最忌讳的蒋介石“假途灭虢”却有了可能。因此，只求先保住省会昆明，然后再设法使红军出境。他接连急电孙渡，令其昼夜兼程回师省会。滇军大部回省之后，中央军和红军也相继入滇。



滇军既保护昆明，又防止红军南下，还可监视中央军，防其进窥昆明。5月1日，蒋介石命滇军二旅向富民大道前进，另外二旅向杨林尾追，龙云电蒋表示滇军掩护滇中，条件最好。为削弱蒋介石势力对云南的威胁，龙云煞费心机，拉拢驻防金沙江对岸的川军将领刘元璋、刘远璋。红军渡江后，5月7日川军刘文辉电请滇军“乘势跟追，即日渡河会剿”，蒋介石也一再电令滇军渡江追击红军，龙云认为与己无关而托词推诿。到5月10日，川境会理危急，刘文辉再请龙云派部渡江夹击，龙云更以“粮秣困难，碍难遵办”而袖手旁观。1936年3月初，红二、六军团先后由贵州进入滇东的彝良县，在以则河、法冲一带设伏，歼灭尾追而来的敌樊嵩甫部先头侦察连和一个加强步兵连，给尾追敌军当头一棒。然后急转西南，直插镇雄。途中，敌中央军已先占镇雄，红二军团指挥部得悉敌人将截击红军的情报后，便在敌人必经之道设伏。红军面对强敌，骁勇作战，不断主动出击，重创敌军。战后龙云急忙向黔省索取盘江八属地区，建议蒋介石将红军封锁于此。4月1日，红二、六军团奉总部指示，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突破滇军防线，复入平彝，向滇中急进。六甲之战再次给敌军重创，粉碎了敌人企图歼红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的计划。这一仗，也使龙云清醒地认识到滇军欲在境内全歼红军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打下去，势必要步黔军后尘。同时龙云也清楚红二、六军团入滇目的只在渡江入川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不会久留在滇，滇军只要跟追，使红军早日离滇，就万事大吉。所以，龙云在4月中旬以后就不再命令滇军与红军硬打，只令滇军紧跟红军之后，以迁升鼓励追击了。



红军挺进滇西，使蒋介石把红军消灭在滇黔边境和滇中的计划再次破产。蒋介石仍不甘心，要把红军消灭在金沙江以南的狭小地带，于4月21日莅昆亲自部署。在龙云陪同下，乘飞机到金沙江边视察，多次电令沿江各县毁坏一切船只和渡江器材，封锁江面，接着又令拆毁丽江东面的铁索桥，严令入滇各部加紧衔尾急追，并派飞机连续对红军进行跟踪侦察、轰炸。4月25日，红二、六军团冲破敌人的围堵，在金沙江边的石鼓会合。靠当地群众的帮助，找到了隐匿的渡船，在石鼓到巨甸120华里的江岸选择了5个渡口。两个昼夜，1万8千余名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蒋介石的部署成为一纸空文。龙云在红军过江后，为了防止红军回进滇境，令少量滇军在寻甸、德钦沿江要隘渡口筑堡防守，其余滇军悉数调回省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利用蒋龙之忌，巧妙部署，声东击西，渡过金沙江，开始新的征程。



## 红军藏民一家亲



档案中，珍藏着一份红二、六军团过中甸时留下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委任令”：“兹委任夏拿古瓦同志任中甸城厢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徕全体居民，并与本军采办给养，仰我全体民众一体知照。至本军全体红色军人，对夏拿古瓦同志应加以保护和帮助，不得稍事为难，是为至要。此令。主席贺龙”透出红军和滇省藏民的鱼水深情。

1936年4月28日，贺龙等率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摆脱国民党围追堵截，从丽江石鼓镇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县境内。中甸为滇省连接康藏的重要通道，亦是滇省藏民的主要聚居的地区。摆在红军面前的，有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的艰险路途；有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尤其是藏汉隔阂；有国民党“红军来了要抢走牛羊、杀人灭教”反动宣传的影响。可谓困难重重。为了消除隔阂，赢得藏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红军驻中甸边境的金江、上江一带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寺院。4月30日，红二军团前卫四师十二团进入中甸县城，在“通司”（翻译）的帮助下，宣传红军北上抗日反蒋的主张、纪律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红军是番民的好朋友”、“番民们，不要听信谣言”、“番民群众各安生业”、“优待少数民族，保护信仰自由”、“保护土司头人生命财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遵守纪律，买卖公平”、“抗日反蒋”等



标语。1936年5月2日，贺龙签发“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幸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道，毋得惊惶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如有不依军令或故意障碍大军通行者，本军亦当从严法办。切切此布”。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设在县城经堂（寺庙）两侧的耳房里，贺龙总指挥和军团首长都不进大殿，带头尊重藏族宗教信仰。广大指战员克服寒冷、缺氧、饥饿、疾病、水土不服等困难，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夜里，冒着高原的寒风露宿野外；白天，积极为群众做好事，热情学习藏语，和藏民交朋友。干部战士喝碗水、吃块粑粑都要高价付钱。有位红军战士枪走火，打死了翁水村腊咱列主家的马，红军领导亲自前去赔礼道歉，赔偿银元250块。驻大中甸阿努谷村的红军，为了给伤病员磨面，到8公里外的益松村阿斯家借了一盘手磨，用完后马上背去归还。二军团六师十八团一位司务长，在藏胞不大愿意的情况下买了两只羊，被关禁闭。藏胞们赶来求情，要求释放司务长。红军真诚为民的行动，深深感动了藏族群众，他们称赞“红军好，共产党好”、“天下的好人哪里比得上红军好”。积极为红军当向导、翻译；帮助红军找住房、买粮食、碾米、洗衣服、缝补子弹袋；有的把家里的粮、油、肉、糖、酥油送给红军。藏族中上层人士逐渐认识到，红军的一言一行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4月30日，中甸县宗教政治中心归化寺派喇嘛夏拿古瓦等入到红军总部进行会谈。为了表示尊重，



他们向贺龙敬献了“哈达”，贺龙等军团首长热情接待了他们。交谈中，贺龙得知寺院僧众对红军尚存疑虑，当即宣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作出明确解释，讲述红军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决心，并亲笔致书归化寺八大老僧：

“掌教八大老僧台鉴：（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决照价支付金钱；（五）请予派代表前来接洽”。

5月1日，夏拿古瓦带领归化寺八名喇嘛代表和各村差役，带着牛羊、青稞酒、酥油、糌粑等，手捧洁白的哈达，到红军总部慰问。贺龙、任弼时等首长亲自迎接，并回赠厚礼。5月2日，贺龙等红军领导一行40余人应邀到归化寺做客，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掌教八大老僧及30余名喇嘛迎接贺龙一行进到“直厅”（佛厅）。在破例为欢迎红军举行的“跳神”仪式上，贺龙将亲笔题写“兴盛番族”的红布幛赠送给归化寺，祝愿藏族人民繁荣昌盛。八大老僧当即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效力。5月3日、4日，归化寺僧众及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粮食、盐、糖等物资给红军。有的藏民把粮食无偿送给红军。仅两天时间，红军筹集粮秣约10万斤。夏拿古瓦等人为红军日夜奔忙操劳，为此，贺龙给夏拿古瓦颁发了委任令。在中甸期间，红军严守纪律，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赢得了藏族中上层人士及广大群众的理解、帮助和支持，部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为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藏区，应贺龙要求，归化寺还派出人马陪送红军。5月5日、



8日，红二、六军团先后离开中甸，继续长征。

红二、六军团过中甸，谱写了一曲汉藏团结、军民团结的颂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产生了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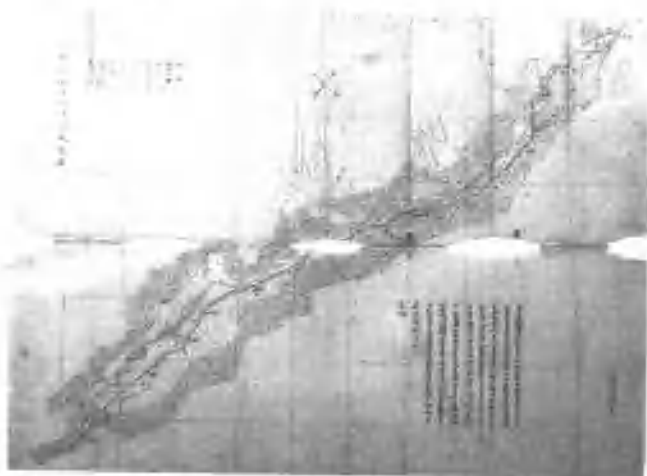


## 蔡锷将军再议南昆路



辛亥革命胜利后，全国政局渐趋稳定。新成立的云南省政府及官商各界深切感受到滇越铁路这一交通命脉旁落外人之手的痛苦。法国殖民者通过滇越铁路“……任意增加车费运价，强征过境税，沿途苛查行李，草菅旅客人命，留难本省公物阻其过境，……此中苦况，政府与人民备尝艰辛……”。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调阅“滇越”旧卷后，发动议修滇桂铁路，将筑路之事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1912年5月2日，蔡锷将军向北京大总统袁世凯，国务院以及广东都督陈炯明，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总督唐继尧发出冬日通电，请求由北京政府主持，滇、黔、桂、粤四省分段承办共同修筑滇桂铁路。蔡锷在通电中历数云南急于修路



腾冲至古力卡之“腾越铁路”线路图(清末)



之原因，“滇界緬、越，逼处强邻，自滇越路成，危机日迫，不唯滇緬铁路屡被要求，即滇蜀铁路亦有垂涎之象。前经滇省设立公司，亟图自办，而路长款拙，乞无端倪。滇中五金矿产之盛甲于各省，只以运输未能捷速，无人投资开采，间有集股试办者，每于销路不畅成本过巨，多所亏折。即各已办各矿：个旧之锡虽著有成效，但运送到港仍须假道越南，路权在彼，动招挟制；东川之铜则须陆运至蜀，始能改由水路，艰险万状，窒碍孔多，故目下存铜至数十万，行销极滞，凡此货弃于地，致启外人覬覦之渐者，皆由铁路不通，交通不便之故……”。他进一步分析道：“然熟审边地情形，滇蜀一线尚可缓图，滇桂一线尤为切要”。认为滇桂铁路“其路线由曲靖兴义百色达南宁为宜”，“……一则路线较短，成功较易，需费较省；一则滇粤交通互相策应，动员集中均能神速，则边远可固；一则与滇越路不平行，免滋外人口实，且离越较远，于兵事上甚为安全；一则滇、黔、桂三省之地可扩商业，可辟荒土；一则滇川、滇黔两线将来便于延长；一则东昭矿产便于转运。此路一通，则滇越一线之势力顿失，即可阻其伸张之势，并可徐图赎回之机……”。

此外，蔡锷看到了将滇桂铁路由南宁延伸到海口——“龙门岛”的必要：“查龙门岛去南宁不过四百余里，岛屿环抱，为船舶最良之海湾，而风浪不惊，较北海为尤善，以之辟为商港，则粤桂滇黔四省之物产皆可委输于此，商业可期发达，且此中海水深广可泊兵轮，可并营军港以屯海军，将来铁路军港皆首尾衔接，滇桂不致坐困，庶可巩固国防。”甚至对于具体的铁路轨距问题，蔡锷先生都考虑到了，“至滇邕路线叠嶂层峦，工程颇钜，然为久远计，拟采用广轨，期与粤汉路衔接



较便，虽需款较多，亦所不惜”。滇越铁路和英国在缅甸所筑铁路均为米轨或窄轨，动力有限，从长久考虑不宜铺设。足见蔡锷的远见卓识。

蔡锷冬日通电后，身在澳门的孙中山先生当即发电予以支持。1912年5月26日孙向北京袁世凯、唐绍仪、北京交通部、云南都督蔡锷发出密电：“……蔡都督冬电从地理、国势上说明滇桂铁路之必要，真知灼见，殊深草佩，滇桂一线关系西南边陲，殊属重要。此路果成滇黔桂粤衔接加戎，不唯有利于军事，实业、交通尤资利益，事关国力伸缩，鄙人深为赞成，应从速核议定书……”。9月，孙中山先生接受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于11月14日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次年1、2月间，为筹修滇桂铁路与蔡锷等往返电函商议。在他的名著《建国方略》中有关于这一铁路的若干设想。

除孙中山先生外，北洋政府以及广东、广西等省要员亦积极响应蔡锷倡议。北京交通部很快就决定派遣钱世禄、龙高显两人赴滇桂沿线调查前清罗国瑞勘路情况，以备进一步决策；广西陆荣廷、广东胡汉民、陈炯明也通电极表赞成。广东都督还进一步提出要求：中央将该路归蜀、滇、黔、桂、粤五省“自行筹款兴办”并公推孙中山先生主持其事。蔡锷深表赞同，发电“恳请孙先生毅力主持”。

由于蔡锷的积极倡导和孙中山等的支持响应，滇桂铁路又继续将前清罗国瑞未测完路段尽数勘测成备，设定了路线所经大小站目、里程等等，并开始着手具体修筑。但这一利国利民之举，终因路款无着和其他原因又一次被束之高阁。



## 滇邕铁路筹建纪事



1912年5月，蔡锷冬日通电发出。次月交通部派清末云南官费留学专修铁道的子弟钱世禄、庞高显二人来昆调查铁路情形。经数月工作，二人作《调查滇邕铁路概略》，报呈云南民政长罗佩金。概略划定路线为：“自云南省城起点，经曲靖、越州、罗平渡江底（滇黔交界）入黔境，滇境路线约七百余里；由江底经兴义县（黄草坝）下千八百余丈之高山抵坡脚，沿红河下，过八渡（黔桂交界）入桂境，约四百二十余里；由八渡经旧州（西隆州）沿百色河下，经由南宁梧州达三水，接粤汉铁路，约千七百余里……”。除省内不走曲靖，而出昆明、路南、师宗至罗平外，与今日所筑南昆铁路走向没有太大出入，这并非不谋而合，实因地理因素使然。清末勘路时虽打算从百色径自进入云南，较绕贵州要近许多，但山势过于险

| 站名 | 里程   | 站名 | 里程   | 站名 | 里程   | 站名 | 里程   | 站名 | 里程   |
|----|------|----|------|----|------|----|------|----|------|
| 昆明 | 0    | 曲靖 | 100  | 越州 | 200  | 罗平 | 300  | 江底 | 400  |
| 兴义 | 500  | 坡脚 | 600  | 八渡 | 700  | 旧州 | 800  | 百色 | 900  |
| 南宁 | 1000 | 梧州 | 1100 | 三水 | 1200 | 广州 | 1300 | 香港 | 1400 |

滇邕铁路大小站名表



恶，环境不允许，“前清邮传部曾派罗工程师国瑞勘测百色至滇省一段，有南北两线，比较南线由百色经广西（属云南）而达云南省城，较短三百余里，惟山势甚大，施工不易，且沿途商场寂寞，是以勘至中途遂止，而返由百色经八渡，兴义至曲靖等处而达省城，是为北线，惟道途稍长，然较为平坦……”选择上述路线，除地理因素外，更多的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北线虽然道途稍远，但较平坦”，建设费用与“南线”相去不远，钱陇二人具体考察沿途商务情况：“由云南省至罗平州往来货物三百八十余万斤；由罗平州至兴义府五百八十余万斤；由兴义府至百色，六百二十余万斤；由百色至南宁四千八百六十余万斤，由南宁至梧州，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余斤”。认为，一旦“铁路造成，商务将加增数倍，且当时归滇越铁路运输者悉为滇邕”，商业前景十分可观。另外，沿途还有很多矿产，如煤铁、硝磺、水银、明雄、原砂等，均可因路通而获利。

修路资金的筹措，历经坎坷。首先是争取中央投资无望。云南省滇蜀腾越铁路公司拨入在滇大清银行的股款5万元在罗国瑞率员踏勘时用去3万元，筑路未成。1913年蔡锷向交通部索罗国瑞勘路图册，但交通部不继续罗国瑞未完成的勘察工作，反要云南交还滇军政府并未接收过的勘路费中的2万余款。1914年孙中山被免全国铁路总监后，路权再次归于中央。议修事宜延至1918年后，仰赖中央出资，已不能实现。其次是数省联办、中央补助无果。蔡锷冬日通电得到广西陆荣廷、广东陈炯明、胡汉民、贵州唐继尧、四川尹昌衡、张培爵的响应。同年6月广东胡汉民在电报中建议五省自行筹款兴办，公推孙中山先生主持，各省都督表示支持。随后年余间，孙先生虽



多方设法，但联省合修一事仅留于文电往来，未能付诸实现。第三是北洋政府“指路借款”不力。联办没有结果，蔡锷先自决定举借外债修滇段之路，并与德国礼和洋行商议借款。有材料说已草签协议。但当时云南实际已是法国殖民者的势力范围，法人竭力反对，并挟北洋政府向滇施压，滇省政府只得表示并无向德借款一事。钱陇二人对借款之事认为，法国“颇有并吞云南之势，兹复允其投资滇邕，是何异于抱薪救火也”。建议：“国家借款拨归交通部前来修筑，与云南无直接关系，且款项可以只借此款云云，多属法人投资，此可以免法人之争端，而云南对于法国则成间接之间接……”。1914年1月21日，由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交通部总长周自齐与中法实业银行全权代表塞力耳订立借款合同20条。虽已签署借款合同，中法实业银行亦曾支付部分款项，然北洋政府并非诚心修筑，仅仅“指路借款”而已。再因一战爆发，后款无续，合同最终废止。筹修滇邕铁路一事，就这样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 中国第一条商办铁路——个碧石铁路



宣统元年(1909年),地处滇南的个旧县绅商为便于锡矿运输,倡议由民间集资,以商办形式从个旧修建一条铁路支线与滇越铁路相接。当时政府痛感借款筑路丧失主权,也竭力提倡商办铁路,又恐商办不力,故于1913年,决定由省属滇蜀腾越铁路公司与个旧、建水、石屏等地的地方锡厂主筹商共同修建。由该铁路公司出资100万两,地方矿商以锡砂等折为股本100万两,共集资白银200万两作建筑经费,如不够用,再由滇蜀腾越铁路公司拨借50万两。成立官商合办的个碧石铁路公司,专筑此路,聘请美籍工程师多莱(后改为法籍工程师呢复礼士)负责勘测路线。因



个碧石铁路股票。



该路属县与县之间的交通，运输量不大，用米轨不合算，故改用6公寸窄轨，可节省工料40%左右。因此，民间也称个碧石铁路为“寸轨铁路”。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奉省府之命将公司款项转至个碧石铁路公司入股。后又因个碧石铁路久未完工，该公司见无利可图，将股款拨还股东，由其自行加入个碧石路股，公司则退出该工程。云南兴文银行亦参与了对个碧石铁路的投资贷款，数额达数千万法币，后又将其贷款转为股本，占个碧石铁路公司总资本的39%。筑路工程从1914年开始，首先修建从个旧县经鸡街、蒙自县至碧色寨路段，连接滇越铁路，长73公里，称个碧铁路，于1921年11月完成通车；当年5月从鸡街分道修建至建水，长61.5公里，于1928年10月建成通车；最后，修筑从建水至石屏路段，长48公里，至1936年全面建成通车，遂改名为个碧石铁路。其间，因地势险要、旧滇币贬值、筹措资金困难等等原因进度迟缓。断断续续花了23年才修完。全长182.5公里，平均每年不足8公里。省内段计有隧道18座、桥梁28座，共耗资1900万元，未用一分钱外资，全系云南省出资自修，路权未落外人，实开滇省地方自修铁路之先河。

该路的修通，对云南的大锡出口及物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解放以后，连同滇越铁路一道被人民政府接管。直至20世纪80年代停运。





## 初建云南公路网

地处高原的云南，交通不便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自西汉起，云南与中原交通，设立“五尺道”。千百年来，驿运一直是云南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云南曾是中原与东南亚国家来往的重要通道，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以及茶马古道都与云南密切相关。时至清末，云南除了有一条法国人修的窄轨铁路外，只剩下一些不能行驶汽车的省道，大部分的交通仍得靠肩挑马驮。可以说，云南在辛亥革命前没有一条公路。

民国以后，云南开始着手公路建设，计划以昆明为中心，修建迤西、迤东公路。1923年，民国云南省交通司拟定修筑滇西路计划：第一步由昆明至舍资；第二步至下关；第三步至腾冲；以后展筑至滇缅边境。修筑标准照铁路规定，但加宽路基，待将来通行汽车赢利，再逐段铺上铁轨以通火车。由此可见，最初修筑公路仍源于自办铁路的初衷。滇越铁路路权丧失，云南出海通道为外人把持，商业贸易均受制于人。1927年以前，仅在省城昆明附近修筑了不过三四十公里的通车路段，但毕竟云南公路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

1927年龙云任省政府主席后，云南进入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龙云深知公路是建设的“先务”。在他的主持下，以原有的迤东、迤西两路的设想为基础，规划了云南公路干道的格局——“四千道八分区”。四干道为：滇东干道，昆明经嵩明、寻甸、马龙、曲靖、沾益达平彝（今富源），为滇黔交通要道；滇东北干道，由嵩明杨林





抗战前通车的京滇公路(南京至昆明),云南至贵州一段。在抗战期间的后方运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图为著名的“二十四拐”。

经寻甸、会泽至昭通,为滇蜀交通要道;滇西干道,由昆明经安宁、罗茨、禄丰、广通、楚雄、镇南(今南华)、姚安、祥云、弥渡,凤仪至大理,为滇省西部要道;蒙剥干道,由蒙自经开远、文山、广南、富州至剥隘,为滇桂交通要道。八分区为:以昆明为中心,逐步推广。一区昆呈、呈

晋、晋昆（指昆阳）段；二区宜路、昆玉、呈宜段；三区宜陆、曲陆、呈澄、川玉、玉建段；四区昆富、安罗、安元、元武段；五区沾宜平段；六区路泸、师罗段；八区为思普区……

龙云上台第二年起，就“一面测量，一面修筑”。近10年间，云南公路建设分三期进行：1928年至1932年为第一期，完成通车路段虽然不是很多，但“测勘路线及修成土路则进步较速，计南路通车至玉溪，东路通车至曲靖，西路通车至禄丰，共约三百余里……”；1933年至1935年为第二期，西路修通楚雄，东路通车至宣威、平彝、罗平，东北路通车至功山。这一时期，公路建设进展较快，工程较为浩大困难的禄含段、昆禄、昆寻段的铺路，均告完成；1935年春成立公路总局，龙云亲自兼任督办，开始第三期工程，至1939年基本实现“四干道八分区”的计划。前二期工程累计通车里程达三四千里，经昆明为中心西通缅甸，东接川黔两省，实现横贯本省的主要干线。其他与越南、泰国广西衔接的各干线已分段修筑，主要的县区公路均已通车。

以云南这样一个贫瘠的省份，在近10年的时间里，由零星路段建立起全省公路干道网络，实为当时的壮举。而这一时期公路建设的成就，使云南担负起抗战期间后方唯一国际运输线的使命。

## 云南第一条公路通车记



1926年，受其他省影响，唐继尧政府为促进省内物资交流并扩张与外省的联系，以增加税收，弥补财政收支差额，决定发展交通事业，修筑公路。

因当时的云南以滇西地区商业最盛，缅甸的商业贸易频繁，物资运输较多，遂决定公路建设首先向滇西方面发展。同年四、五月间开始着手测量，最初路线定为小西门经菱角塘、普坪村，车



行驶在滇西省道上的运输车辆

家壁而上碧鸡关。由于这条线占用水田较多，遭到了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以“修路不应多占水田，影响粮食收成”为理由阻挠此路的勘修，于是这条公路只得改线。为了便于浏览西山，改为小西门、大西门、黄土坡、黑林铺、眠山、普坪村、车家壁、高峣转到碧鸡关。这样一来，路线加长，工程量增加，开支加大。1926年6月开始动工修筑，9月上路基本完成。新路路面较窄，只有8公尺，留有让车道，对头来车要在让车道上相让；斜面也不合规格，如黄土坡斜面在10%以上，且碾压不十分坚实，一到雨季，到处凹陷，泥水混杂，行车极不安稳，与牛车路无异，后来才逐渐加宽，铺上碎石。

1926年9月，小西门到碧鸡关一段公路修成。修路的同时，交通司向美国福特公司买到载重一吨半的货车底盘四架，到昆明自己装配车厢。因没有装配车厢的技术，又缺乏五金材料，只好完全用木料装成，外形很象比较精致的马车。法国人眼见云南修起了公路，买了美国车，心有不甘，就向云南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也购买法国车，用法国人。云南政府只好又向法商买了“恒诺”轿车两部，作为联帅唐继尧的自用座车，并随车请来越南籍驾驶员两人、修理工一人，在航空队找了两名机械师，在大观街租用停车间和修理间，并在西安马路（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对面）设汽车西站。由航空队派飞行员张汝汉、李嘉明、李荣发、机械师刘从仁等为福特车驾驶员。这几个人中只有张汝汉、李嘉明驾驶过三轮卡，用这样的司机来开汽车载人，不免滥竽充数，实在冒险。

为庆祝云南第一条公路的开通，交通司择定10月的一天举行盛大通车典礼。准备工作从9月就开始着手。为保证安全由张汝汉和越南驾驶员



各驾一辆车，往返于小西门——高峣之间，试行两次后，确认可以载客。庆典之前，在汽车西站扎了牌坊，在高峣（碧鸡关坪上）搭彩篷备茶点。这天午后一点多，来宾齐集，典礼开始，唐继尧也亲自参加，仪式非常隆重。典礼结束后，全部车辆满载来宾往返奔驰在云南的第一条公路上，记下了云南机械动力交通运输的一页。

下午5点左右，又将来宾从高峣接回西站进晚餐，到晚上9点多方才尽兴而散。据说，由于车况、路况不好，加上飞机驾驶员不习惯开汽车，来宾也不习惯坐汽车，许多来宾大晕特晕，联帅唐继尧坐汽车到高峣后，再也不肯乘汽车返回，只得又坐古老的轿子返回昆明城。

## 云南的发钞银行——富滇银行



重九起义后，云南脱离清政府，原先的拨款和外省协饷骤停，南京临时政府又无力接济。为维持地方财政计，云南军都督府于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省立富滇银行，属官办，史称旧富滇银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还具有发行纸币的特殊职能，并代表省政府执行地方金融政策，统制外汇，“实滇省金融机关之中心也”。富行铸半开银元150万元做准备金，发行纸币（旧滇票），以3元滇票抵半开1元，共同流通，滇票可兑换银元。

旧滇票，最初有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五种面额。正面书写“富滇银行”，中为元数，背面印有财政司布告全文。先后印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2角、1角八种。



富滇银行抵押借款证书及文华奎执照。



系云南本省印刷，纸质粗劣，印工不佳，易损坏，故很容易伪造。档案中有伪滇币的案例，有人在四川成都市的一个石印作坊印制了一批假滇票，“千辛万苦”背运来到昆明，结果第一次在穿心鼓楼附近使用即被发现报官。不知这样的案例还有多少，因为它实在太易伪造。后改由上海商务印书局代印5元和10元两种，5元正面右为双塔寺，左为状元楼，中书“五元”字样，背面为田野风景；10元正面为太华山，左为金马坊，背面为翠湖风景，该项纸币印工较本省印者好。1921年，滇币又改由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票面上印有金马、碧鸡立于地球图案。先后印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2角、1角八种。1916年的护国战争，随后的护法战争，以及为争夺云南省政大权而发生的“四军长倒唐”、“四师长倒龙”等战争，使省府不断向富滇银行借债，迫使滇行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增发钞票，导致老滇票大幅贬值，旧富滇银行声誉一落千丈。为整顿金融秩序，1932年，省政府筹获半开银元1600万元准备金，成立新富滇银行。总行设在昆明威远街，行长李培炎，当年9月1日开始营业。分行有上海、个旧、下关、昭通、曲靖、开化、丽江、腾冲8处；办事处有香港、河口、东川、顺宁、保山5处。省政府规定以新滇行发行的纸币（新滇票）为全省通用货币，可按1比1的比率兑换滇铸半开银元。旧滇行原先发行过的老滇票，以新币1元折旧币5元的比率陆续收回销毁，富滇新行继续发挥着“中央银行”的作用。为防止重蹈旧行覆辙，第二任行长缪云台规定：龙云、卢汉两人不在富滇新行开户头，不存不借，要他们两人起带头作用，以阻止其他军政要员以开户为由，向银行施加压力办理不合常规的借款等事。同时新行不再代理省



金库，省政府亦不向新行举债，以防重演财政金融互相拖累的悲剧。龙、卢二人鉴于旧滇行的教训，欣然同意。新滇票仿照旧滇票美印版，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刷，面额分为100元、50元、10元、5元和1元券五种，另发行铜元券作为辅币。

1935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币制，“复兴”经济，实行币制改革。明令规定，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国家法币，所有全国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一律以法币为准，各地原流通的银币均限期以法币收回，不得再行使，同时又准许各省银行发行地方纸币作为辅币。云南的新滇票同法币(国币)按2比1的比率兑换。至1937年底，法币在全省畅行无阻，滇币做为辅币与法币共同使用，滇铸半开银元则退出流通领域。

抗战期间，滇缅公路中断，对外贸易终止。迫于形势，滇省的游资大部逃往外地，省内金融枯萎，导致物价上涨，币值低落，法币币值一落千丈，远较滇币贬值为甚。云南省政府为顾全抗日大局，不愿以滇币的流通使法币相形见绌，乃停止发行滇币。从1944年8月起，将其发行的新滇票限期两年内全数收回。此后，法币成了滇省惟一的流通货币，富滇银行丧失了“发钞”的作用，云南省的地方金融货币体制被中央政府“统一”。抗战胜利后，法币破产，金圆券巨幅贬值，1949年3月16日，省政府准许人民自由行使滇铸半开银元，以稳定物价。富滇新行掌握半开5千万元，控制了金圆券的发行，成为金圆券在云南的“发钞”银行。富滇银行自成立至解放前夕的30多年中，依靠官府势力，仰仗其发行滇币的优越地位，一直扮演着云南地方“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成为滇系军阀统治云南的金融工具。



## 初创云烟品牌



云南的香烟驰名中外。如今，只要提到云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红塔山”，“云烟”这样一些名牌香烟。的确，云烟是云南人的骄傲。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早期创业者步履的艰难和蹉跎。

早在明朝后期，滇西蒙自一带就有人晾晒吸食“兰花烟”。但云南人普遍接受香烟却在20世纪初。英美机制香烟进入云南后，以全新吸味、精美的制作和包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很短时间内，外来香烟完全占据了省内市场。为改变这一状况，振兴地方实业，省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筹划自己的烟草工业。1910年，昆明李松茂等5人合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机器生产卷烟



金陵大学农学院为洽购美烟籽特  
复函。



的尝试。1922年，墨江人庾恩锡筹资15万元，从上海购进设备，聘请了外省技师，招募了百余名工人，创建了云南烟草工业的第一家企业。他们以本省晾晒烟叶为原料，生产机制卷烟，日产包括著名的“重九”牌在内的香烟30万支。由于本地晾晒烟叶烟质不佳，所制香烟品质不高，该公司产品很难与洋烟竞争。公司苦心经营，勉强维持数年，终因质量和资金等问题于1928年停产，后被改组为官办的南华烟草公司。开始引种国外优质烤烟的尝试。

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为降低成本，扩大倾销，向云南提供美国和土耳其烟种及栽培技术，曾在通海、玉溪等地进行试验栽培未获结果，但从此云南开始引种美烟。1931年，省政府主席龙云训令在通海等34县倡种美国烟草，但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在种籽上的控制和垄断，也未获成功。

“七·七事变”后，山东、河南等一些主要烟草产区先后落入敌手，很多卷烟企业不得不到大后方来寻找原料。1939年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通过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出面交涉，由曾任云南大学蚕桑系主任、时任农业部技正的常宗会携带美国烤烟籽种，在昆明东郊试种获得成功。民国云南省政府由此看到烤烟的潜在价值，决定作为新的农业资源加以开发。于1941年设置烟草改进所，先后从河南、山东及法国引进美国烤烟籽种，进行试种、驯化。经过比较试验，确定以金圆作为推广品种。次年，在昆明、江川、玉溪等7个县种下2 727亩烤烟，在各推广县成立了烟草改进分所（后改为工作站）负责此项工作。专门举办烤烟技术人员培训班，进行人员培训，然后以这些人为骨干，对农民进行宣传和指导。政府免费提供烟种，并按种植面积和烤房数获得无息



贷款。到1943年，全省直接接受培训的烟农已在千人以上，做到了“凡从事种植美种烟叶者，均具有栽培和熏烤技术”。在此期间，又先后兴办了云南纸烟厂和云南烟叶复烤厂，加上原来的烟草改进所，合并成立烟草生产事业总管理处，将烤烟的生产、售卖统一起来，形成农工商一体化。由于措施得当，烤烟种植很快在全省发展起来。抗战末期，云南从美国非利——莫尔斯种籽公司引进了烤烟原种，由烟草改进所负责人徐嘉锐带领，进行品种更新。1946年以后，“大金圆”、“特字400号”、“特字401号”等优良品种取代了原来的金圆种，完成了烤烟品种的更新换代，并使其逐渐定型。特别是大金圆种（又称“红花大金圆”）成为云南烤烟的主要品种。至此，云南烤烟的优势开始形成。

烤烟开发的成功，对云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农业上，烤烟成为省内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它的发展加速了云南农村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玉溪、通海、江川等地，被称为“云烟之乡”；在工业方面，到1947年，全省共有烟厂40多家，年产卷烟万箱以上，烟草工业成为重要行业，卷烟成为云南重要的工业产品。随着烤烟在全省的普遍发展，云南成为全国烤烟的主要产区之一。到1943年已有14个县种植烤烟，面积23 595亩，产量946 360斤。卷烟生产也开始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不仅占领了省内市场，而且也走向了省外市场。



## 民初滇西沙盐井盐销场之争



迪庆中甸（今香格里拉县）、维西是云南藏胞的聚居区。历史上是云南进入西藏、西康和四川的重要途径，也是汉藏文化交融折冲之地。民国初年，英国殖民者趁中国国内发生革命之机蓄意挑唆西藏地方势力制造西藏事件。为国家主权计，云南都督蔡锷在派兵援川的同时，于1912年4月30日致电北京分电四川，要求中央政府“早为布置，以固边圉”，5月，再电北京表示愿出师西藏。北京政府复电同意滇军“简将出师”。6月，蔡锷任命云南军都督府参谋厅总长殷承瓏为滇军西征军司令，率兵进藏。8月攻克盐井。后因川军疑忌，9月21日袁世凯命滇军“切勿轻进，转生枝节。”蔡锷不得已下令殷承瓏撤军，10月末，撤出藏境，12月10日回昆，西征事遂告结束。

西路军援藏虽中途告辍，却引出一场关于中甸、维西的井盐与沙盐的销场争端。云南与四川为我国主要的井盐产区，按行政区划属滇盐销岸，而民间食俗又偏好康藏沙盐。因中维地区特殊地貌，每年冬季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与滇盐产区交通，因而逐渐形成井盐、沙盐混销甚至井盐滞销的情况。当时的盐税收入仅次于农税，关系国家财政。销岸划分直接关系各省利益。作为滇省负责中维销岸的白井盐场不能坐失滇军滞留中维的良机，督销总办杨大材于1912年6月21日向有司稟请限制沙盐入口，以加为禁俾免充斥，同时“仍请将喇盐略加秤头以便民食”。7月2日云南军政府实业司复杨大材批文：“查维西中甸两厅地方，本喇丽井盐行销引岸，因阿墩子隅与川藏接壤，



雪山深阻，冬春之际滇盐难到，变通办理暂准买食川藏所产沙盐，每百斤尽收税银四钱，不料税轻运便沙盐遂得肆充，致井盐销额日短，始由清盐政公所缘拟每盐百斤加抽锐银陆钱，并同原征共银一两，委员于阿墩子设局稽征。征获课款除照案报解盐库、税课及拨留丽江中维三属中小学经费及维西厅通判津贴，并局用开支缉私薪饷，各征有长余尽数报解。”同时派喇井督煎委员修某“赴维会商沙盐课款，划清界限。”尽管有军队做后盾，终因喇盐运脚昂贵，中维藏民及其牧养牲畜不惯井盐，禁止沙盐之议未能成功。1913年7月30日中甸县知事沈鼎勋“请准中甸沙盐购销呈”中说得明白：“中甸地处极边，天气严寒五谷不生，除江边一境外其余四境俱系高山旷野，夷民实业生计全赖牧养牛羊牲畜以为衣食……若无牲畜则夷民困毙。而牲畜之要全赖沙盐喂养则肥且壮，若无沙盐则必瘦蔽……缘中甸自禁沙盐入境以来，牛羊死者甚众，民生日蔽困苦不堪……”。为尊重民间习惯计，民国24年（1935年）南京政府财政部《盐政年报》中，中维划归沙盐销岸。

## 唐继尧创建云南航空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列强纷纷发展空军。而在军阀割据的中国，各省军阀也都纷纷效仿外洋，组练空军，开办航校。聘请外国顾问训练飞行人员。当时，驻川滇军顾品珍返滇，赶走了省长唐继尧，使唐被迫流寓香港、广东。但唐立足西南而后问鼎中原的雄心不减。

在广东，唐继尧结识了刘沛泉等美国华侨航空人员，认识到航空的作用。档案所存他在云南航校第二班的训辞中说：“自欧西科学日进，而驭机驶汽竟俨然游行空际，操纵自如，以视墨翟之



唐继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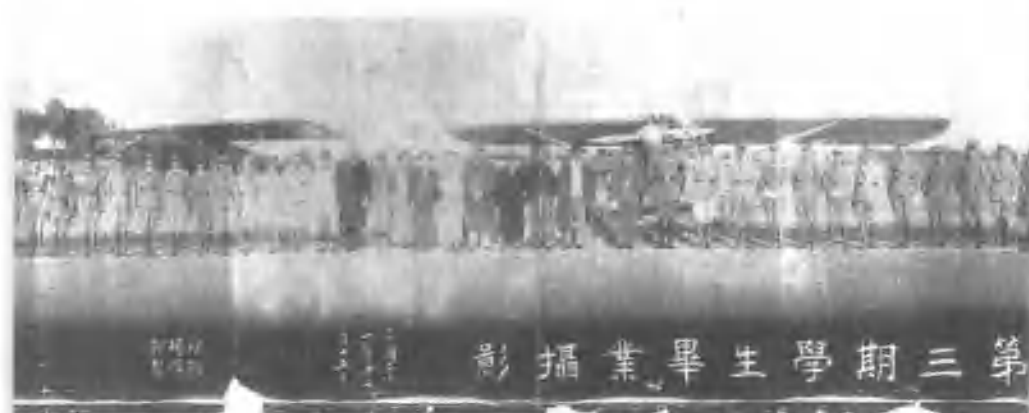




云南航校学生，实习机械课程

云梯，公输之飞鸢，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迥非极人工之微妙，夺造物之缄枢哉。顾飞机之为用其利不可胜述，而于军事关系尤重。泰西之论强国者，问其艇机之多寡，即可预知，以故航空之校几于置设如林，中国有是学堂则自北京始。吾滇虽僻在南徼，而护国之役义声首倡，滇军之名誉亦腾播于二十二行省中。往者余尝侨寓香江，得与中西诸硕俊抵掌而谈军旅，早知航空学之可……”

1922年春，唐重主滇政。同年秋，刘沛泉等航空人士来到昆明。滇政府由香港向美国购买飞机，并于云南讲武堂内设云南航空处，刘为处长，下设两个航空队，分由广东人王狄仙和华侨张子璇任队长，聘华侨黄社旺、庄孟仙、司徒鹏为飞机师，将前清巫家坝陆军操场辟为机场。同时，还开办云南航空学校，航空处长刘沛泉兼校长，杨克荣、萧杨勋、赵述完、张邦翰、柳希权等为工



云南航校三期学员合影。

程理化教官，校址附设航空处内。这年冬天，航校从昆明、贵阳两地招收学生，12月25日正式开学，编成一个航空入伍生队，与讲武堂17期一同受训。为了打消学员对飞机失事的恐惧心理，航空入伍生班特意招收夏文华、尹月娟两名女生。对此，唐继尧曾说“女生都不怕死来学航空，难道男生还怕死不成。”第二年又有4名朝鲜籍学员来校学习。

云南航空在商业航运上作过尝试，先后购买了数架4座运输机，在一次由香港接机返昆时（1929年）创造了当时全国飞行最长航线的纪录：从北海沿西江溯江而上，经百色，越过南盘江与滇越铁路交叉点，过宜良而达昆明。在当时无地面设施支持的情况作此长距离飞行，受到国内同行的瞩目。以此次飞行成功为契机，云南航空曾试图开通与邻省广西、贵州间的商用航线，后因两省当局的强烈反对，未获成功，又转而考虑开



通省内昆明—昭通、昆明—蒙自—广南、昆明—大理—保山三条航线。遇内战起而告终。

云南航空处成立及航校开设后，法国殖民者便积极插手。利用滇越铁路要挟，在云南进口航空器材过境越南一事上大做文章。一方面又表示“法国人愿意帮助云南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空军，需用人员和装备都满足云南政府的要求”。唐继尧接受了法国人的请求，聘请法国空军上尉阿尔波得为顾问，法国空军少尉弗朗塞士，空军准尉马尔丹为教官，同时聘请12名越南籍机械技术员主持修理厂，航校教练机也转向订购法国飞机。法国顾问甚至干涉航空处的人事，迫使航空处改组。与法国人同样目的，英美也曾积极施加影响，企图控制云南这支新组建的空中力量。后来龙云主政期间，虽因经费等的层层困扰，云南航校及航空队员还是坚持了下来，并参加了后来的内战。

1937年，抗战爆发，云南航空经历了15年的风风雨雨后并入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航空



飞行表演

队人员在张汝汉的带领下飞赴南京参加抗战。结束了民国云南航空短暂的历史。

## 从东陆大学到国立云南大学



从清末到民初，“中国濒年多难，学务废弛。大学教育不发达，遂致人才缺乏，文化未兴。感此痛苦，西南各省为甚，而滇中为尤甚”。辛亥革命特别是护国运动后，为适应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创办大学已成云南当务之急。1915年省政府就计划设立大学；1918年滇川黔三省会议设立联合大学，但因经费无着未能办成；1920年省长唐继尧慨然创议捐资私建大学，又因政变而辍；1922年唐重主滇政，旧事重提。请王九龄、董泽两先生负责筹备，由创办人及滇中各界人士捐助款项，择地前清贡院，面积七十五亩三方丈，“居高阜，南临翠湖，风景绝佳，为修学最善之地”。1922年9月1日成立建筑事务所兴建校舍，12月8日，以创办人云贵总督唐继尧的别号“东大陆主人”为名，以“发展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为宗旨的私立东陆大学



东陆大学本部建筑图

正式宣告成立。拟自1923年3月先招预科生四班，共计二百名，以后逐年添招，按级升进。分文、理、法、工、农、商、医七科。先开办文、工两科。文科分政治、经济、教育三系，工科分土木、采冶二系。《民治报》、《义声报》、《复旦报》、《均报》、《微言报》、《新民报》、《金碧日报》、《政报》等都登载了云南大学的招生启示和招生简章。围绕东陆大学这一西南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大学招不招女生的问题，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为招收女生一事，董泽呈唐继尧“查欧美、各国大学，均系以男女同校为原则，异校为例外，诚以教育事业，首重普及，但属才堪造就，要无分男女”。但唐继尧指示“俟大学成立，办有成效，再行添设女子大学部，为女生升学之地”。杨凤贞、张琼华及女师全体学生联名上书请求东陆大学开放女禁招收女生；云南旅鄂学会请唐继尧收回成命招收女生；云南省教育司也请求开放女禁“查我国大学近日报考，已多兼收女生，潮流所趋，势难禁止”。



东陆大学创办人唐继尧

东陆大学终于顺应潮流，于1923年4月9日发布招收女生布告，并规定女生考试科目为国文、数学（算术、代数、几何）、英文（文法、翻译）。

东陆大学的开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广东商人霍子常闻风募义，捐助1百万元用作东陆大学的常经费；云南商





东陆大学校园布局图

东陆大学校园布局图

人也互相激发，群起竞争，纷纷向东陆大学捐款；财政司为扶持教育起见将东川矿业公司的股票10万元拨给大学作为基金。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仅靠个人捐款筹集的资金已不敷开支。东大校长董泽呈请省财政司将东陆大学的经费列入预算，按月补助；唐继尧令飭各县“筹办东陆大学系为造就精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自1923年起各县每年筹解一百元，议作奖励各县学生求学之费，且取之于某县，用之于某县，意在使天姿颖异，家贫无力求学者得资深造”。

为谋本省教育之改进，经省政府议决于1930年将私立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9月呈请省政府转咨教育部，遵照教育部令更改校名为“云南省立云南大学”。全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先生自1937年8月受聘任校长以来，一再呼吁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应予大力扶植，尤其要重视边疆的高等教育事业”，主张全国高等教育“应全面考虑，合理布局，均衡发展，不宜畸轻畸重”。在省主席

龙云的支持下，他努力争取把当时尚属省立的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云南大学，以国家力量促其发展；1938年7月1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云南大学”，熊庆来任校长，经费定为国币50万元。除保留原有文法、理、工、医、农学院外又添设了铁道管理系、蚕桑、采矿等专修科，使云南大学

能沿着“从云南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的优势加以研究，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这一办学方向，不断发展，不断提高，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学。

从东陆大学的建立到云南大学的完善，其间为云南的建设、发展造就了大量的专门人才，成为云南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对云南的全面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东陆大学之成立其所负文化上之使命不限于云南一省，将进而谋西南诸省文化之均衡与向上，以与中原齐驱，而同欧美争衡”。抗战以来，华北、江浙、闽、粤等省学生负笈来滇者甚众，“故东陆大学造端虽微，而关系甚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善，云南大学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日臻完善，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重点大学。



东陆大学招生广告

## 从开蒙垦殖局到新村蚕业公司



20世纪20年代末，云南遭遇三年灾害，“农时屡误”，收成大受影响，市场粮食供应不足，粮荒在即。引起省政府主席龙云重视。在《云南民国日报》上发表启事：“为从根本上解决云南民食问题，政府决心要兴修水利，使秧苗得适时在良好季节栽插，使禾苗成长良好，有较好收成，以裕民食。望滇中人士，对兴办云南水利有见到的，请向省政府建议，只要可以办成，政府当采纳兴办”。由此引出大力兴修水利，大规模开发农田的举措。

杨文波先生从30年代受命主持农业应用滇池水灌溉昆明坝区农业工程，又于1934年秋奉命到迤南开远、蒙自一带视察开蒙地区的农田水利。1935年8月5日开蒙垦殖局正式成立，由杨先生出任垦殖局长，留学法国学习农业科技的徐嘉锐为副局长兼农业科课长，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科的刘治熙为垦殖局工程师兼工务课长，云南政法学校毕业生何炜昌为财务课长，开始对蒙自大屯坝、蒙自坝、草坝、鸡街坝、倘甸坝，开远大庄坝、开远坝等进行统筹开发。先后完成了开远大庄坝、蒙自草坝等的水利工程。至1944年草坝新建大小9个新村，新开稻田5万余亩。

为了进一步开发草坝农场，1940年蚕丝专家葛运成（字敬中）认为草坝颇具养蚕的天然条件，十分值得一试，建议在此设立蚕桑公司。他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云南经济委员会主任缪嘉铭（字云台）先生的支持。缪先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一则可以为云南农村开辟一条生产路线，再者可以

用蚕丝出口换取一些外汇券……”。于是，决定由经济委员会邀约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富滇新银行共同投资，成立官商合股的蚕业新村有限公司。由葛敬中出任公司总经理，时任草坝工程处处长的杨文波先生兼任副经理，负责种桑养蚕事宜。

蒙自蚕桑业曾在清末经劝业道的提倡有过一定发展，但民国以后，渐渐趋于衰落。草坝再兴蚕业，基本上是从头做起。新村公司先在草坝租用6 000亩土地开垦，种植桑树。这时正值抗战爆发初期，滇越铁路尚未中断，公司从上海抢购了40万株桑苗，经海防运抵农场，同时运来良好的交友蚕子（中日混合种蚕）。公司开办后第二年便开始养蚕，每年春夏两季收茧，所产蚕茧，有着很好的质量。

新村蚕业公司的发展，在抗战结束以后为我国江南诸省蚕业的复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战后江浙一带以及日本的蚕种多因战火所毁，到解放初期，“本省草坝蚕业公司所制改良的蚕种，为全国最佳蚕种，过去畅销江浙等省，信用良好，去年运抵江浙的蚕种15万张，今年（1950）已由浙省贷款给蚕农，并请制造20万张，以备明年生产之用……”。新村公司从开始的6 000亩桑地很快发展到3万余亩。至解放初接管时，已拥有土地达515 533亩，职员125名。成为当时有名的蚕种生产基地。可以说，草坝蚕业公司是民国时期云南兴修水利进行开蒙垦殖以来最有成效的事情。





## 从一棵树桩引出的种植业

在近代云南经济作物的种植史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木棉的种植。1918年的某一天，身为开远县实业局长的傅敏南先生，信步来到开远县西门外龙潭的吕祖殿遗址，偶然间看到一株被砍伐后留下的树桩。这棵高仅尺余的树桩上发出一条两尺左右的新枝并盛开着几朵白花。职业的敏感使傅先生凑近仔细一瞧，白花竟是纤维细软的棉花。于是这位实业局长采回几个棉铃做种子，在龙潭附近先后试种了几十株。获得成功，又在开远城墙头上种植了百余株，这就是云南特有的木棉。

云南木棉不是通常所指的“攀枝花”，而是一种多年生的木本植棉。它的学名叫海岛棉，属锦葵科，其纤维极细长，可纺细纱。近代以来云南棉纺业原料多仰赖从印度等地进口，虽自清末以来多方提倡草棉种植，但因地理气候的原因成效不大。1938年，中国银行来滇设立机构，举办“合作农贷”，以求发展本地特产。张心、张天放、冯泽芳三人前往开远县考察城墙上那200株木棉。认为该木棉纤维细长，与埃及棉同种，经过长期的传种演变，到云南后逐步变为多生的木棉，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经济价值很高。当时我国需由美国、埃及进口这种长绒棉，值得大力推广。于是成立了“云南木棉推广委员会”。

该委员会自1939年开始推广木棉，至1947年云南人民企业公司成立，接收云南木棉公司“共35 000株，内新植者17 000株……共产棉约15



300余磅。”全省木棉种植面积达7万余亩，为历史上最高，以后逐年衰减。到云南和平解放接管时，“云南木棉公司已停办清理，开远棉场1 000亩已入木棉改良场……开远木棉改良厂共有面积为7 965亩。”解放后，木棉公司一度恢复。1957年后，随着全国产业调整以及化学纤维的出现。木棉事业无形中被放弃了。



## 云南第一个电力排灌站 ——积善村抽水站



吴珣是参与石龙坝电站的建设者。在勘测从螳螂川上石龙坝到昆明小西门一段输电线的时候，吴珣就发现输电线经过的梁家河村、海源庄、积善村、麻园村一带土地肥沃，但因缺水只能靠天吃饭。只要天不下雨就无法栽秧，水严重制约着这一地区的生产。当时，吴珣就想，输电线正好经过这一带，如果能在这一带建一个农灌抽水站，

便能解决这一问题。



20世纪30年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从英国购进三台水泵及滇池流域最早的机械水场。

石龙坝建成后，吴珣的设想也逐渐酝酿成熟。经反复考察后开始付诸实施。抽水站的地点定在积善村。他首先做通这一带极有威望的积善村乡绅束桐轩的思想工作，说明了建电力





昆明城郊农夫正在耕作的水田

抽水站的好处。束桐轩是开明人，明白建抽水站既能免除人力车水之苦，又能节省劳力；既能腾出人手精耕细作又能保证适时栽插，旱涝保收；将来还可以点灯、碾米、磨面。是一项花钱少，好处多，且能带来长远收益的好事。于是积极支持吴珣的工作。通过束桐轩在邻近几个村里的宣传鼓动，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附近村民的拥护和响应，广大农民有钱的积极入股，无钱的出工代金。

商定资金、劳力、设备投资后，经股东们商定，把机房设在积善村上段，定名为海源河水龙公司。动工开始，群众出工踊跃，修河堤、挖机塘。总计筑堤2万多米，沿河依地势高低逐级修了闸，保证无论地势高低的田都能放水灌溉。1912年，水龙公司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购买了3300伏53千瓦的电动机、管径250毫米的抽水机各一台。由铁路运抵火车站，再用大木船沿盘龙江经滇池运抵积善村机房。1913年5月电机安装完毕。通电试机，附近村民欢天喜地，纷纷赶来观看电动抽水机抽水。抽水站建成后，从积善村到麻园村海源河两岸受益地面积近万亩，后来一直保证6000亩左右的良田能适时栽插，旱涝保





昔日滇池上的点点帆影和海边的万顷良田

收。积善村排灌站的建成，结束了这一地区使用传统的木制水车人力车水的历史，保证了当地能按季节提早栽插，开了我省电力抽水灌溉之先河，标志着云南农业水利工具的新飞跃。这种做法当时在全国也是较为先进的。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海源河两岸的粮食不仅丰产且质优，由于昆明市民都爱吃海源的米，使得小西门一带米铺林立。

## 陈一得与云南第一个气象测候所



谈到云南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自然会想起云南气象事业的奠基人——著名气象学家陈一得先生，以及他在天文、地震学上取得的成就。陈一得，原名陈秉仁，字彝德。1886年11月21日生于盐井渡（今盐津县）。他学生时代就勤奋好学，尤好数理，偏爱观测天地、山川，探究其奥秘。清末，先在昆明高等学堂习法语，1910年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取比利时留学生，选修铁道。因反对清朝出卖七府矿权，触怒提学大人叶尔恺而被取消留学资格。陈先生切望学习治国本领，决定自费留学。在南京，适逢辛亥革命爆发，他未能成行，参加了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事后返昆，考入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数理化专科，学习



陈一得任测候所长时  
留。





昆明气象测候所观测细则。

成绩优秀。毕业后以最优生受聘在昆明中学、师范学校任教师。一边培养人才，一边积极钻研气象学、天文学。这时的陈秉仁，已立下献身科学的决心。他说：“若真以科学工作为终身事业者，必带几分‘傻气’，虽常被人窃笑，亦所不顾。秉仁生性愚拙，字号一得，取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遂改名陈一得。

他偏爱自然科学，精通数理，深感祖国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气象科学，气象测候、星象测量关系民生，云南完全是一个空白。强烈的事业心促使陈先生最终告别了教育事业转向气象、天文、地震、地理、水文等领域耕耘。专心从事气象、天文、地震、地理等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创下了许多第一：创办云南第一个、全国第二个私立气象测候所，首创全国第一个天文观测仪器“步天规”，绘制了云南第一幅“昆明恒星图”，筹建云南第一个公立气象测候所，第一次把定量分析法引入云南气象学研究，第一个在云南推行标准时制等等。



1926年，一得先生自费赴南京气象台进修半年，随后赴上海、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及日本东京、横滨，经香港、越南回昆，遍历东亚各有名的天文、气象、地震台站。返昆后，于1927年7月用平时节衣缩食的积蓄，购置仪器设备。在钱局街53号自家住宅建立了一个小观测台，安装了测云竿、风向针、风速表、雨量计、蒸发皿、百叶箱、气压表等基本仪器，与妻子刘德芳挂起了“私立一得测候所”的牌子，创建了当时云南人自办的第一个，全国第二家私人测候所。从此陈一得与夫人刘德芳、弟陈种仁、义子陈永义轮流每天6时、14时、21时定时观测气温、气压、温度、蒸发、雨量、风向、风速、云、能见度等气象要素，由陈一得先生统计分析各类数据，编制月报、季报、年报，无偿提供给有关单位参考备用。天文观测放在晴天的夜晚，主测恒星等天象。由于气象资料事关军事、国防，测候所成立不过一年，就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注意。1928年河内法立测候所来函，想用重金交换气象资料，陈一得因事关国际，请示省署，市政总督张维翰得知后，饬将“一得测候所”改作“昆明市代用测候所”，拒绝了法国的要求；1932年1月28日，天津日租界气象台为侵华准备气象资料专门派员来昆洽谈高价收买气象资料事宜，被一得先生断然拒绝；1943年美国领事带译员到测候所，想用重金收买气象资料，也受到拒绝。陈一得先生在一得测候所及省立测候所的工作填补了云南这一时期天文气象科学的空白，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观测资料及研究文章，这些资料，1936年2月由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成“最近十年昆明气象统计册（1928年~1937年）”保存下来，成为昆明气象研究中可靠的系统的珍贵资料。陈一



得先生提出气象观测的有恒心，能耐劳，忠实，也是他一生致力于祖国科学事业的真实写照。

1927年底，先生利用多年天文观测研究，与夫人刘德芳合作，用丝线在蓝缎子上绣成云南第一张“昆明恒星图”；他还研制成功测算天空星宿运动变化规律的仪器“步天规”。著名学者袁嘉谷用“步天规”测算星宿，结果与实际观测和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他自备无线电收音机，转告广播电台，推行标准时。天文研究所赠云南的四具街钟及省政府历来主持的午炮都交由气象测候所负责管理；1930年7月，一得先生的《昆明市之雨量》一文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把定量分析引入云南气象学，第一次使用他的雨量观测资料，结合季风现象，讨论了昆明雨量的年变程及其原因。他强调气象观测的重要，认为“未经普遍精密实测”的气候资料，“无裨实用”；1934年12月19日，在云南大学校长何瑶主持下，先生复测云南真子午线成功，立石标“云南大学天文点”为志；陈一得先生通过查阅历代有关云南地震资料，实地调研探索历次地震活动的成因、规律，撰写研究文章。他将地震分为三类：火山地震、断层地震和陷落地震，并发现了地震与天体运行的关系。给后人留下大量研究资料。

为适应30年代航空及国防事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经一得先生建议，1936年6月1日云南省政府批准成立省立昆明气象测候所，任命先生为所长，负责筹建。测候所设于海拔2300米的太华山顶，施工条件相当艰苦。他不顾辛劳，顶着烈日酷暑、风霜雨雪，同全文晟合作，终于1937年4月在海拔2300多米高的太华山顶建成了云南第一个公立气象测候所和高山观测站。6月1日正式开始气象观测、记录、发布气象报告。为了使工



作科学化、规范化，先生亲拟组织简章、办事细则、观测凡例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并从一得测候所借出许多重要仪器，充实该所。先生除精心管理日常政务外，还亲自从事气象观测，指导所内人员的业务工作，主编气象资料，并积极参与学术活动，协助云南省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大理、保山等地设立测候点。同时陈一得先生还受聘在云南航空学校讲气象学，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讲夜行军时辨认北极星等识别方位的天文知识，后又到省立昆华工校讲工业气象，到省立农校讲农业气象，并常带学生到测候所参观实习，普及天文、气象等科学，推进了全省气象事业的发展。

1939年，他协助由云龙成功地用实测气象资料编写《高峽志·卷四气候》，在全国开创了用气象资料编写方志·气候志的先例，比方志学界认为最早的气候志——《洛川县志·气候志》还早几个月。同年为《新纂云南通志》撰写了天文、气象两考；在《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先生收集了全省50余处气象资料，撰成《云南气象要素之分布》等文，分析云南山地气候特点、趋利避害的对策。他将全省分为八个气候区：云岭温和区、南盘温暖区、乌蒙凉爽区、金沙旱热区、横断山区、澜沧湿热区、元江燥热区、热带雨林区。绘制了较详的云南气候分区图，为研究和开发云南气候资源提供依据；又收集、整理民谚300条入志；1941年9月，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在甘肃临洮的日全蚀观测，一得先生利用先进的仪器、认真观测，首次发现了几天来某一星座未能观测到的原因是星座位置发生变动，并准确预言该星座出现的时间、方位。

陈一得先生通过查阅历代有关云南地震资料，



实地调研探索历次地震活动的成因、规律，撰写研究文章。他将地震分为三类：火山地震、断层地震和陷落地震，并发现了地震与天体运行的关系。给后人留下大量研究资料。陈一得先生在--得测候所及省立测候所的工作填补了云南这一时期天文气象科学的空白，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观测资料及研究文章。解放后，陈一得先生把--得测候所的所有资料都交给了人民政府，这些资料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

陈一得先生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为发展云南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为这些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给云南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成为我省气象、天文、地震科学的先驱，在科学文化并不发达的当时，陈先生早早地让风向标转动在云南高原，被誉为中国自然科学界的“鲁殿灵光”。



## 云南第一座广播电台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迅速传达政令、新闻，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创设广播电台一事被提上议事日程。

1931年12月8日，在民国云南省府委员第268次会议上，提出筹设本省播音机的议案。会议通过了“令电政管理局长杨勋从速筹划架设无线电”的决定。可见，当时省府委员们并不知道广播电台是什么东西，称之为“播音机”和无线电。

全社会积极支持这一决定。《民生报》发表言论：“无线电对于吾滇交通不便，民智低落之地尤为急需。所谓提高民智，宣传党义，教授学理，引导社会正当娱乐。其对不识字之民众亦得同受实惠，又不荒废正业，其功甚伟……”

省府特命建设厅拟出云南全省无线电计划，并付诸实行。昆明一家电料行闻风而动，呈请建



南屏街。近日楼

设厅发给护照，进口各种收音机在滇发售。由云南无线电局承担创设，台址设于五谷庙，称广播无线电台。建成后每晚播送新闻、气象、演说、商情。

经无线电局在军政工商和外国驻滇机构中调查，昆明全市有收音机者计14家，除五华山省府、龙云宅、建设厅、电政管理局长萧扬勋宅、耀龙电灯公司邮政总局、逸乐影戏院外，都是铁路、海关、天主教堂的英国、法国人所有，其中滇越铁路云南府车站还附设有小无线电台。14部收音机都用“真空管收检电波”，从每天黄昏开始，可以收到日本、马尼拉、曼谷、加尔各答、西贡等国外电台的广播。南京国民党中央台虽然能收到，但声音反而不如国外清晰。

省府创设广播电台的意图，最初在于迅速传达政令、新闻，因此，在电台正式成立前即由各县选送专业人才来省，进入无线电局开办的收音员训练班短期培训，结业后在省里领取收音机，回县成立收音台，开始从事传递信息的工作。1934年初广播电台安装竣工，同年3月16日起开始试播。省府秘书处召集各有关的机关团体，商定供稿内容和办法。3月20日《义声报》称：“所有时间、节目，依照拟定章程，每日广播二次，第一次午后3至4点，播送政令及重要新闻；第二次午后6点至8点30分，播放音乐、戏曲，并播放本省气象、商情、本省及国内外新闻”，试播情况良好。1934年7月3日下午7点，无线电局广播电台恭请龙云主持揭幕典礼，同时邀请党政机关长官到会，共同庆祝广播开播。当晚播送了龙云的讲话和特别音乐。

鉴于民间收音机稀少，无线电局特别在该局护国路营业处、文庙民众教育馆、近日楼设置了扩音器，不少昆明市民首次听到了广播。



## 云南火柴工业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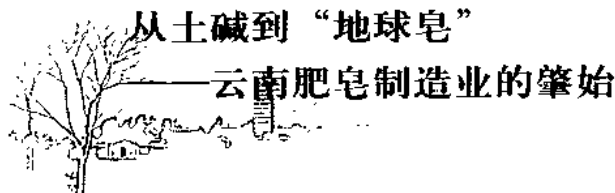
清末云南的火柴几乎全用的是外国货。滇西的由缅甸输入；山区和农村中，多半使用火镰、火石、火草三种物件配合，打击生火。1912年，四川人刘茂廷购买了一批黄磷、一套土造生产工具，邀约火柴技工十多人在昆明崇仁街成立云兴火柴公司，制造“三尾鱼”牌火柴。他们生产的火柴，药头用黄磷作发火剂，用硫磺作引燃剂，用时在任何粗糙面一擦即燃，燃烧时发出淡蓝色火焰，俗称为“阴火”。阴火引燃时间较长，遇风也不易吹熄，比较适合农村和山区使用，而且价格低廉，所以一经开市就非常畅销，有供不应求之势。可惜这批黄磷不多，用完以后，无处购买，云兴公司只得歇业。

后来陆续开办利华、丽日、协和3家火柴公司，鼎足而立。文山人徐云楼见云兴公司开业后，火柴供不应求，故而招集股款，向驻昆法国洋行订购了大批黄磷，租鸡鸣桥炉神宫为厂址，于1913年成立利华火柴公司，生产“鸡鸣牌”火柴。开工应市恰逢云兴公司歇业，所以生意十分红火，业务逐渐发展，每日生产量由10余听增加到20余听（每听120包，1200小盒），每年可生产1万听。加上徐氏善于经营管理，产品质量优良，信誉非常高。到1926年，风闻各国公认黄磷有毒，禁止生产、使用黄磷火柴，一时间又难以生产安全火柴，利华公司不得不停业。

丽日公司由盐兴人张启元主办。他于1913年在昆明募集到几千元股本，先到日本考察了一趟，带回了制造火柴梗子、盒片、选梗、排梗、折



梗等全套机器，又购买了黄磷、赤磷、氯酸钾等原料，租下拓东路真庆观为厂房，成立了丽日火柴公司。公司成立后曾经试制安全火柴，但因缺乏技术，只好改制“日龙”响火及“月牌”阴火。响火是用黄磷及少量氯酸钾加填充料和胶水调匀，沾成珠头，以巴腊为引燃剂。用的时候只需在任何粗糙面上一擦就燃，燃烧较猛烈，会发出声响，有时还会爆炸，在地面被人踩着也会发出爆炸性响声，所以称之为“响火”。响火的臭气虽然比阴火少一些，但在擦划时及制造、保管中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不十分畅销，丽日公司也于1929年停业。1926年至1931是云南火柴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时火柴制造业的产品由黄磷火柴逐渐向安全火柴改进，生产由全人工渐渐改进为半机器半手工操作，生产厂家由三个发展为多个。1928年复工的利华火柴厂比较具有代表性。该厂购办了生产安全火柴的全套机器及药材，生产“双豹”牌安全火柴，即所谓的“阳火”。所用的梗片是本省出产的白杨树及赤松树，生产机制梗子及盒片；其中选梗、排梗、卸梗都用机器操作，又选用本省特产的松香、硫磺、锑矿、锰矿、牛胶、漆蜡等代替外来原料。从此，云南的火柴工业渐渐成熟，产品由阴火畅销时期进入阳火畅销时期，本省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外来产品逐渐减少，以至绝迹。



前清时期，云南工业原料虽多，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民间资力薄弱，工业还停滞于手工业时代。除昆明一部分家庭手工业开始走向工厂手工业，其他产业尚未与农业完全分离，仍为农业的副业。当时，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火柴、肥皂都无法生产，洗涤衣物只能使用含碳酸钠等碱质的土碱、木炭灰水、白泥等，效果很差。有皂角树的地方，人们喜用含碱质的皂角皮，但皂角产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至于早晚洗脸，多用土碱、豆面，稍讲究的人家，取动物脂肪中的一种腺质——“胰子”与适量的土碱、豆面混合，捣至极细，再加少许樟脑和香料，做成方块或圆块，干燥之后用于洗脸，这就是最早土法制造香皂的开始。当时许多大糕点铺如合香楼，因用油较多，因此取得大量的猪胰子，特制出一种鹅油胰子，供应市面，行销非常广，是当时年轻妇女的奢侈品。

到了清朝末叶，英国的长条肥皂、法国的车轮皂、马头皂沿滇越、滇缅路大量进入了云南市场。但这些舶来品价格昂贵，非一般人家所能问津，同时也使得大量利权外溢。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已充分认识到：中国贫弱，只因工业落后，欲致富图强以救国，必须发展工业。而制造肥皂工艺简单，工具亦少，原料只碱油两种，可以就地取材，规模可大可小，开办收束都较容易。故民国初年，民间就有许多仿造者。大理人宋旭初，





“地球”皂的包装上“荡垢涤污”图

1914年在大理开办家庭工厂，用祥云上碱与花甸坝石灰自制烧碱，加猪牛油，剑川漆油、漾濞茵陈油，家人自己操作制造妙香肥皂。但这些家庭工厂终因技术幼稚，产品粗劣，且生产的只有洗衣皂而无洗面皂，都不能与洋货抗衡。



1921年以后，受工业救国思潮和抵制洋货运动的影响，云南掀起了发展工商业的热潮，政府也竭力倡导发展工业，且明订了免除厘税等奖励措施。肥皂制造业也进行了技术革命，派人到外埠学习，聘用外来技师，原料、工艺等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亚东视厂生产的肥皂——“地球皂”，是经改良后的纯粹国产货，质优价廉，可与洋皂媲美，当时曾风靡一时，畅销全省。

亚东视厂设于昆明市南门口的玉溪商场内，由玉溪人冯子白独力经营，资本约3 000银元，聘有广东技师1名，技工7名，所用设备购自香港约值千余元。原料为碱和油两类，碱为购自香港的苛性钠，油则多为牛油、视油、桐油、蓖麻油，在省城迤东一带购买，此外还加一定量的购自香港的鲸油、松脂及香料油，如素馨油、桂花油、橙皮油等。制造方法是油煮沸后加入碱液煮之制成后经打磨、烘干等工艺后加内外包装，封面印有荡垢图，内票则有“地球皂”商标和一则广告。包装为每两块为一条，每2条包一封，72封一箱，定价为每箱银七元。据省署工商科检验，地球皂“质尚佳良，极合洗涤之用，如能锐意经营，可望发达也”。从亚东视厂可以看出，此时的制皂业相对而言已较成熟。由于原料、设备、工艺的改进，产品的质量已有较大的提高，但价格与进口货相比仍较低廉能为广大消费者接受，客观上抵制了洋货，使肥皂、香皂的生产逐渐向国货过渡，并带动了视油、漆油、苛性碱的生产和其他轻化工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云南的肥皂厂风起云涌，规模较大的有泰华、福云、利华、远东等，每年产销货额约滇币上百万元，产品有白、黄、黑数种。经先后核准免税，故制皂成本较低，售价亦较外货



为廉，虽品质尚有待改进，但人民乐购，销路日广，外货几乎绝迹。

## 精盐、筒盐、大锅盐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针对云南甲状腺肿大（俗称大脖子病）发病率高的现状，民国云南省盐务管理局参照瑞士、美国等国家做法，



灶户正熬制筒盐





晒干后的桶盐成品

提出改良滇盐盐质，首先推行精制洁盐，然后实行食盐加碘。

谁知刚开始推行精制洁盐，市场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常的现象：洁白晶莹的优质精制盐既无人愿卖也无人愿买，而看上去脏兮兮的、黑灰色石头样的筒状盐、大锅盐反而买卖踊跃。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要从云南人的食盐习惯说起。

云南的食用盐基本上是本省自产的井盐，其制作方法是将水灌入盐矿井洞中，抽出卤水，或把开采出的盐矿石泡成盐卤水，再把卤水放入锅或桶中煎熬，待水分全部蒸发完，就得到筒状或锅状的盐块。这种盐由于含有不溶性杂质如灰土等，外观较黑且呈块状。因云南交通不便，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块状盐既节省包装费，又便于搬运。再加上当时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盐的单位常以驮或锅来计算，块状盐便于计量。因此，即便是含氯化钠达90%以上的优质盐，在制造成型时也照例加入一定份量的泥土作为粘和剂。这种盐在食用时，必须先藏下一小块，用盐白捣碎。由于云南制盐历年如此，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当



时民间甚至流传着“白色盐吃了上火，不如灰色盐清凉”的说法，而灶户生产精制盐要多增加几道过滤工序，制盐成本相应提高等，致使推广精制盐受到无形的阻力。

盐务管理局对吃筒盐、大锅盐清凉一说作了调查研究。经化验分析各盐场出产的盐中都含有少量的硫酸钠。这是由于硫酸钠的溶解度和氯化钠差不多，二者能同时溶于水，又同时结晶析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使二者分离。硫酸钠是一种轻泻剂，处于干燥气候条件下的云南人常服一点不仅对身体无害，反而能泻火。而且，硫酸钠俗称芒硝，用含硝的盐腌肉不仅肉色鲜红，且香味更浓。据说有名的宣威火腿就专门要用含硝量较高的黑井盐来腌制。如今科学已证明，食用含硝的盐对人体有害，但当时对此并没有认识。

针对上述情况，省盐务管理局加大了宣传力度，从食盐入手，制订甲乙丙等标准盐样分发到各盐场，强制执行。并奖励洁盐，取缔劣盐，使精盐逐渐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于是，筒盐、大锅盐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的人们早已将它们遗忘了。



## 昆明“公交车”小史



昆明城里最早的公共交通工具是轿子。这种“公共轿子”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昆明街头，已难以考证，但直到清末民初，仍是老昆明城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据记载：“此间交通工具有轿子一种，可抬三人，轿杠极硬，形若弓弧，中央高而两端低。轿夫多吸鸦片，气力极弱，行不数步，前后必互换一次，颠簸震动，痛彻腰背！”这样坐上一趟，确实也够累人的。坐轿子虽不舒服，却别无选择，昆明的有钱人逢年过节，游山玩水，远到西山、安宁温泉，近到昙华寺，都只能以轿子代步。

代替轿子而崛起的是人力车，当时又叫东洋车，昆明民间叫黄包车。《滇声报》1914年11月6日登载消息：“东洋车已准入城，吾滇自马路成立，迄今数月，虽有人组织东洋车公司，亦只能在城外一小部分乘坐，而不能入城，以期推广。”黄包车的构造很简单，一个椅子、两个轮子、两根杠子，一个人双手握杠拉着跑。当时昆明城内马路狭窄，街道不平，大多为石板砌成的路面，有的石缝宽得可以卡住车轮，车子跑在上面不仅速度慢，而且颠簸震荡很不舒服，所以自人力车开驶以来，虽然价格低廉，但乘客大多数是为游玩乘坐或小孩子坐着玩耍的，以至于车夫按规定交纳完租赁费后，很少有赚的，甚至有的人不敷出。上世纪20年代，昆明出现了自行车（当时叫自转车），但数量很少，并不普及。

至于昆明的货运，主要靠人力运输，因当时对外交通不便，又没有交通工具，所以当时的货



金马坊前的“黄包车”

运主要由夫行来承担。夫行有点像如今的搬家公司，只是用的全是人力和扁担、绳索。昆明名气较大的夫行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四川人陈洪义开办的。陈洪义先在四川、贵州开“长夫行”，后送督办云南矿务唐炯从贵州来昆明。唐炯准许



他在矿务衙门（今长春路）前挂牌营业。后陈洪义又在旧粮道街（今景星街）正式成立云南陈麻长夫行，又称大帮信轿行。夫行的主要业务，一是为公私运送款项；二是为官商寄送班信；三是承接“红差”和“黑差”。所谓“红差”是揽送官商旅客，无论坐轿、滑杠、杠杆、挑子，一律承接。所谓“黑差”就是送棺材。价钱由人夫的数目和到达目的地的沿途生活费决定。

20世纪20年代后，昆明出现了转运公司，运货主要靠马车和牛车，人挑马驮的也很多。当时的马车、牛车多用木轮或铁轮，颠簸得厉害，又伤路面。直到30年代末，利用废旧汽车轮胎翻制大车胶轮，胶轮车才逐渐多起来。

昆明最早的公共汽车出现在1937年。据记载，这一年成立的官商合办云南运输公司“由后勤部购进废旧卡车一百余辆，进行改装修配，承运客货，行驶长短途，并把一部分汽车改为公共汽车，在市区行驶”。公共汽车当时从表面看生意兴隆，但实际上弊端重重，乘客大半为军人、地痞、小官吏，这些人乘车都不买票，人称为坐霸王车，运输公司管又管不了，停又停不了，疲于维持。到抗日战争前夕的1937年5月，昆明已有汽车249辆、人力车（黄包车）1300辆、畜力货车184辆。这时距黄包车正式进入昆明城已23年了。



## 昆明最早的市徽市旗



本世纪20年代初，东洋、西洋各国的文明都市都制定市旗、市徽以作为本市的特有标志。昆明市政分所也决定仿效，制定一个形式简单而含义深刻的市徽、市旗。经过多方征集和商议，1922年9月昆明市政公所经省长唐继尧核准确定市徽、市旗。

市徽为两球相衔形，取象于昆明二字。从字形上看“明”为“日”，“月”两字并合而成，徽型为两球相衔。取日月合璧的意思，也寓示了昆明的发展前途好像日月之升恒。“昆”为“日”，“比”，也与这一寓意相切合。中间标一个“市”字，取自《易经》“日中为市”之意，推而演之，又蕴含沟通东西两半球之文明而成为一个模范城市之意。两球边线用红色，中间的“市”字用黄色，是因云南地处我国南方。而昆明地居云南中部，按



市旗市徽

五行学说，南方属火，色赤；中央属土，色黄；底色用蓝，是代表“雨过天青，万象清明”。

这个市徽、市旗，创意和审美角度都显得比较稚嫩，但它表达了当时昆明人希望沟通中西文明，促进社会发展，力求使昆明成为一个“模范市”的良好愿望。





## “宣威火腿”小史

“宣威火腿”又名“云腿”，是云南最负盛名的土特产，因色、香、味俱佳而驰名中外。

清雍正四年，滇东地区“改土归流”鄂尔泰新置宣威州以后，四乡八里的农人，为换盐巴钱常将自家腌制的火腿背进宣威城里进行交易，偶有人问及所卖何物，卖主答曰：“宣威火腿”。据考证，宣威火腿的腌制起源于汉族民间。约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汉族人口大量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宣威的生猪饲养由此大为兴盛，可谓“无豕不成家”。大量的肥猪集中在年关前一两个月内宰杀，鲜肉一时吃不完，农家们便设法用盐腌渍，以备来年自食或上市。

关于腌制火腿的过程，宣威人缪开和在他的散文《走滇东》中有过生动的描写：“猪宰下后，霍霍声中皮毛刮尽，便剖肚开肠，掏去五脏六腑，划作六件八块，放进大盐锅，接受一次又一次烧红的盐粒的洗礼，一阵又一阵粗壮大手的揉搓。好长时间后便提出锅，挂在阴暗处、火塘边、板壁上，让尘落风透，外表渐渐干瘪泛出暗绿，里头转红转润，生香生甜。计划得最精心，腌得最认真，藏得最珍贵的是两条后腿，即‘火腿’。因其肌肉饱满腿脚伸直宛若琵琶，所以叫‘琵琶腿’，成熟时外表覆有一层青绿色的霉烟。腌的时间越长越显古典和本真，人称之为‘老腿’。用牙签针刺三个不同部位，达到三针清香即为佳品；切开断面看了红白鲜艳，闻之香溢清远，食之则油而不腻，咸中带甘，美味可口。”早在1915年，宣



威火腿就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宣威火腿质地优良，味道鲜美，谓之“食中尤物”并不为过，然其只头过大，不便携带、且表面油腻肮脏，“金玉其中败絮其外”，不食者难知其美，这些都影响了宣威火腿销路的扩大。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浪潮汹涌。1920年，宣威人蒲在廷兄弟从广州引进技术，开设宣威火腿罐头公司，用机器代替部分手工包装，日产达三千听。1923年在广州农副产品博览会，宣威火腿倾倒了羊城食客，孙中山先生挥笔为蒲在廷的宣威火腿公司题词：“饮和食德”。从此，宣威火腿声誉更起，畅销东南亚、日本、西欧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销路的扩大，极大地刺激了宣威火腿的生产，数家公司应运而生，其中以宣威籍肖达忠开设的德和罐头厂规模最大。1946年，宣威火腿年产量已达160万斤。近年来，县里首先从生猪饲养抓起。进行猪种改良饲养瘦肉猪，为改良宣威火腿提供了充足的原料。1994年，宣威市正式组建“宣威火腿企业集团公司”，在生产、销售、检验、包装等方面实施科学管理，把宣威火腿名品全力推向国际市场。



## “云南白药”拾趣



云南白药原名“曲焕章百宝丹”，采用云南特产名贵药材经科学配制而成。其历史悠久，疗效显著，是驰名中外的国产中成药。创始人曲焕章先生系云南省江川县人氏，是20世纪初著名的中医外伤科医家，有“药冠南滇”、“效验如神”之美誉。他遍游滇南名山，学神农尝百草，不耻下问求教于当地民族医生和草药医生，获得很多伤科名药，遂根据明、清以来流传于云南民间的中草药苦心钻研试验，经十载临床验证，反复改进配方，终于在1902年将百宝丹试制成功。曲焕章其人及白药之奇效神奇的故事也随白药声名的远播流传人口。

曲焕章学得医术后，背起药袋行医四方。一天他上山采药，看见两条大蛇在搏杀，打败的蛇被咬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奄奄一息。只见它慢慢爬到一簇野草丛中一边吞食，一边蹭来蹭去，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那条蛇竟完好如初地爬了出来，伤口已完全愈合，元气也已恢复如常。曲焕章将那不知名的野草采回来仔细研究，尝试着配入其他药中医治跌打劳伤，疗效果然显著。此后进一步改良配方，使之日臻完善，取名“白药”。一天夜里有人急来求医，他背起草袋就走，来到一座深宅大院。原来是富滇银行通海总办徐老先生肩上中了一枪，弹头还深陷在肉里，便为他包上白药。几天后曲焕章再次上门为之换药，松开绷带，忽听“当”的一声，原来是一粒子弹头掉落在地板上，再看伤口已完全愈合。徐老先生惊叹道：“真神啊！居然靠药力就拔出了子弹头，曲



医师医术真是无以伦比啊！”此事很快传开，曲焕章和他的“白药”名声大振。后来曲焕章先生将这种药进行批量生产，更名为“百宝丹”。

抗日战争时期，曲焕章先生将大批“百宝丹”捐献给前方将士，更使其名扬四海。国民党政府请他到重庆“共商发扬国医大事”，一到重庆便被软禁。蒋介石欲逼迫他交出“百宝丹”秘方，他宁死不从，不久便与世长辞。

解放后，曲焕章的家人把秘方献给了人民政府，“百宝丹”又改名为“云南白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云南白药厂于1971年正式建立，云南白药从此走上了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路子。随着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对云南白药研究的日益深入，其广泛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极大关注。云南白药——这一祖国医药宝库中的瑰宝，必将对人类的健康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多的贡献。



## 云南玫瑰大头菜



云南玫瑰大头菜，又称玫瑰黑芥，始创于明末清初，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相传，当时位于昆明南正街（辛亥革命后改称正义路）的永香斋酱园正在腌制大头菜。一位农村来的帮工忙着回家过年，错把玫瑰香精当作配料投入腌缸里。他自觉惹了祸，怕老板追究，就一去不归。谁料歪打正着，那缸投了玫瑰香料的大头菜在揭盖出售时，竟香气扑鼻，很快销售一空。老板弄清了原因后，忙又把这位担惊受怕的帮工以优异的待遇请回来当师傅。以后玫瑰大头菜畅销全省，永香斋遂因此名噪一时，被誉为“芥菜名家”。



永香斋商标



玫瑰大头菜选用昆明郊区的鲜嫩芥菜为主料——以官渡区金马、云溪两地种植的芥菜为最佳，配以盐、红糖、饴糖、醃子酱、玫瑰香料等经浸泡腌制滤水、发酵等四道工序，约80天后出缸日晒即成。成品皮色黑亮、内心褐红，清香脆嫩、味咸回甜，含有大量维生素及17种氨基酸，营养丰富，生津开胃。吃法简便多样，既可单食，也可凉拌，可与其他菜肴配炒，而且久储不变味，是佐餐及馈赠亲友的佳品。解放前，玫瑰大头菜曾通过滇越铁路经河口出口，远销菲律宾、东南亚诸国及港澳地区，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初以昆明永香斋生产的最为驰名，后昆明各酱园都能生产。1911年，这种名特食品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1921年在云南劝业展览会上再次获奖。解放后，玫瑰大头菜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扩大生产，销路日益广远。昆明南坝食品厂生产的滇池牌玫瑰大头菜曾于1980年及1982年先后被评为商业部和云南省的优质产品。



## 民国初年的广告



今天，广告已经走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创意、画面、色彩，还是载体和制作都已达到较高水准。被形形色色现代广告所包围的人们，回头看看云南广告业孩提时代的作品，定会别有一番滋味。下面是档案中撷取的几则民国初年餐饮业广告。



琴鳥商標



### 万家春广告

本楼开设中西酒筵，精制各种茶点面包。价廉物美于省会市场上之料理店。别具特色。且厨师聘自广州，巧于烹调。饮料汲自吴井，务求清冽。今更不惜重资，再由香港聘来西菜名厨。此后菜品日日翻新，茶点色色俱备，非特窗明几净，絢烂装璜已也。各界诸君请尝试之。《天南新报·别刊》民国2年7月23日。

### 迎宾楼开张广告

本店开设粮道街第十一号门牌（即前悦宾楼



光緒廿九年丙子



旧址)，兹特另修清洁。特聘上等厨师专办各种日行便菜及各种酒席，鲜美精致，所有迎送招待，极为周到。兹择于旧历八月十五日开张，凡一切价目较前尤为克己，至期务望各界诸君惠顾为盼。《滇声报》民国3年10月1日。

#### 云华茶园破酥包子出售广告

敬启者：四方亭破酥包子久为各界所尝悦，既足以适口，又合于卫生，兹分设于云华茶园内，认真加料，不惜工本，务求适食者之口，价亦从廉，今议价火腿者二十二文，他如白糖、洗沙、鲜肉各料者，概收十五文，言不二价，各界务须认明为要。四方亭主人谨白。《滇声报》民国3年9月10日。



## 老昆明的茶铺



档案中对昆明茶铺的记录，颇具地方特色。最早的茶铺是县衙门（现昆七中）隔壁的那一家。没有字号，具体开设年代不详。当时来喝茶的，多是打官司的人，坐在茶馆里等待传讯。衙门里差役出来，就对着茶铺高呼：“传某某人。”其次是乾隆年间曹姓人家开设的四合园（今文庙街、正义路交口的豆蔻饭店），宜春园（正义路顺庆当巷口），钱南园书写的招牌。四合园营业时间最长，早晨七、八点开铺，晚上十一、二点时“打烊”。卖茶带讲评书，用锡茶壶供茶水，三文铜钱一人，五文三人，六文五人。每天可卖二吊多钱，折合二两多银子。喝茶的人，早晨主要是大索行（抬棺材）的。中午，晚上多为卷经会的文人。卷经会是清代文庙里的一个组织，由绅士文人组成。据说是为了平时联络感情，“太比之年”设法凑钱帮助寒士上京赶考。传说晚上“打烊”后，常有一位姓金、一位姓姚的文人到四合园喝茶。铺家也专为他们煨一壶水在炉上。直到四合园的伙伴



云南宜茶各县种茶办法



天亮起来拨火备水迎早市时，二人才离开。因此称二人为金半夜、姚天亮，真名实姓反而失传了。

正义路马市口（今国际相馆）附近的三合园，是光绪二十几年开的。带打围鼓清唱，白天晚上不断，唱的多是票友，铺面有3、4间。此外，卖线街口的义合宫，威远街、护国路口的允香馆，玉溪街（今百货大楼停车场）的陶然亭，也都是光绪年间开的。义合宫带清唱打腰鼓，允香馆带戏班，都为郑文斋开设。陶然亭是玉溪人赖小八开设的，除卖菜外，还卖破酥包子。因为当街，喝茶的人很多。

宣统年间因修铁路，又陆续开设了一些茶铺，较大的有息一亭和罗芝楼。息一亭在今火车南站对面，专门招呼过往客商，楼上楼下，五间茶室，每碗茶卖三个铜板。还带有打腰鼓清唱、卖炒菜。罗芝楼在今巡津街市人民医院对面，除茶外，卖的食品很多，有包子、点心、炒面、火烧等。昆明人一般都喜欢相邀至此消磨时光。



## 老昆明著名的糕点铺



昆明的糕点历史悠久。民国初年，各个著名的糕点铺都有自家的名牌货，如合香楼的鸡蛋糕，清香楼的荞坨，大吉祥的雪片，德美轩的饼干，冠生园的西点，吉庆祥的“四两坨”（即火腿月饼），芝兰轩的什锦南糖、芙蓉糕等各有特长。破酥包子、鸡肉烧买是蒸食时尚，这些构成昆明糕点小吃的极品。据档案载，当时昆明最出名的糕点铺有四家。

**合香楼：**光绪年间由一北京人在三转弯（今如安街）开设。此人随某总督来昆明，是总督衙门专做点心的厨师。合香楼以鸡蛋糕和“四两坨”最为著名，其他还有芙蓉糕、口酥等，品种很多，质量也非常好。因保持了北京商人经商的传统，合香楼的糕点油面分量准确，价钱比较公平，所以市场上销路极广。当时官场中送礼，大多向该店采办，同时也行销于本省各州、县，甚至有的人将火腿月饼远路带到北京送礼。每年中秋节前一个月，合香楼的月饼即预订一空。据传说，合香楼的糕点之所以闻名于市，是因为合香楼的老板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因此工人制做糕点时油、糖等原料都放得过足，以图亏本而报复老板，不想竟因此而被顾客认为货真价实而远近驰名。

**吉庆祥：**光绪末年开设于马市口，当时只是一个小铺子。民国以后，老板与军阀结亲，本钱充足，加之经营得法，生意越做越红火。特别是火腿月饼的质量居于各糕点铺的榜首，比合香楼更负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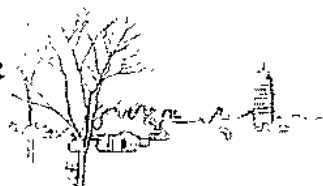
**永香斋和允香斋：**开设于南正街（今正义



路)，其生产的糕点品种多，质量好，颇负盛名。该铺尤以玫瑰大头菜最为著名，其他如蜜饯元红、桃干等也非常有名。后来兄弟分家，弟弟另在隔壁开设允香斋，除生产各式糕点外，其所产蜜饯、果品在当时也非常著名。



## 老昆明的婚姻习俗



旧时昆明人婚嫁的礼节颇为繁褥，虽然礼物丰俭各称其力，但都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规矩和步骤，决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遭人耻笑。

婚嫁第一步是求庚贴。一家有女百家求。提亲一般都是男家主动，女家被动，极少有女家主动的。男家看中哪家小姐，须先求小姐的庚贴，之后就可以通媒妁，请媒人正式上门提亲。女家如没有明确拒绝，下一步就是“瞧媳妇”，男家要请亲长尊贵者，到女家向主人致意，实则是考察女家佛堂是否清洁，供花是否为姑娘手制，炊食如何，针织如何，家庭教育如何以及小姐年貌人品如何。如看中了，便请求“合八字”，经拆字先生推算，双方生辰八字不相克者，便可将婚嫁正式列入议事日程。

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男家既已考察了女家，女家自然也要邀集女子的舅父、姑父等至亲尊长到男家相一番亲，考察准姑爷的才学品貌，家境情况等。如没有异议，就开始“押八字”，由男家准备首饰四、六、八样（视家境而定）及酒、肉、糖茶等礼品献诸女家。然后“过礼”，男家将彩礼及给新媳妇的四季衣服 8 套以上送至女家。女家要“迎妆”，将嫁妆抬至男家。嫁妆的内容依当时行情而定。这一套礼节完了以后才大摆宴席，敲锣打鼓地按照严格的程序迎娶。

当时昆明婚嫁习俗最为独特的是——捶门柬。喜宴散尽，洞房里燃起一对通宵花烛，新媳妇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白丝袜一双，袜内塞着白丝巾一幅，呈献给新姑爷，新姑爷端坐受之，笼入袖中。



洞房后，处女膜破，白丝巾上即见红。

第二天天未亮，公婆和男方尊长在焚着香烛的家堂神佛前端坐等待。媒婆用托盘将带红的白丝巾托出请众人过目，大家连声道喜，立即派人将新郎写好的报喜柬送至女家，捶门报喜。至此，新娘母亲总算将女儿好好地嫁出去了，惴惴不安的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男家娶亲也算是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捶门柬的婚俗让人不寒而栗，所幸它已成为历史。



## 老昆明的服饰风尚



老昆明的服饰经历了胡、满合璧、到西服长裙的演变……满清时，昆明的服饰以胡服为主流，帽子头饰以满制为主体。特别是官场应对时，男人尽皆满帽花衣补褂，女子皆是凤冠霞被，蟒袄蟒裙。

日常起居的服饰，男子大都头戴用绸缎制作的瓜皮六方小帽，小帽有尖有圆，仅根据流行时尚小有变化；身上的衣服则为长袍长衫马褂，衫



官服





- 1 清末的云南少数民族——巴格瑶族女子(1886-1904)  
 2 演述新军之前，清一军官的装备  
 3 清末云南的少数民族——巴格(右)及未格的傣族女子  
 4 清末云南的少数民族——巴格瑶族女子。(1886-1904)





清末云南的少数民族——云南，花  
苗族未婚女性的装束(1886-1904)

袍为小袖口，宽只有三寸左右。马褂无领无袖只有外套的一半长，是便于骑马的男式坎肩。清末时马褂越来越短小，最后长仅一尺挂零。可能因小袖口的衫袍束缚过紧，不太舒适方便之故，也许还有美感的问题，宽袍大袖重又流行，且袖口变得宽有尺余。男子服饰初时多为青、蓝色，以后轻俏艳丽的颜色逐渐流行，深红，鹅黄，果绿都成了男子服饰的流行颜色。大悻红紫为男子裹服的传统。工商士子在服装样式上虽无差别，但



清末云南少数民族——说佬佬语的土佬族女子

质地却不同，有钱人多穿绫罗绸缎，普通人家以布衣为主，只是有功名的士子帽上多个顶子。那时的农民也穿长袍，腰间要加束一条布带，马褂只在娶媳妇及重大场合才穿，但多是借来的。

女子的衣饰，因年纪大小稍有差异。中年女性一般穿长及膝盖的长袄，下穿裙子或裤子。也许是为了保暖、美观，或是为了做事方便，如果穿裤子，则裤脚多用丝带束起，年轻女子一般穿





清末民初的云南少数民族——纳西族妇女

绣花边的百褶裙或裤子，裤脚散开；上衣最初流行较长的，后愈来愈短最后竟只有一尺有余，袖子也渐狭长。裙子大多绣有花边，也有缀着流苏的，但不多见。最普遍的是青布无边饰，只在裙子两旁稍稍缀上一些波纹褶子。女子服饰的颜色最初也是以青色，蓝色为主，后来逐渐流行红、紫、黄、绿等纤巧艳丽的颜色，受服装流行规律的制约，后又逐渐流行起灰色。

到昆明开埠及滇越铁路通车之后，法、英等国的舶来品倾销昆明，昆明人的服饰风尚和生活习惯为之大变：西装革履，礼服长裙充斥于街头。



## 编辑说明

云南省档案局(馆)长杨汝鉴同志,有鉴于云南省档案馆作为省市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拥有六十余万卷清代以来档案馆藏的实际,提议编写一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以此作为我们加强云南省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据此,一方面由云南省档案局(馆)向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行文,征得省委宣传部同意合作完成这套丛书编辑出版及发行事宜;一方面在省档案局馆内搭建班子,积极组织丛书的编写。为照顾青少年读者和一般社会读者,丛书选文短小精干,图文并茂。资料来源上,强调档案的历史原貌,客观准确地描述历史,突出云南边疆民族特点,把云南近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期,有利于激励后人的方方面面呈现于读者。让云南人了解云南,认识云南的过去,热爱今天的云南,并对云南的明天寄予美好的期盼。

我们将近年来云南省档案馆一些同志利用档案馆藏陆续发表过的有关文章并补充部分必要的新作汇集成册。计划编写三卷,《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抗战时期的云南》、《战后及新生的云南》。现首卷《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完成编辑,该卷上起于1884年中法战争下迄抗战前夕。编写人员有:吴强、何玉菲、和丽琨、夏强疆、吕志毅、任佩、黄燕玲、陈建丽、陈虹、苗素江。全书由吴强统稿。由于我们知识水平的局限,其中难免不尽人意之处,还望读者予以指正。

